

● 人才启录丛书 ●

主 编：蒋蕊娟

名 人 画 廊

海 山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目 录

- 序一 张学忠 (1)
- 序二 孙长贵 (3)
- 序三 蒋蕊娟 (5)
-
- 乡音 (原序) 爱 民、海 山 (1)
- 费孝通：智慧风景 (9)
- 钱国梁：将军吟归 (32)
- 倪征燠：海牙归来 (44)
- 程开甲：核子星座 (61)
- 汝 信：哲人闲话 (83)
- 冯新德：快乐院士 (90)
- 杨嘉墀：和平砝码 (103)
- 汪集旸：地热之光 (110)
- 陈应谦：情满圣地 (120)
- 李怀志：域外风采 (129)
- 朱通华：才子乡情 (138)
- 蔡正仁：流芳梨园 (153)

吴民先：石鼓肖像·····	(163)
徐孝穆：巧刀神艺·····	(175)
徐穆如：书画不老·····	(184)
故乡明月光（代跋）·····	(194)

由吴江市人事局局长蒋蕊娟同志主编的《人才启示录》丛书如期付梓，我作为一个同行，倍感欣喜。

蒋蕊娟等同志，长期从事基层人事工作，无论是发掘人才，还是服务于改革，他们都将一般事务性的工作紧搭在社会进步的脉搏上，其间一定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这一点看，这套书是“基层人写”和“写基层人”，这对于如何做好基层的人事工作，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谈”。今年春天，我在会议间隙，到吴江实地考察了那里的人事工作，他们的努力和做出的成绩令人倍受鼓舞。

当前，我们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工作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结合起来，继续推进人事工作“两个调整”，深

化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加快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步伐，开展“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活动，建设好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支队伍，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事人才保障。

这套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吴江人写”和“写吴江人”，编撰角度新颖，因而书中所论及的人、事无不带着江南润土的气息。

吴江地灵人杰，群英荟萃，曾走出许多诸如柳亚子、费孝通这样的知名学者。然而，他们所处的年代，只是一个人才自生自灭的历史阶段。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我们这些从事人事工作的干部来说，就是从这一古老的土地上，发现、发掘、培养出大批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这大概就是蒋蕊娟同志编撰《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初衷吧。

是为序。

1996年12月26日

张学忠同志为国家人事部副部长。

《人才启示录》丛书是吴江市人事局向社会奉献的一部佳作，其品位，感同非凡！

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早在几年前，吴江市人事局就创造性地站在人才发展的战略高度，创办了《人才》报，并通过这张报纸以及多种媒体，颂扬历史，反映当代，全面、系统地展现吴江人的精神风貌，以其浓厚的吴越乡情雅集了一大批海内外英才贤士。《人才启示录》丛书的面世，无疑给人们以启示，为读者迷津指途，为吴江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才启示录》丛书既以其真实、鲜活的内容体现出激人发奋的正气，又凝沉着赏心悦目的雅气，有其独特的风格；超越寻常，高瞻远瞩，开拓了行政地域和行业界限的视野，着力揭示了人才成长的普通规律。

因此，丛书给广大人事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同时又不失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也是人

们用以教育后人的好教材。这正是我为其高兴之所在。

吴江，既有悠久的历史，又颇具现代特色。相信《人才启示录》丛书的出版，又是一次很好的体现和弘扬。

1996年11月于南京

孙长贵同志为原江苏省人事厅厅长。

近年来，日益深化的现代意识，使得人们对人才所显示出的巨大力量感到越来越不可轻视，有的人已经乐意将它强调为各项事业兴盛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意识在我看来一点也没有过分。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人事人才工作的人，我一直认为，古今中外由人才造就的喜怒哀乐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很值得思考、借鉴。每当不肯放弃这种念头时，我总希望能够通过某种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比如采取富有人文色彩的形式——来补偿具体事务性工作所不能尽力的部分，于是，《人才启示录》丛书就在这样的心愿驱使下开始编撰了。

想要完成这样一项不小的文化工程，而且期望丛书的品质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行家的评鉴，确实不是轻松的事。好在有一个特别的基础，那就是我负责编刊的《人才》报，其栏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具有启发和教育的意

义，也受到过读者的喜爱。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在选编中也注意到，凡是对现实启示作用不明显的文章一律不用，凡是写历史的文章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凡是纪实的作品都应是第一手资料。这些原则，也就构成了丛书的基本特色。

《人才启示录》丛书共分为六册，分别是《谈人说事》、《名人画廊》、《骄子风采》、《走向卓越——自己的故事》、《人才史话》和《凡人风华》。在体裁上主要是言论性的杂谈、人物散记、报告文学、自述性传记、笔记小品和随笔，力求在阅读时能够轻快、活泼一些。

我们承认，编撰像这样一套从人才角度来论及社会、人与事的书籍，因缺少参考资料，不免显得稚嫩，加以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存之必然，当请读者朋友指正。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是他们在丛书的编撰过程中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1996年秋于退思园

乡 音

1996年除夕。

瑞雪纷飞，银装素裹。家乡的土地，沉浸着祥和静谧的童话意境。在吴江人才大厦《人才》报编辑室，伴着远近的爆竹声声，我们给几位吴江籍的英才名人拜年。通过电话，远隔千山万水的故乡情思彼此交流着，沟通着。虽然天南海北，天各一方，但我们听到的却都是未改的乡音。用这浓浓的乡音，他们表达着乡思，回忆，祝愿……我们也收获着一份欣喜，并将此照实记录。

费孝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我们很抱歉，这个“家乡电话”足足半个小时，耽搁了来看望费老的亲朋好友的时间。今天，他非常高兴，似有说不完的话，如果不提醒他，别的客人在等他，他还准备“专门回忆一些往事”呢！家乡——吴江，在这位大学者的心中，有着特别的位置。

“……每到过年，我都有一个感觉：没有回家乡过年，很久了……上次，还在抗战前呢…哈哈…我常常到处过年，四海为家……现在老了，跟年轻时不一样，那时看热闹，年老了看年轻的热闹……我想吃吴江的‘八宝鸭’，有糯米、莲子心、百果米在里面，现在吃不到，

他们不会做。他们吃饺子，我不欣赏，当然我也不会做饺子……这几天都在忙，电视上你们天天都看见我了。现在客人一大家，趁春节聚聚，平时也难见面。今天人大搞个团拜会，这样的形式我认为很好，一起见见面，集体化的，是新的现代化的形式。

“……对的，好多学者学生们提到今年是我的‘江村经济’60周年纪念，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想起来，1936年开始在吴江开弦弓村……六十年太长太长，要说的话太多（情绪相当激动，停顿一会）。这方面，我从没停止研讨，还在写文章：关于农村经济、农村发展……

“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一次会议，两次会议之间我要到处走走，我的想法是每年能回家乡一次，六十周年‘江村经济’更是要回来的，八、九月份也可以的……家乡的过年很热闹吧？记得小时候要祭祖，敬神祇，家家都焕然一新，这种传统形式很好很美。纪念，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代代相传的，过年了，回头想想自己的来历，我们的传统就是这么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到今天能创造这么一个环境很不容易，要感谢祖先们，同时也要看到一代比一代好，小辈比长辈好。这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优点。从过年的习俗也可以反映出一点问题，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可以，但不能把生活本身看得那么重。家乡富了，也要相互帮助一点，哪里都存在不平衡的，现在，国内的东部帮扶西部就很好。

过年的时候，人容易想到这些，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感谢你们，我就去招呼客人了，好吗？”

钱国梁【十五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司令员】

年三十这一天，我们无约，相互打了几个电话，都错失了时间，没能实现问候。最后，天色将晚时，我方“追击”，终于将他“打中”，他似乎在专门等着这个电话。接了电话，听到乡音不必报名，两人都觉出那种“失之交臂”而后再碰头的痛快。

“我这个年过得很忙，今明两天值班，这是军人特别的地方。现在桌上全是家乡的家常菜，鸡鸭鱼肉为主。四代同堂啦，老岳母也在这里。我去年就想回家乡过年，也想回吴江看看，抽不出时间……我向家乡父老拜个年，行个礼吧。向家乡父老鞠一躬。”

钱国梁在电话中问及他熟识的朋友、战友们的工作、生活等十分具体的情况。他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我们代表家乡人向他作了简要汇报。

陈应谦【医学教育家】

“是我，我已经听出你的声音，是海山同志吧，我的老乡……”（六十多年了，乡音未改，他是“九·一八”那年离开故土，沿着那条红色的阳光大道，跋涉人生的。）

“给我拜年，谢谢家乡人民。我身体很好，过年就87岁了。我现在仍然坚持每天游泳1000米。

“……年夜饭有一道家乡菜——莼菜汤。这时候，总是非常想念家乡的过年习俗，吃吃团子（有甜有咸）、吃年糕啦（红糖的，白糖的），穿新衣服啦，向长辈拜年啦，还记得我的老家屋里过年挂过一幅‘八仙过海’图，人越老越怀念这些，那都是我每逢过年要吃的‘精神食粮’。说起‘精神食粮’，我在延安时过年，过‘共产主义年’，使我总能体味到苦中有乐的生活方式，领袖人物和老百姓、军人们一起看《白毛女》、《兄妹开荒》、《三打祝家庄》等节目，跳秧歌……

“我一直在追求着欢乐，我的大乐是祖国兴旺、家乡发展；我的中乐是朋友、亲人、学生幸福；我的小乐是游泳，下棋和写回忆文章……北京冬天有暖气，夏天，我也有了一只空调，家住公园边上，安静、空气好……我希望你们来玩，多告诉我一些家乡的情况，听着家乡话多开心，我给你留一间房子住，住在家里好……我也向家乡父老拜年。谢谢、谢谢。”

倪征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

远在北京过年的倪老，今年的除夕要享受二样家乡的东西：一个是吃一道黎里风味的八宝鸭，另一个是家乡人此前送给他的家乡录像《天堂明珠》。当我们接通电话时，他说，这个电话是第三样家乡的东西，非常激

动，从他的声调中流露出一种幸福感。

“我驻海牙9年，这是归国第二个春节，非常想家乡。去年回了一次家乡，记忆犹新。（90高龄的老人能顺口说出许多吴江领导及普通相识者的姓名）。

“在春节前，我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外交部一次文艺活动，表演了昆剧《林冲夜奔》，在‘老舍茶馆’，到时候电视台会放的……但我这过年是从医院‘特释’出来的，过了年又要进去，三月份有希望出来……

“吴江，我一想到这个新城就高兴，因为我简直不认识她了。过去的记忆中只有三角井、鲈乡亭、垂虹桥，变化之大令人感触至深……长期在国外工作，我总是非常想念祖国，华侨们都有这种心情。那时，我很忙很累，成堆的文件都要仔细读，活动多。而今，归国了，却又十分想念家乡，看到各镇的变化，真是快活得很。我是《人才》报的老读者，办得很好。我将陆续写一些外交风云的文章请你们指正。你们给我拜年，我怎么向家乡人民拜年呢？只好请你们转达一下了，好吗？”（从电话里听到，已经有几个人进门拜访倪老，但他还是意犹未尽）。

项怀诚【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项怀诚正忙于在基层走访，接电话接受家乡问候的是项夫人，我们便与这位已退休的老师拉起了家常。

“……怀诚爱吃老家的鱼肉，但在吃的方面是不挑

嘴的。他从年初二开始，要为即将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经济税务方面的研讨会作准备。”

朱通华【社会科学研究学者】

“我很激动，很想念家乡吴江。”

“这些日子，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希望我的家乡在今后走稳发展步子。这个问题是：现在有些人散布‘小城镇的历史使命行将完成’的论点，你们可能已经看到我在《思想界》上针锋相对的文章。我认为，现在正是小城镇应当坚持全面而系统的规划、进行有力度的建设、重视管理、抓好繁荣的时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停止对‘苏南模式’和小城镇的探索；一直关注着吴江的发展……”

“我们的《名镇世界》杂志势头很好，正在顺利走向全国，明年将着力于提高质量……关于明年小城镇研究活动，将有日本著名教授鹤见和子和宇野重昭来华研讨，他们已经定下了，地点很可能就选择吴江，我总想有多一些的时间在家乡……像这种时候，真想多说一些祝福的话。请你们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候，我很珍惜这次通话。”

钱今昔【创立了能源地理科学体系的地理学家、旅游美学家、文学家】

“过年时，总想哪年能够回吴江过个年，三四十年

啦，没有回来过。我在刚出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几次写了吴江，每次写书都这样，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从人文地理看，吴江是历史文化与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先锋地区，大有可为，望能发展更快……

“关于能源地理，有个新的信息，长江经济带（一市七省）将统一筹划能源，所以，吴江要加强地理网的联系。

“……我正在写《中国旅游新感觉》，内容全新，笔调风趣。吴江旅游业也不错，但必须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来认识，我分析，风光需体现真善美。春节期间也不会停笔。

“……女儿初熹在日本，是中国第一位留日美术教育女博士，专业上很多日本同行也望尘莫及的，她半个月打一次长途电话、一个月来四封信，从不间断。她的女儿在上海的幼儿园，此刻就在我边上，让孙女随我一起向家乡人拜年吧。”

徐孝穆【竹刻大师】

向他拜年问候的电话接通后，我们感到徐先生仍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由于行动不便，他免了许多应酬。令我们高兴的是，作为柳亚子先生的外甥，年轻时代曾跟随先生走南闯北。值逢佳节，他对柳亚子先生十分想念，说起了1940年随柳亚子先生在香港过春节的事。

“一到节日，亚子先生必醉，给我印象很深。他的朋友多。他有个习惯，见酒则一饮而尽，多半是黄酒。记得有一回在黎里的八角亭，他非要喝醉为止，谁都拿他没办法，见他醉了，大家也都不声不响了。但他是很喜欢写春联的，写得很认真，当然，他夫人在劝其节饮上是有不小贡献的……亚子过年爱吃两种东西，南瓜团子和肉团子，非常尊重乡俗……”

通过徐孝穆先生的回忆，倍感与故去的亚子先生又亲近了一番。

李怀志【中国留法学生的代表，著名青年科学家。】

“……在国外过年，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中国在强大，西方人越来越感兴趣。今年法国很特别，我在法国十二年来，法国电视第一次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我很想家，也很自豪。法国报纸、电视已经介绍了中国的春节，过去，很少人知道中国的这个节日。

“想家与归国之情在我心中很深。国家教委在鼓励我们，多学一点，积累丰富些，因此，我与中科院、浙江大学、北京化工学院不断保持着联系。我感到将最新科学信息传递给祖国，也是一种报效国家的方式。不久的将来，回国的可能很大，我不会忘记故土家园……请通过你们转达一个游子对家乡的祝愿。谢谢。”

爱民 海山 原序

1996年除夕

费孝通：智慧风景

与费孝通先生相识的那年秋天，我写过一篇题为《走向辉煌峰巅的大地之子》的文章，献给他83岁寿诞。我试图以自己的理解，描述他精神世界那葱郁而神秘的风景。走近费先生风云沧桑的心灵，我难免有些迟疑，那种生命的丰富与复杂所衬映的空旷，经常会使人感到目不暇接的迷茫。

我仿佛看见一位年迈的攀山者，在跋涉了千山万水之后，正执着地登上一座山的顶峰。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山，别人无法攀越，只能追踪着他的身影去感受极目远眺的思绪。然而，对于他来说，攀上山峰是一条路的终端，也是另一条路的开始。当他走向大地的时候，他已经是那座山的化身。

在走向费先生房门的廊道上，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平静的怀旧心情，去看望曾被历史烟尘掩盖的社会学大师，就像去访问遗存在未被污

染的山水间的古都。我相信以后的时代，恐怕再也难以出现同样的身影。费先生是由深厚的中西文化塑造的特殊形象——他曾经丧失 20 多年的学术生命，当他重新以一个拥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人走上世界舞台时，已是同类人中的幸存者，也许是后无来者的一座历史孤峰。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这种感受：

“面对这位慈蔼的老人，首先感觉的是一种宁静、祥和的精神，尽管他是集盛名、高寿于一身的人瑞，但他却使人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亲切的氛围。五月初夏的一个午后，他放下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微笑着，缓缓地从座椅上站起来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一种特殊的儒雅而平易的气质，该是他毕生接触民众的写照。我突然觉得，叫费孝通这个杰出名字的人，似乎同时可分解为两个人：诗人和社会学家。诗是探求心灵彩虹的艺术，社会学是探索人类文明的科学，源于同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在费孝通身上尤其体现出和谐的完美，俨然一种宏大深邃而又色彩纷呈的精神现象。”

初次会面的感觉，在后来多次相晤的瞬间，我依然能在内心里捕捉到。费先生在我心灵中的形象，越来越像是诗人的化身，他以如同诗人一般的激情热爱着人们，以宽容和善良，深沉地为大地上的人群思考文明的命运，并为他们寻求美丽的梦想。但是，从来不曾有哪位诗人拥有过像他这样博大的挚爱。他的学术生命就在大众中间，就来自于大地，不论在怎样的岁月里都没有

改变。他从江村走向更广阔的地域，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是高原还是边远地区，人们的苦难和幸福他都要知道。



有时候，我禁不住想：他像一位漫漫荆棘路上的行吟者，怀着某种神圣的使命，将一生颠

费孝通先生周身洋溢着一种宏大而又深邃的精神。

荡在坎坷的路上，而留给人们的是天籁一样的祝福。

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进入费先生的出生地松陵镇居住。虽然我的情感世界拒绝变得浮躁的松陵镇，但那街巷深处却成了我寄寓的第二故乡，我经常能够拂开历史的尘埃，找寻到被蒙蔽的富有人情味的市井旧事，来到沈璟、吴兆骞和费孝通曾经留下生命印痕的河边，为他们溅起过的浪花而怦然心动。费先生人生之初的十

年，是在这个曾围着城墙——城墙里面有园地和田野、城墙外面是乡村的小镇上度过的。

那时，他向往着高墙深院外那个广阔的充满生机的天地。沿着一条通向乡村的小路，走出城门，就能感受到拂面而来的湖风里挟着的清新水草味。他心灵里留下的故土田园风光，早就化作了他生命中悠长的美好回忆。我曾经想：

“也许，人杰地灵的吴江孕育才思横溢的费孝通是天赋的机缘，那么，这位走上巅峰的社会学大师世所罕见的神工鬼斧的创造力，又源自怎样的灵感呢？”

我从费先生的经历找到了答案。正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乡土感情，给了费先生灵感和启悟，培育了他关注现实生活状态和减轻人民苦难的责任感。否则，他会是受尊敬的学院内的大学者，但不可能是使人民感到亲切并被拥戴为自己杰出代表的学者型领袖人物。在近3/4的世纪里，他走遍广大的世界观察、调查，却从不曾片刻远离故土这块弹丸之地，梦魂始终萦绕在精神的家园。

当我从新闻传媒获知费先生亲自考察太湖污染整治，为太湖流域的人们操心未来生存环境的时候，我默默地心里表示了感激和敬佩。我们自己置身其间尚且麻木不仁，他却蹒跚着年迈的脚步操劳费神，我体验到一种悲悯的感情。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表达了深沉的担忧：我已经老了，将来是你们的，但你们的将来可能会比我们过得更艰难。他每一次临近家乡时，是不是都会

掠过这样的一丝愁绪，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不论费先生在什么地方，故乡碧绿的桑树、金黄的稻穗、蔚蓝的太湖，以及飘漾的白云下生动的小桥、流水、人家，常常会在他漫不经心的散步中；倏然涌到亲馨的随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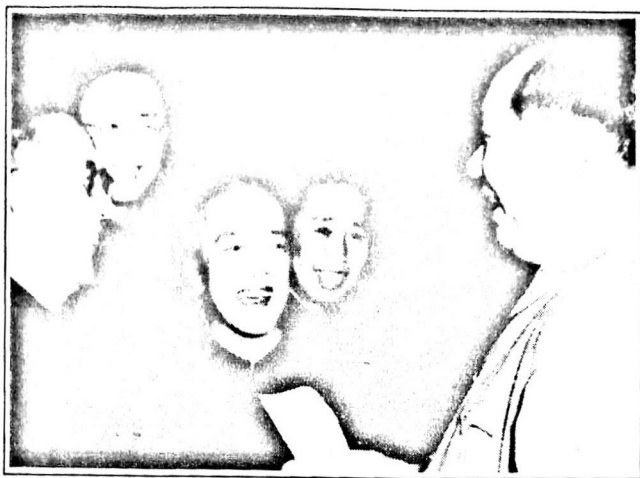
历史对于我们芸芸众生不过是一段极其短暂的沉默过程，在费先生却是辽阔的时空存在。我以为，人间赖以传世的载体有两种，其一是文字，其二是建筑。而后世的人们在阅览历史人物时；可以产生景仰感情的也只有两种人，其一是独善其身者，他们以自己的德性立于人间；其二是兼善天下者，他们以自己的智能恩泽人间。这两类人物往往并不以权力型行为建立功业，但人民往往将他们铭刻于不会磨灭的历史柱碑之上。费孝通先生正具备了独善与兼善统一的品德和人格，而且社会地位越是隆盛，他凝聚着德性和人格的社会价值就越是丰富。费先生的非凡和幸运，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失去真正的自己，他把自己平凡地置于民众的命运之中，以智慧为民众谋求富足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从未改变这种宗教般的虔诚。

当初，20岁的费先生从东吴大学的医学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也是经历了反抗、迷惘的。他希望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再好的医生也只能医好几个病人。”他认为来自社会的病比来自身体的病痛更加严重，而当时百

孔千疮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医生所能医治的，所以，他决心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社会的病。抱着这样的志向，坚定不移地实践一生，需要有勇气正视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实上，费先生的学术道路铺着亲人的生命和自己的鲜血，荣辱得失不足以衡量他的付出。我在《掌声中的沉思》里是这样描述费先生的情怀的：

“那条由鲜血和生命开创的路，还布着看不见的荆棘和陷阱。然而，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生存在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抗争中的，因为他是通过寻找社会的缺陷来发现社会前进的方向。对于他重要的不是什么荣辱，而是要对人生和社会有一个完满的交代。我愿意避开辉煌去平凡的艰辛中，思索对先生作为社会良心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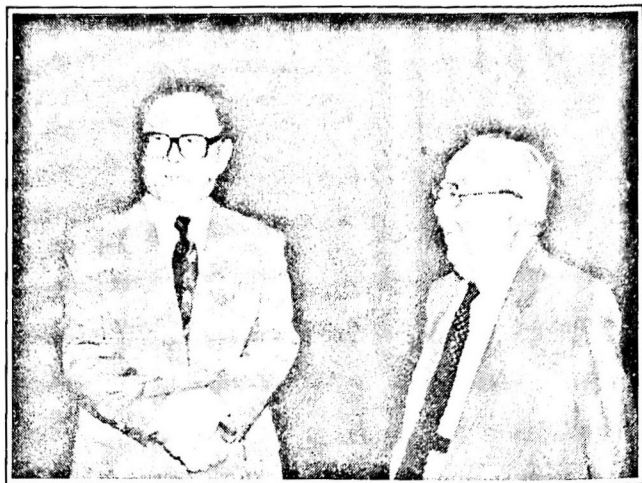
费先生自己也曾表白：“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见了。”在我看来，费先生也是在诉说忧虑，为一种浮躁的社会功利主义而深感不安。虽然说的是少数知识分子，但显而易见，同样的表现在其他阶层也并不鲜见。无论是治学济世还是治政济世，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面前，能否正视个人荣辱得失，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可以决定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命运。因此，费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



毛泽东和费孝通（左一）在一起



邓小平和费孝通在一起



江泽民和费孝通（左一）在一起

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

因为这样的清醒和坚忍，费先生穷尽毕生之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经国济世，特别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古稀之年，重建了刚健清新的中国社会学。用自己的学术观点，对社会的历史进程作出预见、倡导、并推动其发展。我从费先生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领袖会晤的情景中，为他感到一种欣慰：学术活动可以在社会进程中显示出伟大的贡献，而且是对世界上一个最伟大国家的贡献。这是学术的幸运，更是社会的幸运。

对费先生一生影响重大的是两个非凡女性。我格外看重这两人对费先生心灵和人格的影响。一个是他姐姐费达生，一个是王同惠。费先生每次谈起胞姐总是满怀

敬仰，直至耄耋之年还认为姐姐一直走在他的前面，想赶也总赶不上，在她的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我曾在费达生的出生地（也是费孝通母亲的家乡）同里镇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费家和费先生所敬爱的母亲杨纫兰女士的道德风范略有听闻。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家族，受到了普遍而长久的尊敬。记得我与朱通华先生一起拜望费先生时，谈到他母亲的名字，他就深沉地插一句：“谢谢。”这位首创蒙养院（即幼儿院）的当时妇女界先进人物，和她献身教育事业的丈夫，养育了五个子女，其中费达生和费孝通这对姐弟，使他们成为伟大的父母。费先生显然也以自己的家族为荣。一次他回到同里“娘家”，在退思园里兴致勃勃向中外友人讲述家史，对自己的“费”姓寻根究底、旁引博征，讲得神采飞扬。

费达生高尚的人格力量陪伴了她弟弟的一生，费先生时常把姐姐作为一面对照的镜子。费达生在家乡的庙港开弦弓村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丝厂，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实验。她为蚕丝事业义无反顾地奉献了一生。

王同惠是费先生心灵里一座女神般的永恒纪念碑。她是费先生志同道合的同学，和伴侣。他们共同的恩师吴文藻先生曾评说王同惠：不仅思想超越，为学勤奋，对学问有真正的兴趣，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

费先生与王同惠在蜜月里便结伴深入广西大瑶山，

实地考察社会组织。他俩在三个多月中，夜卧土屋，日吃淡饭，计划调查完毕，同惠回北京，费先生赴英国留学。未料在一个叫潭清的岔口，向导失引，迷入竹林。费先生误踏虎阱，自以为必死，王同惠力移巨石，使获重生，但他腰部和足部受重伤，不能起立。王同惠又赶紧出林呼援，临行还安慰丈夫。妻子通宵不返，费先生心知不祥，于荒林爬行一天，遇瑶人负返邻村获救，方知王同惠已失踪。在费先生萦回梦祈之际，半夜来梦告王同惠在水中，费先生恳请瑶人四出搜寻，到第七天才在急流的山涧找到同惠的遗体。她与费先生结婚之期仅一百零八日。费先生曾以锥心裂肝的悲恸，滴出血泪字行：“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在瑶



姊弟俩始终植根江村，老来推磨，享受着收获的喜悦，重温到艰辛岁月中播种的欢乐。

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求死不果，他视为系王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他之身以尽未了之责，他决心“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费先生就编写瑶山的

材料，以王同惠遗著的名义出版研究专刊。53年

后的1988年，

费先生又重新出版《花篮瑶社会组织》，

在封面上精心设计了王同惠

和大瑶山的照片，以志深情的永远纪念。

他在自己享誉

中外的名著《江村经济》

中，再次自白王同惠对他人生及学术的影



费孝通前妻王同惠女士

响：

“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着她。”

为了纪念和感谢王同惠，他第二次结婚后，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或称“小惠”。

他在与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回顾一生经历时，还以沉重的心情说自己应该死过三次，到现在还是活着，只能说是事出意外。第一次在瑶山应该死而没死。第二次在昆明，有位朋友把他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救了出来，有人要他死而没死。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认为不应该再活下去，考虑自杀但是没有去做。他不愿以被黜贬的负辱之身沉进永久的黑暗。

有过这样心路历程的人，他的灵魂就会旷达，而且坚硬，没有什么可以更改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毁灭他。他走出了狭隘的自我，其实，是回到了真正的自我，独立于历史的社会的风雨之中。因此，智慧就在痛苦的沃野上，耸立起人力所不可损益的风景。

当费先生的形象在我思想里已经丰满的时候，正好他在家乡举行学术活动 60 周年纪念会。虽然当时我在同里镇的政务非常忙冗，但感到在这样的时刻，应该对费先生表示自己的敬意。这个想法得到《人才》报责编吴爱民先生的支持，于是，我俩进行了两个特殊的活动。其一，去“江村学术”的起点开弦弓村，采访曾在

费先生家工作的农民邱纪珍女士。我们避开浮华，在宁静的江村亲历了费先生前后一贯的生活状态，在同一地点感受60年两极的生活。邱阿姨为我们描述了费先生在农家和自己家庭里的日常生活。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开弦弓村的一座小桥边，问正在河里撒网捕鱼的老民：知道费孝通吗？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说：“我去过北京费孝通家。”爱民和我怀着深切的感触，分别撰写了《平常的生活》、《乡情是桥》两篇文章来献给费先生。其二，我们又一起编撰了一期《人才》报纪念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专刊，值得一提是，我们作为费先生的两个乡里小辈，以自己对他的深刻理解和尊敬，为他的32幅概括了人生、学术和实践轨迹的图片撰写了富有生命力的文字。大概因为这期小报出乎人们想象地反映了费先生的博大，到会的中外知名学者们无不惊异并将小报收藏。

在隆重的纪念会谢幕后，费先生得到了休息和清静，我们与他相约进行一次如同老朋友的交谈。那个上午，他的思维比以往的访谈更清晰健朗，我们得到了一个多小时的特别的思想光照。

费先生将自己的许多次学术活动放在家乡，这使他作为一位世界级大学者与别的大学者们有了感情上的特别之处。学术，尤其如他从事的社会人类学应当是无国界的，就更谈不上“乡界”，可是他却将乡情包容住了莫大的世界。对此，他感到自己也说不清楚，“那很自

然的，不是特地做出来的。我回想回想，一生的成就和缺点都离不开家乡，我的学术是从家乡开始的。我是吃太湖水的，不是吃太湖水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他说到这里到了他的“报恩观念”：一个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来源，来自于什么人，就不可以忘记他们。

他对于这乡情世界的怀恋，当然是倾泻了一份诗意。在另一个场合，他曾说：“让我十分坦白地说，如果我能选择，我有理由宁可回到旧日，回到一个富有的又平均的农民的世界。那时我会享受和平的心境、稳定的生活和友好的环境。我会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享受有人情的生活。”然而，他明白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他由惆怅进而开始跟踪一种还不明晰的转变，即人们在发展中思想和做人态度的改变。

人们称之为接近现代世界的转变，费先生虽然不认为其结果一定完全更好，但是别无选择。在这种境态，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高级宣传员，摆事实说道理，描述和分析，并向掌握政策的人提出建议，他认为“实际上这是个非常重要和建设性的角色。”我最感到兴趣的，是费先生在孔林时提出的“新孔子”的思想，我以为这是个本质问题。

他用十分有力的语言说：“我说的孔子，是大孔子，新孔子，不是老夫子。是一个懂得现代人与人关系的孔子。现代科学使人与物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但怎么做？这个问题，以前靠宗教，而现在没有了那种力量，



1936年暑期，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命，在江南的一个平常村落诞生。他一开始就具备了走向世界的魅力——江村的名字，从此成了中国人类社会学的起点。

消失了，淡薄了。我国的孔子是个创始人，教我们怎么做。当然我们不是做孔子那时的人，是做现代人。”我觉得他的话语带出了明显的强调意味，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所以他的目光从人的生态切入到了心态，这是他晚期学术的愿望，也正与他早先要治社会病痛的初衷相合。

把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大话题，放在我们小小的吴江道来，并且是诉说给我们几个无足轻重的平民，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动。在我们这个面临人性灾难的悲剧时代，他那精华的前沿思想仿佛不时被一些类似于方式的



他们曾是多么的年轻。时常相聚，胜似闲庭信步，他们在对旧日的感怀中，共同展望未来。

学府已将费先生的学术列为必修课，也有许多外来学者研究“江村”和整个中国，但是我们的学者反而因为一些“理由”落后了。他的社会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江村经济》（原文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更

东西遮掩着，有一部分思索在我们理解中，给予我们启示，而那在我们理解力之外的，变成他深深的痛苦和遗憾。当我们幸运地可以在这个时代最早领受并运用他的思想时，就不能宽恕自己的愚昧和麻木，不能无视一个为了我们而谦卑的智者的博大和富有。

这种憾叹已经存在过。国外的许多学者比我们更早地乘费先生学术的“荫凉”，许多外国

能为我所接受)是1939年以英文版在英国出版的,以后被各主要语言国家纷纷翻译出版、再版,作为汉语却最后出版。而且是在已经间隔了令人痛惜的半个世纪之后。费先生自己虽然很平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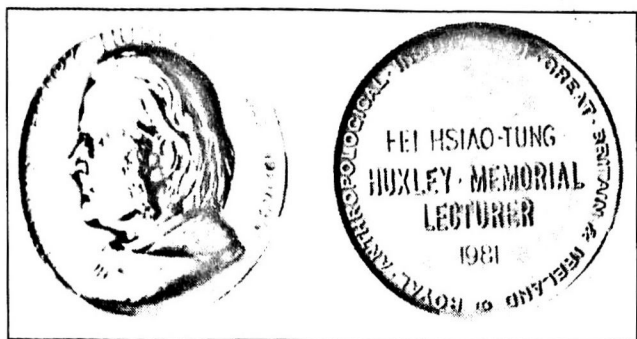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的开始,也就是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从此,江村人就不再见到他为农民的命运而面带愁容。但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的学术劳动,却使他多增一分憔悴。行行重行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留下了这位智者的足迹。

“过去都忙,我没有功夫翻译,解放后工作更多,1957年又成

了禁书，改革开放后才有了中文版……国外的学者很会吸收我们研究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了，而中国学者没有外国的接受得多。”但是，倘如费先生在他说的应该死的三次中谢世，还会有多少国人知道他的学术，甚至知道中国的社会呢？真正的问题在于，今天，又有多少人会对这种于政治、经济、文化“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学术思想有所了解，而不是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

我曾经以为，如果不是乡土感情的作用，中国也许会少一个社会学擎柱的费孝通，但仍然会有一个名作家的费孝通。他的家学渊源和学养，他的诗人气质也体现在他的学术文章中。40年代后期，费先生译、著的丰富使人惊讶，名声如日中天，举国瞩目。著名的《大公报》把他作为十六位名作家之一载入“作者及其作品”栏内，并把他的照片同胡适及巴金的并列排在头版。美国的《纽约时报》评价他为“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而《时代》周刊称他是“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他那活泼而独特的文字风格倾倒了中外学界，至今仍可从他的近作窥见其绰约的风采。然而，他始终寻梦般地眷恋着乡村，无法不回归农民之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第二位夫人孟吟是农村来的，她父亲是村民。他说：“我喜欢她是由于她有些我所缺少的东西，她单纯、有‘乡土气息’，她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在屋里屋外劳动。殷勤好客，这是在农村养成的



1981年，他获得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这表明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学者们怎样重视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将有赖于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性格。”他俩甘苦与共、相濡以沫五十五年，在夫人亡故后，费先生把不是吴江人的孟夫人骨灰，葬在自己家乡的乡土里。这是一种无比深刻的感情流露。他的第一位夫人长眠于大瑶山麓，第二位夫人安息于太湖岸畔，他的两个起点也是他的永久地，都在乡村，他以挚爱驻留在那里——宁静的和平和安全之所。

但他决不是乡土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是有着真正深刻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尊严的国际主义者，他的英国导师马林诺斯基对此表示过衷心的崇敬，马氏说自己不得不羡慕费博士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这是高山仰止的境界。同时，费先生出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责任，献身于对本民族的研究。

究，正如马氏深有感慨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类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

我对费先生观察别国别民族保持超脱、冷静、没有偏见的态度，也有一番体会。1997年6月24日，香港回归祖国前一周。费先生即将随江泽民总书记赴港参加政权交接仪式，我去电话至北京他的寓所，与他交谈对香港回归的感想。我问及他本人对英国在中英关系，特别是围绕香港回归问题的表现持怎样的评价，因为我曾读过他30年代许多关于英国的精辟政论文章。他坦率地告诉我：“我对英国是有感情的，因为以前在那儿念过书。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产生了一个大英帝国，是殖民主义的一个开创者，是西方最大的殖民国家。怎样结束他们的殖民主义，这是他们的问题。看来他们还可以，以和平的、协商的办法，解决了最后一个在东方的租借地。我认为他不错，不是说怎么好，他在人类历史上做的事情，害了很多人，但他现在自己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那么，我们应该说他不错。”

这样客观的评述，没有博大的胸襟是做不到的，他因此也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他以一个熟悉英国上层社会的社会学家的特殊身份，为中英关系和香港回归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他直接参加了与香港回归有关的工作，同时做了许多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其中不少工作主要还是靠香港朋友协助

做成的。他很谦虚地说，自己过去出去很多次，讲过很多话，写了文章，做了应当做的事情，尽了力量。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他还曾经把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卡拉罕专程请到江苏，实地商讨经济技术合作，在淮阴至南京的直升飞机上还遭遇险事。卡拉罕对费先生说：“你，做了让世界了解苏北的贡献。”

那次在香港回归前夕的通话里，费先生还表达了个人的愿望：站好最后一班岗，老了，很需要休息一下。有一次，我与他曾谈起写自传的事，他乐观而自信地说：“我自己写传还不到时间，但如要写，也不写自己，我要写的是与我同行的时代。”听说他快要退居休闲的消息，我感到欣慰，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留给了我们，超过了我们的期望。但我发现他仍然忙不得闲。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似乎在努力提醒人们：人正受到由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的威胁。但在类似我们能否拯救自己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们至今尚未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足够的进步以懂得不幸的根源及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世间弊病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理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祈祷中追寻解脱和安慰，而那些最富理性的智者在呼唤并帮助我们走出泥淖。我从费先生匆忙的身影里，感受到一个世纪老人的智慧和他飘忽萦怀的真实思绪。一次，我读到 he 一段让我深深感动的文字，他引用霭理士的话说：“我的一生



他坐在一个世纪将近结束的窗口，以常常深沉厚重的笔墨描摹未来美好社会的图像。

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芬的玫瑰。”这是他留在大地的风景，他得到了生命中梦寐以求的回报。

记得在我认识费先生的那个初夏，一封由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甘地签发的邀请书飞到北京，邀请他赴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会议演讲。这个创始于1987年的学术会议，两年召开一次，由肤色、国度各异的国际政要、科学权威、知名学者就人类发展问题贡献智慧和思想。费先生用整个盛夏，夜以继日，反复地思索、起草、修改，完成了一个对人类终极发展的思考——《对“美好社会”的思考》。他已经对人的研究花费了一生的岁月，现在，他于夜晚的暮色和黎明的曙光递嬗

中，坐在一个世纪将近结束的窗口，以深沉厚重的笔墨描摹未来美好社会的图像。此刻，当我想把他伏案写作“美好社会”文稿的情景予以描述时，它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这样一幅历史的留影：

一位银发苍苍的中国老人，拄着手杖，正走进一个美好社会。晨曦照在他的肩头犹如洒在山脊，为我们投下一片炫目的光芒。

我唯有怀着就像他对于我们一样的美好心愿，为正融进他自己书写在大地上的史诗的身影，表示最深情的祝福。

1997年11月2日

改于费先生87岁生日

钱国梁：将军吟归

运河岸边垂柳青
车如流水船如龙
黄梅雨过天晴朗…
稻绿花香晚霞红

是谁把江南的初秋吟得如此清丽明净？一幅动人的情景蓦然在我脑海里映现：运河之畔垂柳树旁正站着一位阔别故土的诗人，他陶醉，陶醉于乡野的稻绿花香，诗意萦怀。当晚霞胭红时，他忘情于宁静而亲切的风景中。微笑的脸上丝毫没有旅途的疲累，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易于触景生情的诗人，而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这是一个可以使所有江南乡亲为其感到荣耀的名字：

钱国梁。

他的身后，一片云蒸霞蔚。

他所走来的那条穿越时空的悠长历程，并不柔情婉约，而是壮怀激烈，铿锵地铺展着这

位中将司令员
播种和平的非
凡人生：

不论是投入
紧急战备，
不论是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
不论是军训大
练兵大比武，
不论是率部征
战疆场，从太
湖之畔到东南
沿海，从西北
大漠到西南边
陲，从华北平
原到渤海之
滨，在中国当



踏遍青山，站在高处，一望大地，山
川衬映出将军伟岸的身姿。

代军史进程中，几乎都有他的精彩表演。而他在四十多年的风云岁月里，走出了一条从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参谋、副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军区参谋长，到如今的大军区司令员的独特道路，由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走进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光辉行列，成为闪耀在中华民族历史天幕上的一颗璀璨的将星。

我曾有幸拜读将军的自述诗《征程回顾》，那每一行诗句都可以演绎成寄托我们向往的故事。但是，当他用深情的目光注视家乡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在我那美丽的家乡土地上，在那滋养诗歌和艺术的小桥流水的波光虹影里，竟第一次出现了一位睥睨刀光剑影的将军。

这是我最初接到将军手书所思考的问题，当时，我正在筹办《人才》报的创刊号，还不曾识见早已耳熟能详的将军。他获悉我希望他为创刊号题词的愿望，很快地寄来了函书，出乎意料的是，那绝不是惯常所见的高级领导题词，而是一篇文采斐然、见解精辟、热情洋溢的美文，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写得一手挥洒奔放的行草。在我熟悉他的经历之后，才知道这篇阐述人才观点的贺词，是他在赴泰国作军事考察后风尘仆仆归国的第二天写就的。编发将军题词的感奋之际，一位热爱家乡的儒将形象，顿时在我心里清晰而又高大起来。

钱将军的淳朴平凡来自田野。

不像那些外国名将出身显赫家庭或毕业于皇家军事学院，也不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辈将领，献身于枪林弹雨。进入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基本系、研究系三次系统深造和中央党校进修，是钱将军基层军队生活之后的经历。当他于1958年12月实现“童心仰慕解放军”的心愿，戴上红色帽徽领章的时候，已是有四年多地方工作经验的成熟农村青年，饱尝生活的苦难和劳动

的艰辛。

这是一个贫苦的家庭：母亲体弱多病，带着四个儿女，父亲是老实厚道的泥瓦匠，全家生计系于一身，但他手艺出众，名闻乡里。次子国梁在穷家孩子里更是显眼，因为他特别爱读书。父母当然没有宽裕的钱给他买书，他就去村里识字人家借别人读过的书，一直读到合住书本能一字不漏的背诵。不仅文学作品，就是鲁迅文论和深奥的古文，以及各种科普读物，也都研读得津津有味。平时下地干活的间隙，他照样潜心于读书，乡里人笑他是书呆子，他却说：读书越多越聪明，多读书就能多懂道理，多长见识，怎么会变成书呆子呢？富人家的孩子能读书，我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要读书，人穷志不穷。乡亲们发现他在孩子中与众不同，父母更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再苦再累也要供他上学。年少聪颖，勤奋攻读，使他中、小学期间学绩斐然，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又让他深受老师同学的喜爱。读小学时，学校里组织文艺演出，他演女角竟然维妙维肖。他从小就在学生活动中自然地表现出了不凡的指挥才能，周围经常聚集着一帮小哥们。14岁的时候，大哥因患肺病，无力医治而夭折，三弟随父学艺，四弟年幼，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回村从事计财工作。1958年冬天，18岁的国梁参军了。于是，村里少了一个有学问的青年，而军营里却多了一名英俊的战士。30多年后，钱国梁将军在一次苏南之行，追忆童年时，感慨地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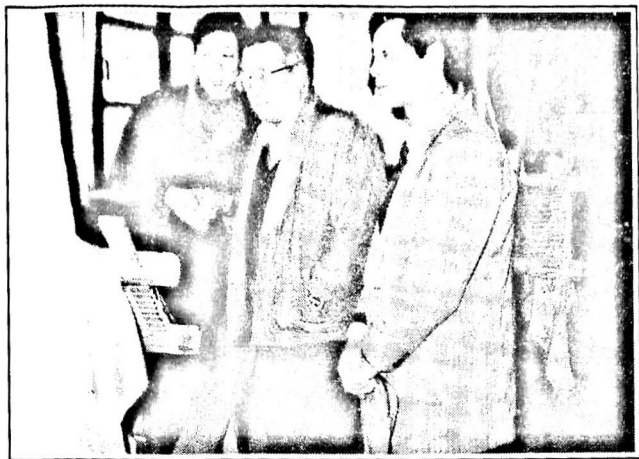
刚柔并济，文武兼备，奇妙地组合着他不凡的儒将魅力。

童心求知切 昼夜学不厌
家贫能成事 自勤得其乐
追求天下事 无往而不乐
只有青云情 依依相送别

钱将军嘴边常常挂着微笑。

那微笑真诚而儒雅，透着一股清澈的灵气，使人不知不觉沉浸到舒心的友爱氛围里。望着他慈眉善目的笑容，我想，他在指挥千军万马征战的时候，面临硝烟弥漫，嘴边仍在微笑，但伴着和平的畅想，那微笑的目光却有了震慑敌胆的猛力。

将军戴着眼镜，目力却异常敏锐，四围哪怕是细微的举动，都逃不过他的注意。在我交往过的人物里，钱



将军时刻关注着地方建设，对有关人民利益的一草一木，都倾注自己的爱心。图为作者陪同将军视察工厂。

将军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出类拔萃，令我惊叹。每当说起那些转业已久的老战友，老部下的名字，如数家珍；讲到一个偶然路过的小县城，竟能准确地道出地名和那些不为常人关注的特征，甚至民风民俗的细节。这使我想起了他在老山战区勘察地形的一幅照片。1986年金秋，他率部队奉中央军委之命，跨黄河秦岭，越巴山蜀水，赴老山作战。老山属喀斯特地貌，山高林密，雨多雾稠，地形极其复杂，他奉行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严密组织，精心指挥，灵活运用战法，在一年零七个月的作战期间，先后组织了数百次阵地防御作战、侦察作战、重点炮击作战，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

利，沉重打击了敌方的嚣张气焰，牢牢守住了共和国的每一寸南疆边土。树起了“胜利之师、威武之师”的军威，受到中央军委和邓小平主席的表彰。每次与他会面时，我都情不自禁地将他异乎常人的观察、记忆能力和镇守南疆、建立奇勋的战绩联系在一起。

他的脑海常是一个宽广的思维空间，时刻敏捷地捕捉着战机。然而，趁着战火中的余暇，他仍然保持阅读和钻研的习惯，即使行军途中，背包里的私人用品可以一再精减，而修身立业的书本是无论如何都要随身携带的。在和平环境，他也没有空闲走亲访友逛大街，忙于军务，忙于学习政治，钻研军事理论，研讨国防战略，回顾总结战果，惜时如金，通宵达旦。无论是先后参加的师、军、军区 30 多次军事集训，还是各种理论学习培训，从士兵到将军，他都取得了优良成绩。具备高度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是现今中国军队将领的特征，所以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撰写、发表的有关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军事训练、管理教育、调查考察报告、领导作风等理论文章达数百篇。这便是他所自律的“强我素质”。在以此为题的一首诗中，他替自己描绘了一个精进而上的坐标：

刻苦读书 求知成才

事业第一 淡泊名利

胸怀宽阔 待人坦诚

敬业尽职 勤奋实干

作风正派 一身正气
清正廉洁 严以律己
求同存异 团结共事
尊贤重才 甘当人梯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上不愧党 下不愧民

“他是一位很有头脑的人。”——这是一次我与费孝通先生谈起我们共同的乡亲将军时，费先生以这种少有的赞语评价了这位共产党的年轻将军。钱将军也曾两次跟我提到在1992年十四大期间与费孝通面晤时的难忘印象，并从这位大儒身上学到了终身受用的德行。所以我时常错觉般地在与钱将军交往中体会到费先生的一些品格。在为人上，钱将军特别表现出性情爽直，坦荡诚信，敢作敢为。他认为该做的事，从不缩手缩脚，并且，敢于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有时甚至代人受过。同时，他还是个爱提意见、爱挑毛病的认真的人，大至上级的政策政令、重大工作部署，小至某一战场上的攻防退守，以及有关群众利益的一草一木，只要发现问题，他那种固有的责任感会令他直言不讳，为正确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他身上时常体现出吃苦耐劳的坚毅精神，熟知他的一些师友们说这个人军事训练时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地形、天气，毫不含糊，和大家一样摸爬滚打，视破衣破皮为常事。他是一个真正从平地走向高

山的军人，与他共处过的人都对他倍加敬重。

经受磨砺的军人不仅应在自然环境中的坚挺，在另一片社会性质的风雨中，也应直立。我曾经读过将军一首能给人深刻记忆和启迪的俏皮诗，标题是《自信》：

你是你

我是我

夸我 捧我 吹我 抬轿 吹牛 拍马

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那么好

骂我 攻我 挤我 散布流言蜚语

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那么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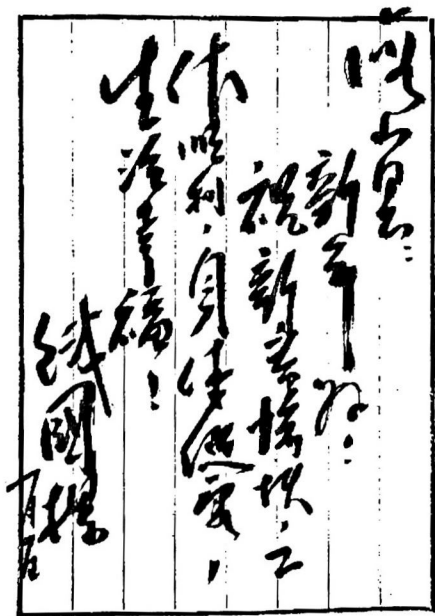
追求真理 注重科学

公正处世 诚实做人

1995年除夕刚过，南国正飞雪。

我在家乡向钱将军电话拜年。电话拨到他家里，说他还在办公室忙于军务。几次失之交臂后，我终于听到他浓重的乡音，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温暖。他说过年很忙，大年初一活动多，年夜饭准备的大都是家乡菜。那时，他是军区参谋长，每天的事务在日程上排得满满的。但这样一位日理万机的领导，却经常记着我这样一个平常人，往往是某个节日之前，在早晨六时半左右，我家的电话铃就响了，他那亲切随和的声音，从遥远的济南清晰地传给我，有好几次由家人接到电话，我却不在，听说后心里感到一些歉疚。

1995年初夏，我专程赴济南拜望他的情景今生难忘。从起居饮食到办事、游览的日程安排，他都给予直接的悉心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两三天逗留的时间里，他不顾公务繁冗，陪同就餐三四回。临别的那天早晨，原先他执意要在八时来招待所送行的，未料他临时改变主意，提前半小时赶来共进早餐，而我还在梦里，这使我们同行的几位家乡人感慨良久。就在那一次的晤谈中，他似乎不经意地获得了一次畅泄心中累积的乡情的机会，深情地说希望年内能回一次家乡。但是，那一整年他都没有机会作回乡之旅。直至1996年5月他才得空隙“潜行”而归，以解乡思。约了几位家乡的老战友老部下叙旧，那场景使我倍感将军情深意长。



久居北国的将军，依然保持着江南文人的传统习惯，他的书信，都是潇洒奔放的优美书法，令人倍感亲馨。

1997年金秋十月，钱将军在参加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五大后，悄然返乡巡视，赞叹家乡日新月异的神奇变化，并不顾旅途劳累和日程匆忙，放弃午休时间，相约会见，对我们表示关心。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最是那种渴望亲情的人。他把对家乡事、家乡人的关怀，作为思乡恋乡的寄托。而站在高处，一望大地，只要哪里还有硝烟萌生，军人是不应思归的。于是他只得常常抚窗南望，借诗吟归，这样的情绪便显得更真、更深、更美好。在一个国庆节，他正是如此忆思小弟国华的：

独在异乡
为国事 每逢
佳节倍思亲

虽知弟弟
在明珠 相距
不远难相见

至此，我已在本文泄露了将军太多的秘密，而其中最大的秘密恐



在宁静而亲切的风景里，将军沉醉于萦怀的诗意。

怕就是他写的诗。连很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不间断地写成诗的那些文字，虽然这于他也许只是为了表达情感与思想的简便。但将军的诗不轻易示人，更可能因为他过谦，久而久之便成了他的一大原则。他多次嘱我不要公开报道他的情况，但我以为这并非宣传个人，而是彰扬吴江人，让更多的家乡人了解他。

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思索着为将军撰文，却踌躇着不易下笔，我需要寻找一个正合将军身高又可以展现他风骨神韵的角度。难！当我从一位尊敬的前辈手里接过钱将军的诗稿（那是他从济南捎回的），顿然悟觉自己将通过他的诗走进与诗迥然不同的军人的绚丽多彩的生活世界。

即使写到这个时候，我仍然感到诧异：南征北战、铁马金戈，竟然始终没有消磨将军吴依软语的乡音（还时常道出纯正的方言），就像他豪放的性格未能消隐他的婉约柔情。刚柔并济，文武兼备，奇妙地组合着他不凡的儒将魅力。我每次收到他的书信，都是宣纸的书法，何以久居北国，却保持着江南文人的传统习惯？

无论怎样我都难以把征战时的骁将与这吟归时的诗人这两种形象，合溯到一个心灵淳朴如初的男子身上。而刚似北国之秋与柔似南国之春，在他身上自然的交融着，使他最终成为南水北土共同哺育的忠勇将才，守护着母亲大地。

倪征燠：海牙归来

多少年以后，当我步入衰老的岁月，曾经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人事，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我的回忆里？也许我会感到惶恐：无数个曾经令我幸福或痛苦的日子，早已消失了它们一度明朗或黯淡的踪影，无从寻觅。因此，我就想，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了他那个世纪里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他就会因了这样的幸运而感到富足。在我有幸邂逅的杰出人物里，倪征燠先生是最具“国际特征”的，没有谁能够精彩地准确描述他博览世界风云的丰富阅历。他那几乎穿越了一个世纪时空的漫长人生，点缀着许多值得全人类纪念的重要日子。

我无法追随他的身影回到那些历史的时刻和场景，但是，应了他友好的约请，我走进了他沧桑尽褪、归于宁静的普通生活世界，得以触摸已经化作历史封面、却仍然传递出新鲜信

息的世纪画卷。在北京著名使馆区东交民巷的高层寓所里，他的脑海会经常浮现出那一幕幕曾经是多么生动而对于我又是如此神秘的历史风景吗？

揪响门铃，开门相迎的正是银发满头的倪先生。我们相互都认出来了，虽然未曾谋面。在并不宽敞而异常优雅的客厅坐下。他显然精心准备过了，茶几上摆着香蕉、荔枝和饮料，坚持要亲手为我们剥香蕉皮。他说，家里白天就他一个人，女儿乃先傍晚才下班，中午也不回。我和爱民都是菀坪人，他思索片刻，说不知道菀坪，只记得小时候吴江是十八乡，黎里、震泽、平望等是大镇。我说父辈的籍贯是八都，这个地名他还记得。我给他解释，菀坪是1958年才建起来的，在太湖边上，然后，他想起来了，说今天的《人民日报》上有报道菀坪的文章。

他告诉我们，去年才回乡探访松陵镇。上一次到松陵还是1918年，是他在黎里“四高”上学时，到县里参加运动会。其间相隔了漫长的78年！他忽然笑着说：“我去年到吴江，没能见到你。你出差了。”他还记着这件事。作家吕锦华到北京时，我曾请她向老人问好，他也这么说过，后来锦华回苏州给我电话，转达了他的牵挂。我歉意地对他说：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来拜访您，您是吴江的骄傲，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我生于1906年，14岁离开家乡后，在美国就学3年，上海前后30多年，东京3年，北京30多年，海牙九年。”倪先生沉思着缓缓地描述自己的人生轨迹。

1920年，他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读中学，然后考入沪江大学文科。一次课余，他出于好奇去租界看会审，中外法官一起开庭，因意见分歧，外国法官竟野蛮扯断了中国法官的朝珠，这萌生了他最初学法律的念头。不久，他从沪江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

那是一段艰难的求学生活，一天到晚在三处疲于奔命。大清早，他赶到江湾持志大学文科上课，因为他决意留美深造法律，让中国人来治自己的法，而美国大学规定，攻读法学博士要有法学士、文学士两个学位。10时过后，又赶到唐山路母校澄衷中学教英语，以维持学业和生活。中午稍息，便前往昆山路的东吴大学上课。22岁时的倪先生同时在东吴、持志两所大学毕业，把家中分到他名下的几亩田产作抵押，筹措船费远涉重洋，赴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仅仅一年之后，就轻而易举地戴上了法学博士帽。往后的路就如一马平川，春江放排。正应了他小时候在黎里家的一段佳话：他8岁时就常和父亲对对子，一日，他在书桌上写了两行字：“今日藐乎一学童，他日中国主人翁”，父亲见了喜出望外，赞道：“此子今后非池中之物。”

跨出史丹福大学校门，倪先生来到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荣誉研究员，与在沪江大学就

已心仪的同学张凤桢久别重逢，她也正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和外交学。当张凤桢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倪先生与她的爱情也瓜熟蒂落，喜结良缘。不久，新婚燕尔的博士夫妇取道西雅图登轮回国，夫人执教上海大夏大学，他则在上海的东吴、持志、大夏三所大学教法律，夫妇俩都是上海知名的兼职律师。

北京的金秋十月，已经蕴着寒意。倪先生感到了午后秋凉，他从躺椅上站起，问我们冷不冷，伸出手掌让我们握，果然冰凉。他说要去书房拿取暖器（公寓里的暖气过些天才开放）。随他到书房，那里满目法律书籍，桌上摊着他正在阅读的外文书刊。阳光温情脉脉，我们就在狭小的书屋继续徜徉在他从容的回忆里。

倪先生曾为了生计，在南京司法行政部任“编纂”。未几，又回上海，担任上海特区法院理事。1943年1月，在英美等西方国家被迫宣布放弃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100年的“领事裁判权”以后，他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院长。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部长对他说：“100年的束缚被解除，法权完整了。你留学美国，又在上海特区法院办过许多涉外案子，能称职的。”两年后的盛夏，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倪先生乘美国军用飞机离渝赴美考察司法。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沿着美国东海岸绕了一圈，观摩司法实践——看美国的法官如何开庭、采证，以及庭审的规模、仪式等。之后，顺道访问了英国

伦敦、法国巴黎的司法界，于1946年6月乘坐“格兰恩斯德号”商船启程归国。《美国和英国的司法制度》这部著名的考察报告，是他这个时期法律研究与考察的杰出成果，与他后来最著名的《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国际私法》（翻译）及一系列有关海洋法的著作一起，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重要参考资料。

倪先生远离祖国的日子里，中国迎来了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但是，一个为受尽战争屈辱的中华民族伸张正义的神圣使命，等待着还没有踏上国土的他。就在他离美前的一个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个日本战犯开庭审判。中国司法当局最初以为东京审判只是过场而已，没想到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动了真格，审判完全按英美法律行事。国民党当局毫无准备，证人不足，大多未持证据，被战犯律师以“无证人资格”驳回。如果没有证据，纵然是罪恶滔天，战犯也会被宣布无罪开释，国耻难洗。当时，仅次于东条英机的罪大恶极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的审讯已交给菲律宾检察官，因为美国人认为中方拿不出犯罪证据。

倪先生返国到南京司法行政部述职时，正遇上自东京回来“告急”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曾经两度共事的向哲浚要求司法部长请倪先生出庭相助，因为就对英美法律程序熟谙而言，国内无出倪征燮之

右。倪先生当仁不让，事关国家大局，岂可退缩。令他感到愤慨的是，受了多少年侵略，牺牲了千百万同胞，司法当局竟连证据都提不出，简直是视国耻如儿戏。

他以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同时也是国际检察团成员身份走马东京时，检察起诉阶段已过，进入被告（日本战犯）提出反证阶段。倪先生根据英美法律原告可在被告辩护时提出“反诘”补充证据的规定，建议检方提取证据、见缝插针、适时提问。他找到国际检察团检察长季南交涉，改变东京法庭原先的决定，将日军原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从菲律宾检察官手里移交给中方审问。当时，日本关东军在华活跃的中心人物、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采取特异立场，不亲自登台陈述，以使中国检方失去与其辩论及在辩论中提出罪证的机会。倪先生决定利用审理板垣之机揭露土肥原。他要求美方协助取证，经麦克阿瑟批准，查阅了被美军调封的大批日本陆军省档案，夜以继日，历时7个多月，获取了大量罪证。在审理板垣的决战时刻，倪先生将四亿同胞的全部仇恨集中在势如破竹的“反诘”之中。形式上是核对事实，实质上重新提出罪证，看似控诉板垣，实际上土肥原也难辞其咎，使日本战犯为之震慑。长达48000余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载入了这一非凡的经历。本来出于美苏对峙考虑，美国打算从轻发落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最终与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倪先生在他的书房，平静地透露一个当年世纪审判中的秘密：“东京审判的3年时间内，大家都废寝忘食。我准备了，如果战犯们从轻发落无罪开释，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只能跳海。那时，我40岁。”

东京载誉而归，国民党政府先后以司法部次长、最高检察长的高位相聘，他都拒绝了。他宁愿退隐，回到宁静的书斋。

1956年，草长莺飞的暮春，兼任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总理电邀时任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的倪先生入京，他挈妇将雏，束装就道，就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从此与外交结缘。

我问倪先生：“听说周总理那时多次向您专门移樽就教？”他笑了：“他那时兼外交部长嘛。”1958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避暑，望着蔚蓝而辽阔的海面，中国的领袖考虑了又一个震惊世界的问题。主席把总理、乔冠华和倪征燠，请到了北戴河，共同研究了海洋法。那是新中国最早的有关海洋的法律条款，不久，中国政府宣布，我国的领海宽度由3海里扩大为12海里。

1971年深秋，纽约联合国总部飘起灿烂的中国五星红旗，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倪先生作为联合国二十七届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更显出其特具的国际法学修养与才能。以后，他参加整整开了10年的国际



倪征燠先生（右二）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国际检察官团代理检察长戴文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一起工作的情景。

海洋法会议，从加拉加斯、日内瓦到纽约，400多条卷帙浩繁的国际海洋法，倪先生是一条一条逐字逐句推敲琢磨过的。

“在外交部，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外交上的法律问题。身为外交部的法律顾问，纯外交的活动也参加。”他对我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他就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外交活动。“另一种状况是，做国际法官时，也参加外交活动，凡是请外交官的活动，都请法官参加。”他的叙述，为我揭开了他经历的又一辉煌篇章。

荷兰王国的海牙城，素有“和平圣地”的美誉。这座风光秀美的城市以海牙会议和联合国国际法院而驰名世界。海牙和平宫的 15 个大法官席位是国际司法界的最高荣誉，而历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对国际司法界的贡献，以及国际法院在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更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后的 35 年间，中国法官无一能够进入这块圣地。候选国际大法官的标准极为严格，须品格高尚且在本国担任过最高司法职位、或被公认具备国际法学家资格，经由提名，并获联合国安理会及大会分别郑重选举，在若干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始能膺任此一庄重崇高的职位。1984 年 11 月 7 日，联合国安理会及大会分别举行投票，在 12 名候选人中，补选递补任期届满的 5 名国际法官的遗缺，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家倪征燷博士，在安理会中以 14 票的最高票数，在大会中以 104 票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这是国际社会对倪先生和他的国家的双重评价。国际社会在评述他荣膺国际法官的意义时认为：“从此足见中国当前的开放政策，已在国际间被获致至佳的反应，倪征燷博士在国际法官选举中之获提名与当选，实是中国受欢迎进入国际社会的又一明证。”

倪先生向我介绍了中国人做国际法官的历史知识：“抗战胜利后，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

民党先后派过两人到国际法院，第一位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徐莫，当了一任多一点就死了。后来派顾维钧接任一年，一年满后又竞选一任。之后，联合国没有中国人任国际大法官。18年之后，1985年我任国际法官。我去海牙的时候，是79岁。”

1985年2月2日，倪先生偕夫人张凤桢飞赴海牙履新。2月6日，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法官迈着与他那高龄所不相称的稳健步子，跨进了和平宫的大门，他有一双慑人魂魄的眼睛，满头白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庄严的誓言，在那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圆圆青铜色尖顶上久久地回荡：“本人郑重宣言，愿秉公竭诚，必信必忠，行使本人作为法官的职权。”此后9年，他代表强盛的祖国，更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公正和和平，举起手中的法锤。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用诗为好友不平凡的旅程送行：

尚忆黄龙审战犯，
闲指明月看樱花。
沧桑历尽翱翔去，
淡泊从容莅海牙。

当一个人站在世界上，他就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倪先生初到海牙国际法院，有大量工作要做。国际法院成立于1946年，他要搜集多种资料，了解历史的和现

实的情况，还要和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互访，与当地的人民建立感情。每年可以有2次回国休息探亲的机会，但他在任上9年除因会议外平均每年只回国一次，大量的时间留在工作上。国际法院的许多工作实际上都在平时的交往互访中进行，相互交流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待到举行全体会议时，基本已达成了统一看法，只是举行一个仪式而已。他因而格外注重平时与多位法官的交流与往来，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敬重。

在国际法院，每次判决书的起草都是一项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因为起草人必须是大家公认的有一定威望且能代表多数意见的人，同时，起草的文字要逐字的推敲，并包容多数人的意见，要通过全体法官的一读、二读，还要限时修改。倪先生经常被法官们推举为文件起草人，每年起草很多判决书，直到后几年因年纪大了，才稍微减少了些。他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的信任，更视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声誉的好机会，中国法官开始在国与国之间运用自己的职权，是多少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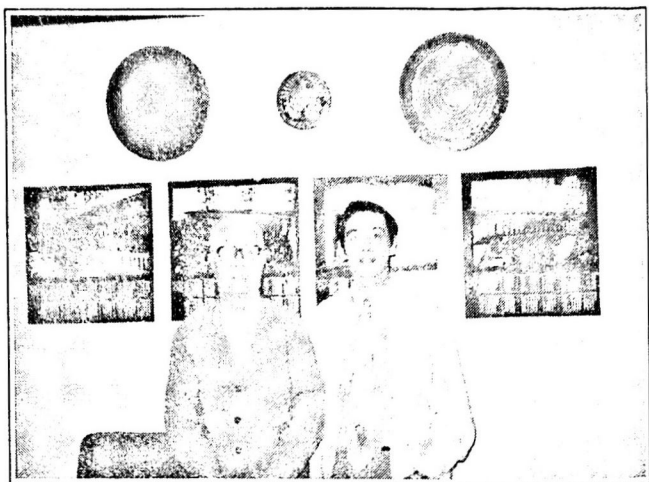
追述往事，倪先生说在海牙实在是忙。“案子来了，看起诉书，看状子，然后开庭。评议是最激烈的阶段，针锋相对。起草委员会是3个人，草拟判决书，由15位法官相互交流，再评议。联合国使用6种语言，是中、英、法、俄、阿拉伯和西班牙语，但国际法官只用

英语和法语，互译较困难，都是法律专用术语，而每件案子都有不同的特点。”

荷兰有许多华侨，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印尼华侨文化层次就高一点，另外大陆在六七十年代也去了不少浙江籍的华侨。华侨都建立自己的社团，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每次被邀请，倪先生不管多忙都要腾出身来前去赴约。他觉得，这些华侨由于多种原因不熟悉祖国，参加他们的活动正是宣传祖国的机会，可以培养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感情。而他也在这样的交往中熟悉了荷兰的风土人情和华侨的风俗习惯。

他在海牙时，曾经以个人和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在海牙国际法院任期内的三任院长中的两任院长访问中国，在上海举办世界法律大会，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法律外交树起友谊的丰碑。而他自己却始终兢兢业业，为人谦诚，有时去别国开会，尽量不惊动那里使馆的同志，总是悄悄来又悄悄去，不给他们添麻烦。即使偶尔回乡探亲，也只歇息黎里亲戚家，不露踪迹。从古镇小巷走向国际法坛的大法官，就是这样恪守着自己高洁的品质。

倪先生对人说过：“我从来就不是个新闻人物。我在国内当法官时就好象进了和尚庙，与周围的人很少接触，我最怕人家找来走后门。”然而，正直淡泊的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崇敬。他指给我看挂在书房墙上的一排



作者在倪先生的书房。墙上挂的是国际法院的圆形徽章。

年历，那上面的图像是国际法庭的实景，每年一张，每张图景中都有倪先生的坐像。我看到他在国际法院的座次，从马蹄型的一端越来越靠近中间的位置。

倪先生书房坐椅的上方，居中挂着国际法院的大徽章。有一次他给我写信，信封上就印着这个海牙和平宫的徽记。两侧分别是他自己身着大法官衣帽的照片和夫人张凤桢的遗像。他深情地缅怀亡妻，她已在1988年冬天病逝于海牙。

张凤桢也是位既要强又有才华的女子。30年代，她与《我的一家》的作者、著名革命老妈妈陶承有过一段很深的友情。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给中共地下

党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陶承（化名“林太太”）一家那时就住在倪家附近，但并不相识。凤桢女士敢于直言爱打抱不平，一次看到一个印度人深夜毒打中国籍的老婆，便不顾自身安危前去阻止。“林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知道了倪家夫妇的为人。后来，“林太太”的女儿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焦急之际匆匆登门找凤桢，凤桢当即允诺为她安排探监及法庭辩护，并四处奔走营救。因倪夫妇当时已不再是执业律师，又另请好友、著名大律师鄂森代为出庭作义务辩护。女儿获释出狱后，“林太太”一家即不知去向。20多年后，已定居北京的倪先生无意中读到《北京晚报》连载的《我的一家》，才恍然大悟，那位神秘的“林太太”就是陶承。此后，倪家与革命老妈妈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1986年，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人在长沙溘然长逝。凤桢女士也在一年多后长辞夫君娇女，在异国乘风羽化。

我告诉倪先生，我读过他在夫人火化后写的悼文《亡妻事略》，哀婉凄恻，令人感动。凤桢女士临终前留下遗愿，一切从简，不发通知，但国际法院、驻荷使馆、新华社驻荷记者及华人、华侨团体代表，闻讯自动致送花圈、花束，并向遗体告别。荷兰王国比亚德里斯女王、外交部长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等都致发函电吊唁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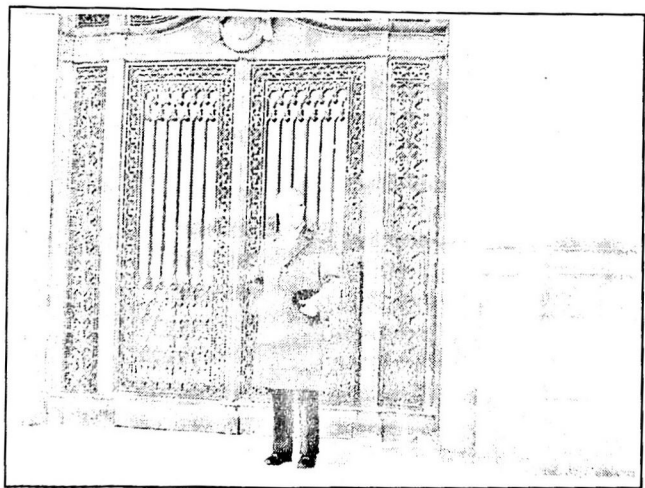
夕阳西沉，暮色已在窗外朦胧。倪先生不无人生伤

感地说：“我这一辈人剩下的不多了。吴江熟悉的同辈中，还有柳无忌，他在美国，比我小一岁，上小学时低一级。他的身体也弱，是白面书生。”他回忆起柳亚子，在平望镇听过亚子先生的一次暑期义务学校讲演，当时，诗人还念了岳飞的《满江红》，倪先生至今印象很深。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忆道：“同学们也所剩无几，台湾还有一个桂裕，曾同去东京参加审判，任顾问，现在还与他通信。”

已经过了 90 寿诞的倪先生，慈祥和蔼，常人不会把他与威严的大法官形象联系起来。他是幸运的，因在外交部工作，历次运动中身心摧残比同辈们少些。海牙归来，他有了清闲的时光，每年到处跑跑看看，去了峨眉山，看了长江三峡，绕京九路一趟，又上井冈山、庐山。他小时候身体并不好，青年时期也没有时间锻炼。到北京工作后，年过半百才开始爬山，和一位同乡结伴，每周爬一次香山，风雨无阻，坚持 20 多年至赴海牙，打下了健康基础。如今，他还是全国健康老人。

倪先生字哲存，字如其人，他虽然做律师、法官，却不善于高谈阔论。但他爱好昆曲，差不多欣赏了一辈子。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时，“新乐府”（后改“仙霓社”）是十里洋场的唯一大型昆剧团，只要有他们的演出，倪先生与秦瘦鹃这些同学，再远也要结伴而去，以致与那些主要演员无不相熟。及至曲终人散，踏上归途，他们还还为昆剧的曲高和寡、知音无多发些感慨，或者对传字

辈名艺人生活的清苦表示惋惜。后来，他甚至邀请朱传茗、方传芸、郑传鉴教授读词度曲。解放后到北京，还参加由知名女票友周铨厂及沈从文夫人张允和等组织的昆曲研习会，于假日一起度曲遣兴。及至老年痴心依然。一次，上海昆剧团赴京演出，他为欣赏一出《长生殿》的《迎像哭像》，临时站在戏院门口等退票，恰巧遇上蔡正仁、华文漪，才把他接了进去，两位昆曲名家对这位年高学优的前辈如此热爱昆剧而感动。蔡正仁是倪先生的同乡，被誉为“小俞振飞”，倪先生临行海牙时什么都不带，随身而携的是蔡正仁的两盘录像带。异国他乡，且看且听由乡亲表演的昆剧，于品咂高雅的祖国艺术韵味之际，家乡的小桥流水人家，该是如何栩栩



倪先生在荷兰海牙和平官国际法院门前。

如生地在他心上散发着温馨呢。

他说，他最近唱过四次昆曲，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录像录音。倪先生还从听戏、唱戏中，做出了一番学问，原来许多戏曲都与司法有关。《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和《玉堂春》等，说的都是司法审判。他认为《十五贯》的启迪是，当法官的人，不可凭一时印象草草判决；而《杨乃武与小白菜》则表明，表面看来没问题的案件，也许蕴藏着更深的问题。还有一些戏曲是讲外交官的，如发生在贝加尔湖畔的故事《苏武牧羊》以及《蔺相如》等。如今他依然津津乐道小时候欣赏过的家乡春台戏——那是多么幸福的梦里水乡的夜晚。

我注意到倪先生书桌上放着几个放大镜。他看出了我的询问，说：“眼不好，看得慢”，他指指一堆文书，“虽然整天在家，时间还不够用。看书的时间不能太长。”国际法院还寄呈判决书给他，是他原来的荷兰籍秘书寄的，虽然已不再参加意见，但他的关心一如既往。

我很想请他写一部回忆录，夕拾朝花，把他壮阔的一生留给我们，终于有些不忍心。让他在静静的生活里享受思想的快乐吧，那种精神幸福，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因而无法保有健康的人生。当我们懂得并学会欣赏自己思想的时候，这位经历瑰奇的老人，便会在我们永存的感念中留下悠远的阵阵涛声。

程开甲：核子星座

我走近那个简陋得几乎没能构成庭院，却仍然挺耸起一片绿荫的门庭时，炎夏的阳光炽热得令人目眩，以致我骤然难以辩清门户的方位。这使我联想起住在里面的那位耄耋老人，也像太阳的核子聚变一样，闪烁着煌煌耀斑。

他说他没老，从没想过老。我相信他自己的话——上次拜访他的时候，一个秋天的黄昏，他和我隔着落地台灯在客厅里晤谈，那异乎寻常的机敏思维，如灵动的闪光，让我感到惊诧。

我们重逢在他的书房。

对于外界的人们，这是一个遥远的无从知晓的境界。他在这里从事着天才的神秘创造。一缕缕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在书桌上跳动。

我一时陷入了困惑：在这间可以听见蝉鸣的屋里，坐在对面的儒雅老人，就是那位被人

传诵得十分神奇的“核司令”物理学家。他已经被历史藏匿了几十年。人们评价他时，甚至无法用语言称赞，只能概括地描述。

他能够准确地告诉你，中国拥有多大当量的核能：核动力、核报复力、核威慑力。……至今，谁都无法评价他对祖国的科学贡献。

其实，对任何科学家价值的评价，永远为时过早，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期待。他对科学奥秘的揭示，与我们崇敬的那些伟大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价值相比，并没有程度和性质的不同。他的姓名在世界物理学界，早已不是秘密——程开甲院士。

程开甲生于1918年8月3日，在江南那正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季节。程家祖业兴旺，盛泽镇石板铺成的巷里，许多挂着蓝底白字商号的店铺，都是程氏家业。程开甲出世，祖父给他取了个意在光宗耀祖的名字，但老先生来不及抱到宝贝孙子“荷官”，就乐极生悲，卧床气绝。荷花爆出莲子，等待开甲的是苦难的童年。母亲是破落官宦之女，父母双亡，由祖父高价买来给儿子做妾。偏房的儿子是低贱的，开甲和母亲一起遭受奴役和屈辱。

母亲每天跪在河岸捣衣，呆望缓行的乌篷船，唱起悲歌。父亲死后，那飘荡在市河上的歌，就更悲凉了。一天，小荷官放学归来，母亲给他洗澡，搓背，换上干

净的衣服，又给他穿袜换鞋。最后，塞给他几个铜板，抱着他泣不成声。母亲走了，踏上乌篷船去了，留给八岁小荷官的是一支悲凉的歌：市河水呀静静流，乌篷船呀慢慢走，长橹咿呀地摇呵，摇动满河的苦愁……

月亮远离他，太阳的温暖也未能透过水乡的雾霭投射到他身上。他在家人的冷眼中，变得愈加孤僻。因常常挨打、挨骂，又变得胆怯。有时逃学，逃到孔桥上，抱膝而坐，望着摇橹而行的乌篷船，企望有一艘船傍岸停下，走出他的母亲。

世界冷落了他，他也想逃离冰冷的世界。

他终于出逃。靠着母亲留给他的那几个铜板，逃到上海。流浪上海街头，他等着黄包车夫拉着洋太太们路过，抛下她们吃剩的东西。但他又怕捡，怕捡了食物被哄抢的丐儿们毒打。倒是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要。那是一本《代数》。坐在路灯下看，他不知不觉进入奇妙的天地。

我现在聆听着开甲先生的深情回忆，试图从他平静的脸上，探寻苦难留给他心灵的烙印。诗人说，对于苦难，回忆是诗，但我知道，承受决不是诗，许多诗人因为痛苦，唱出了他们的杜鹃之歌。一个科学家的苦难和悲伤，影响他们灵魂的该是什么呢？我无意比较艺术家和科学家之间的创造模式，但我在探究程开甲与其他科学家的创造力时，却发现了他那罕见的独特之处。托马

斯·赫胥黎曾说：科学家过了 60 岁，不可能期待他有独特性的思想。本世纪最著名的一位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也认为，爱因斯坦若在 1925 年之后以钓鱼度过余生，对科学并无甚损失。而程开甲超越了科学界的这一条规则。

半个世纪前的 1947 年，程开甲初见海森堡。发现了通向量子理论大门钥匙的伟大科学家，他也是程开甲导师马克思·玻恩的学生。他来英国拜见恩师，玻恩向他介绍自己的得意门生程开甲。程开甲甚为惊异，面前这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竟是个相貌堂堂、风度倜傥的人物，谈吐举止，不仅风雅，还很严肃，席间谈起新奇的超导，出口就像上帝说话，语调颇为威严。

许多金属或合金在某一转变温度 T_c 以上丧失电阻，并具有完全抗磁性的现象，出现所谓超导电性。超导是一种迷人的自然现象：导体被冷却到绝对零度（ -273°C ）附近时，突然出现电阻完全消失，从而处于不耗电和不发热的状态。在这个诱人的理想境界，超导可以使电力更节省，电脑体积更小，火车时速达到 300 公里以上。超导电性现象的物理机制，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兴趣。寻找能在高温状态下工作的超导体，成了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形成了科学史上罕见的竞争。海森堡认为，超导电性来源于纯粹自由电子之间库仑的相互作用，与产生超导电性的介质的特性无关。

这位 22 岁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天才，没有想到

自己与恩师谈论高超学问时，竟然有人暗暗摇头，于是，顿住话头，凝视程开甲。

玻恩见状，抚颌而笑，对两位学生说：“一场交锋不可避免了。谁的犄角最犀利呢？”

“我想，这位先生早在您这儿磨砺牛角了。”与爱因斯坦坐而论道的海森堡，表现出毫不在乎的神情。

“也许我的表现失礼，请原谅。”程开甲对导师和海森堡笑道，“我确实不敢苟同海森堡教授的高见。”

“请赐教。”海森堡惊目望他。

程开甲很坦率，“我以为，超导不可能与晶体格子无关。”

两年后，玻恩的学生克劳恩·福克斯等人到爱丁堡参加玻恩主持的1949年物理学会，玻恩向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们鼎荐程开甲，让他登上世界物理学讲坛宣讲论文。他的论题，恰与海森堡一样，意思却是相悖的。海森堡仍坚持己见：超导与晶体格子无关。他则认为有关，而且以明晰的概念侃侃而论，使听众万分惊异。

会后，海森堡笑着与他握手，说：“上帝赋予我们同等聪明的脑瓜呀！”玻恩在一旁笑道：“我想，上帝派给我的学生，无一不是人类最需要的天才。”

“先生过奖，我不过是初学。”程开甲谦和地说。海森堡突然严肃起来，对他说：“研究超导是很困难的，要很努力，细致才好。”

然而，程开甲与海森堡一旦相遇，还是争论超导。

从爱丁堡争论到牛津大学，依然各持己见，导师玻恩也难裁决，当然玻恩是倾向程开甲的。

他们又争论到瑞士苏黎世大学，玻恩没去，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泡利主动做裁判。听见他俩在教室里争辩激烈，矮胖的泡利居中端坐，边听边笑，末了狡黠地拍拍脑门说：“先生们，我将与你们形成三角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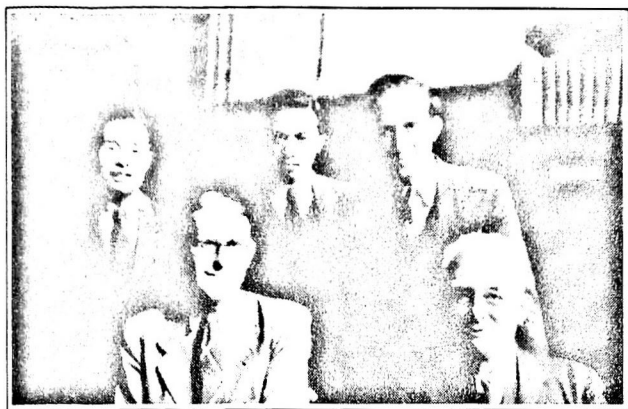
过后，泡利果真与迈斯纳、索未菲抛出 BCS 理论，认为超导是在电声子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库伯对位机制，1957 年这一理论公布于世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程开甲与海森堡关于超导的论争，引起苏黎世研究者的关注。玻恩曾试探他：“你还坚持自己的理论吗”他坚定地说：“是的，先生，我准备和不同观点的人争论几十年。”

直到今天，程开甲仍然坚信：正如海森堡在研制原子弹时采用重水的方案是错误的，他的超导理论是失败的。

那是日耳曼民族的天才和中华民族的天才进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论争。一个中国学子与世界级科学大师争论的佳话，其历史影响并不仅在曾经微微震动欧洲的物理论坛，更在于将来也许会导致一场对超导基础概念的修改。程开甲极有信心面对挑战。

1986 年秋，转变低温在液氮温区的高 T_c 超电体的发现，动摇了 BCS 的相关机制长期统治超导领域的理



程开甲先生（后左一）与核物理学大师马克思·玻恩（前右）在一起。

论， T_c 高温已远远超出了 BCS 理论所预言的极限。物理学界出现了各种观点的高 T_c 超导理论百家争鸣的局面。程开甲说：“超导理论一片混乱，搞到没理论了。”他在年近古稀之年，重新论证自己在四十年前提出的超导理论，并对现有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数学推导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推导和数学计算，指出已有理论的基础经不起推敲，尤其是证明了 BCS 的基态不是最低能量态，拆对能隙根本不存在。他比以往更完美地解释了自己关于超导的“双带模型”理论：

“超导体具备两个相继的能链，其中一个或者接近空，或者将近填满。前者有很少的电子作为载流子，后者有很少的空穴作为载流子。当这样的载流子浓度适当

低时，布里渊区内的平衡分布可能出现对称性的破缺，这种动量空间对称性的破缺导致超导电性。”

他在《超导机理》的论著中，准确而完整地描述系统的特性。他写道：“应用超导双带理论能够解释许多重要的超导现象：为什么周期表中的单价元素都成不了超导体，或者说为什么单能级的元素决不会是超导体？为什么在元素周期表中，从表的顶部经过中部再到其底部，元素的位置越低，超导元素就越多？为什么两种非超导电性的元素以适当比例组成合金后有可能变得具有超导电性？……”

他笑着告诉我：“世界超导研究走错了路，我要把它纠正过来。”他自豪地强调：“因为我的观点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必定是正确的。”

他将中、英文的《超导机理——双带理论还是成对理论》，分别题签，赠我留存。中文是由他女儿漱玉翻译的，这是程开甲目前为止仅有的3本专著之一。我想，也是他继50年前与科学的巨匠海森堡，现在更是与加上泡利等几位科学大师的再次较量。

超导电性问题在程开甲的头脑持续保持了半个世纪，直到完整揭示它的秘密。这种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创造力，令我想起歌德历时60年直到晚年犹在续写《浮士德》的情景。由于超导机制所具有的重大科学意义，这也许将是世界科学史上显示理论思维威力的范

例。

和许多大科学家不同，程开甲不是神童，早期的天智似乎还很愚钝。那个孤僻胆怯的孩子，把“ 5×5 ”说成积数“10”。同学们笑他“阿木林”。他在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座位上坐了3年。

他生活中最早的重大事件是看到了一本书。从那本科学家传记里，他知道了牛顿、爱因斯坦。他对我回忆道：“我读到牛顿晚上是不睡觉的，读爱因斯坦也是。他给了我榜样。初中时代的校舍里，每晚照例是9时熄灯，熄灯后，我就躲到厕所，就着昏黄的灯光阅读到夜半12时。天天如此。”

凄苦的童年，苦吃够了，吐出苦寒的芬芳。他四年级未完，已念完五年级课本，于是跳班读六年级，又读完了初中的代数，以优异成绩，考进嘉兴秀州中学。在那里训练了数学记忆，平方数从1到100，圆周率到60位，他都熟记如流，以致到老年时，无论平方开方还是圆周率，看题就说得出数。他甚至连课本都背，肯读了中学课程，就预读大学课程，把美国加州的原版课本也找来读了。

秀州中学是所普通的教会学校，却培育出了数学家陈省三和物理学家李政道。像程开甲院士这样隐姓埋名的科学家，秀州中学也许还不了解他卓越的贡献。

他用在学校当辅导员时积蓄的光洋作旅费，奔赴上

海，历时一周，报考了浙江大学和交通大学两所大学。结果考上浙江大学物理系，而且是第一名，他连夜乘上乌篷船离开了故乡。

赴浙江大学上学不到两星期，上海沦陷，日寇进逼，程开甲成了流亡学生，随学友们从杭州到天目山，又从江西吉安到广西。流亡路上，他依然日夜捧读，赢得了又一个绰号：“程 BOOK”。听苏步青的几何、陈建功的微积分、束星北的理论力学、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程开甲的智慧之花已经含苞欲放。

束星北是研究相对论的理论物理学家，经常活泼生动地提出物理学的前沿问题：

动的年轻，静的就老么？

同一原子，衰变期不一样么？

他的问题很有趣味，比如太阳对地球和月亮的引力，比地球对月亮的引力大，月亮为何围绕地球而不绕太阳转呢？

程开甲的回答，也深使先生满意。先生一旦有空，就托人叫他去讨论《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先生开玩笑说，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相对而论罢。有时，从黄昏，相对到月落龙江。

程开甲还去数学系听陈建功教授讲学。听了后，他独坐龙江岸边，冥思苦想，推导出一个公式，叫黎曼保角变换定理。陈教授甚为赞赏，寄到英国推荐给铁虚墨虚教授。英国教授当时没有收到，后来发表在数学书上

了。

束先生知道后，也托人约他到龙江岸上散步。鼓励他学好数学，因为物理现象要靠数学描绘，数学，也是打开物理奥秘的金钥匙。束先生第一次呼唤他：

“开甲，去打开原子核之门吧。”

20多年后，他真的打开了那扇神秘之门。

在广西宜山的岩洞里，他听到了王淦昌教授的核子论。他忘了自己还是二年级学生，挤进了四年级的门槛。程开甲的脑子里，骤然亮出一个问题：

如何说明 β 衰变中极弱的作用？假定有个十分重要的重介子传递作用，其质量为205个质子质量，作用距离极短……

王先生非常赞赏他的创见，即向当时在湄潭访问的英国学者约瑟博士鼎荐，请博士将论文及信转给狄拉克教授。

这一设想虽然粗糙些，但和后来的弱电统一论证一样，程开甲预言了物理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不知为何，理论权威狄拉克未予重视。王先生鼓励他：“世界上的事物那么复杂，多一些粒子也是合理的。”师生合作，写出《基础粒子的五维理论和质子的质量》，寄给《物理评论》发表。

建立一个理论，如同创建一座圣殿般艰难。王淦昌教授告诉学生：“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

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年薪 700 英镑。

程开甲在苏格兰的中苏友协看到了中国炮击英国皇家炮舰“紫石英”号的纪录片。玻恩从他的喜悦里，知道无法挽留这位中国学生了，欣羨而凄惋地说：“您有祖国呵，回到您祖国的晨曦中去吧。”

他想取道美国回国。玻恩劝他绕过那个鬼门关，说：“别自投罗网吧。”

玻恩讲起美国阿尔斯特特种部队去德国俘获他的学生海森堡、帕斯库尔·约旦等物理学家的趣闻。

“他们认为我的学生都是原子弹专家，自然不会放过你。”玻恩苦笑道，“上帝太偏爱美国了，世界会倾斜的。”

程开甲安慰玻恩：“放心吧，我的祖国将会使世界恢复衡态。”

我问开甲先生：“您是否是中国第一个知道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人？”他说：“可以这么说。”当时，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张震寰从一面严密的玻璃窗后观测核爆的光闪，可是，没有见到光耀，以为爆炸没有成功，而程开甲从核爆测试仪器上，看到仪表指针骤然剧跳，准确地判断是原子弹的爆炸。“那样巨大的当量，只有原子弹爆炸才会产生。”他微笑道。

程开甲于 1950 年春撕碎了英国当局给他的无国籍证书，取道直布罗陀海峡，经亚历山大港，穿红海抵亚

丁，过孟买、锡兰，上新加坡、进香港，回到祖国。旋即到浙江大学任教，不久又到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大学物理系成立核物理研究组，潜心研究高压状态方程和费米·汤姆斯统计理论，这是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重要研究。不久，一个秘密调令把他悄然调入中国原子弹研究所任副所长。

他从物理学界神秘地消失了，而在世界物理学大师玻恩的从事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学生序列中，继奥本海默、泰勒、海森堡、福克斯等人之后，又增加了中国的彭桓武、程开甲。

原子弹的奥秘，最初似乎都隐藏在根据苏联援华专家的片言只语、一个圆圈、几条弧线整理出来的那个以零和奇数为代号的绝密文件中。它犹如上帝的谜语，仅理论设计攻关，就使科学家们苦思苦想两年多时光。

年轻人问程开甲教授：“能猜破上帝的谜语吗？”他想了想，说：“天才的钥匙，并不都是系在外国人的腰带上。”

程开甲的灵敏才思不断地奔泻而出。据说，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提出一个设想来要求开论证会。原子弹的结构太复杂了，涉及百多个科学门类。在长着芦苇、马齿苋和野蔷薇的原子弹研究所大院内，一群中国的科学精英，忍受着饥荒和比饥荒更严酷的折磨。一次，程开甲把自己忘了，他走到一排宿舍门前，看到人们在睡觉，批评他们午睡，年轻的科学家委屈地说，这是晚上

呀。他顿然大悟，自己还没有吃午饭。

一天清早，夫人发现他面对黑板坐着，轻唤不应，摸摸他额上，烫得她倒抽一口气。他累病了，需要枕在妻的肘弯小憩片刻。

程开甲不时有着关键性的科学建树。他悉心研究过的费米·汤姆斯统计理论，现在成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科学计算方法。这是一把金钥匙，能在原子弹的迷宫中，打开一扇扇神秘的门，找到一条条的通道。

他在参与理论设计攻关的同时，还关心爆轰物理试验。由于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密切相关，他常常要到长城外面的第一个爆轰物理实验场去。他研究过的高压状态方程，正是在这个实验场得到应用，为闯过原子弹引爆的第一道难关做出了贡献。他还研究内爆聚心中的精度问题，提出测量中子的理论计算。

1962年春，程开甲受命组建研究小组，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作技术准备他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制订大试验的技术方案和准确的时间表，制订涉及众多门类、学科及全国千万个厂家与部门研试生产的总体方案。程开甲小组挑起了历史重任。在人们至今还铭记着的程开甲对核试验工地初创时期的卓越贡献里，还有他把援华专家原定的空爆改为塔爆，论证有线测控比无线电测控可靠，等等。

当时，他还曾提出安全观察距离的建议。遗憾的是，领导过于谨慎，未予采纳，要参试人员远离爆心



程开甲先生悉心研究过的费米统计理论，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金钥匙。

60公里，在零时前一分钟内统统趴下，面贴漠土，等响声过后抬头望时，辉煌的光闪已消逝，只见隆隆升腾的蘑菇红云。

在世界上，大概只有马克思·玻恩的学生，“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看到过这种猛烈爆炸的奇观。他曾为此吟诵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中的一段：

漫天奇光异彩
有如圣灵显威
只有一千颗太阳
才能与其争辉

现在，我们在开甲先生安宁的寓所，谈论 1964 年 10 月 16 日那场曾经波动全人类心灵的罗布泊震波，他显得很平静，以哲学家一般的格言说：

“人类的发展道路并不是自主的，是客观形势逼迫的；科学的发展，也是逼上梁山。”

当他对科学预见娓娓道来的时候，我想起他对核试验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预测。在一次核试验中，同时有两架飞机前后飞行，前面的飞机投测试弹，后面的飞机投氢弹。周恩来总理问他：“安全问题如何？”他当即对氢弹的当量、风速、放射性等一一分析，郑重地告诉总理：“安全完全可靠。”总理又问：“开甲同志，多大年龄啦？”谁知，这个问题竟使他楞住了，久久没有回答上来。

科学是逼上梁山，譬如以核武器捍卫和平，当然也包括以科学建造人类幸福的圣殿。他有着一个科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极其宝贵的忧患意识。他说：“太阳多少万年来留给地球的能源，人类两个世纪差不多用尽了，五十年后将面临能源危机。”

他于 1985 年夏天，离开生活了 20 多年的戈壁荒滩，回到北京的寓所，回到历史的座位，继续他中断了多年的对超导的研究，但不仅仅是为了继续与海森堡的论辩。他要以自己的超导理论研究及对物质材料的科学探索，向太阳取来新能源——像奥林匹斯之神普罗米修

成八重态。

他在应用费米统计理论计算状态方程后，提出电子在原子边界上的势能不应该为零，并作了电子自能作用的修正，可以把 T-F 近似下的状态方程延拓到 10 万巴左右的低压区。1991 年，又进一步从整个系统的维里定理出发，导出了一个不显含势能的状态方程的计算公式，避开对势能作许多人为假定，使状态方程几乎在全压区域内保持 7% 的精度。

程开甲先生似乎自始至终处于思维创造的活跃期，犹如核子的剧烈运动，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威力。漱玉女士对我说过：“他的点子层出不穷，我的思想跟不上他。有时，夜里还要起来几次论证。”我问她：他为什么采用英文写作？她说：“速度快，但是电脑键盘依然跟不上他的思维”。他始终没以煌煌巨著录述科学创见，在一生中他有整整四十年时间组织、领导核试验，没有时间考虑核物理之外的东西，更没有时间著述。这是科学的损失呢，还是收获？也许，仅仅是核研制、核试验的许多重要贡献，就足够他载入科学史册，他的许多成就至今还是国家机密呢。然而，只要可能他就不会停止对科学进步的思考。我无力解释他老当益壮的创造力，那不仅是责任或兴趣。我只想问：您从自己的高度，看到了一个未被发现的“真理的海洋”吗？

我注意到开甲先生书房内的两样东西：一张贴在墙上的字幅，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制怒、冷静、不



程先生的书房里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美气息。

着急、休息”，是他的自诫，实在也是性格和精神的写照；另一样是刻着“曲阜”字样的树轮片，上面绘着孔子像。他告诉我，孔子像是从山东带回的。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开甲先生忽然讲了一段《论语》，是孔子与最亲近的弟子之一曾参的对话。（孔子说，参呀，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基本原则来贯穿。曾子说，是的。孔子离开后，别的学生问曾子，老师的话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学说，是教人尽力而为成为真正的自我，以及在自

我和他人之间引出相类似的东西。)

乍听，我未能悟过来。毕生实践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却诵出一篇儒学的为人之道。他坦率地笑道：“我是相信孔孟之道的。我几乎经常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剔除了糟粕以后，不见得比外国的差。那种思想的奥义，对科学也是适用的。”

闲暇的夜晚，开甲先生暂停紧张的思维劳动，沉浸于祥和，让心灵寄寓到人文精神的光辉里，是一个怎样动人的景象呵。它可以触发对一个杰出物理学家的丰富想象。

告别开甲先生父女，我回首观望那座依然在阳光灿烂里的房子，感觉到开甲先生渐渐消失于我的视野，像是又隐在了他的神秘世界之中。

汝信：哲人闲话

汝信先生是知名哲学家，见他面不容易，繁忙的行政事务挤走了他哲人的闲暇。他日常的思考，已经不是所喜爱的哲学问题和美学境界，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务工作。在他亲自与秘书——她显然也因了我们的来访而忙碌——共同安排的特别时间里，他以一种少有的清闲，随和地聊叙一些平素不愿意谈的话题。

虽然我对哲学家有着不寻常的敬仰，但经常认为哲学是不幸的选择，那种痛苦而沉定的思维，也许宜于平静的雅致书房，却不适合“运动”迭起的时代——哲学的理性光辉徒劳地投射在现实的迷障上，个中治学的甘苦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我倒是为汝信先生独特的哲学研究而感到欣慰。

我记得他曾经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的哲学家，大学学的政治学，副修经济学。18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



汝信先生以少有的清闲，在办公室进行哲学的沉思。

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只是由于教会大学规定，必须选修有关宗教学的课程，便选了徐怀启的“哲学与宗教”，才受到哲学的训练。那时，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会与哲学结人生之缘。

第二年冬天，汝先生随上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赴朝鲜，当兵团政治部的秘书和英文翻译。跨过鸭绿江，他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参加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到三八线。艰苦的行军中，他成了彻底的“无产者”，随身用品丢了精光，转移到后方时，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留下的物品中还侥幸保存着一本书——俄文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那是在出国途经沈阳时从国际书店买的，希冀在朝鲜战场上用来提高俄语水平。

没有想到这个捡自战争的偶然机会，使他迈进了美学的门槛。

在防空洞内微弱的灯光下，他以初学俄语的粗浅文法知识，逐字逐句地啃《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翻来覆去地捉摸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有时简直如同猜谜。阅读的同时，他还硬剥生吞地花费心力，把这本美学名著翻译成中文，他不知道当时已有了周扬的译文。但在这个幸福而艰辛的过程中，他理解了“俄国的普罗米修斯”，并为其伟大的人格而感动。于是，他将这位俄国革命先行者尊为自己的第一位美学导师。

本来，哲学与美学是融汇交贯的，大哲学家就是大美学家。汝信先生由美学而初窥哲学的堂奥。当时，国内结合研究美学哲学的，只有朱光潜先生。从朝鲜回来，经过5年的硝烟，他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做行政事务工作，凭着24岁年轻人的朝气和干劲，在业余时间开始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他牺牲了几个星期日的休息，写成一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社会政治观点的论文，当时最关心支持不知名青年作者的《文史哲》杂志给予刊出，鼓励了他研究哲学的信心。有鉴于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汝信先生下决心在1956年投考贺麟先生的研究生。贺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学贯中西，曾任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授，是黑格尔研究的权威专家。贺先生收下了这位自谦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他系统地重

新开始阅读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读黑格尔——这是一个气魄宏大、包罗万象的体系。

但黑格尔著作中真正使年轻的中国“黑学”研究者喜爱的，只有《精神现象学》和《美学》。而这给他的启迪已经够了。当汝信先生成为当代黑格尔研究知名学者后，深有感慨地评述：“《精神现象学》晦涩难懂，但确实思想丰富深刻，它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百看不厌的成功艺术品。我把它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一起，并列为法国大革命时代德国精神的光辉体现。至于黑格尔《美学》，则以它的博大精深使我认识到在理论研究中讲空话的无用。”

他从黑格尔美学扩大到研究整个德国美学思想，往前追溯到鲍姆加敦、温克尔曼、莱辛、康德、赫尔德、席勒和谢林为首的浪漫派，往后延伸到叔本华、尼采直至哈特曼和海德格尔。他惊叹道：“在近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具有如此发达和丰富的美学理论。”当然，他仍然不能忘情于他的美学启蒙老师，比较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黑格尔之后，写出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与后来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黑格尔范畴论批判》等，都是对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研究的成果。

做贺麟先生研究生的第二年，汝信先生由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局转入哲学研究所，自此与这个所一起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风云。50年代后期，因为黑格尔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联系，哲学所集合国内几位专家，专门研究西方哲学作为“新学”，使他得以继续增长哲学知识。与苏联论战时期，他参加周扬挂帅的中央写作组，在两年多时间里，专题研究和撰写“人道主义”的篇章，以“书”的形式出版论战的系统理论。“文革”来临，周扬被打倒，一场“以反修为名假批判”的运动，使他成为“爪牙”人物被揪出哲学所业务圈。而哲学所的“业务哲学部”，一时间也风潮汹涌，只是由于周恩来总理出面阻止，才避免了解散的厄运。文革结束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分离出来，胡乔木担任第一任院长。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科学重见天日，汝信先生精神抖擞地进入了活跃而繁忙的重要人生阶段。

1981年，他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大洋彼岸度过一年平静的光阴。他在美国接到了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任命，此前他是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回国后又兼任了几年的所长职务。继而，又成为以胡绳为院长的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虽然已经没有时间继续旧日对哲学和美学的具体研究，但需要他“研究”的领域更宽了，院内30多个研究所要分管好几块，还要了解多门学科的研究状况。从他在国内外社会学术机构兼任的职务，可以约略追踪到他匆忙的身影和荣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哲学人文学理事会，他从1984年到1988年连任两届副主席。东

德解散后，他是这个国家的院士，他的思想里依然珍藏德国哲学家们的精神财富。以研究和平、战争和难民问题为己任的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独立委员会，由每个国家一名政界或学界人物代表组成，我国选派他作为唯一代表参加。韩国启明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

在国内，他是李岚清负责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复旦大学、河北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名誉教授。是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社科院情报学会会长，在王朝闻之后任中国美学会会长。

汝信先生生于1931年的上海，父母是吴江人，所以他一直以吴江为籍贯。1995年他第一次回吴江，此前还是解放前很小的时候返过乡里，他到黎里老家看了，但不知道旧居所在。一位老先生认识他的父亲，把他领到旧居，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就在柳亚子故居的隔壁。

哲学家一般有艺术爱好，他果然喜欢音乐，而且是西方古典音乐，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他姐夫桑桐原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姐姐汝洁是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校长。他的夫人夏森退休前在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他在研究西方美学史时，曾经强调必须注意研究艺术史，要具有对艺术的鉴赏能力，最好是实际参加某个方面的艺术实践。有人干脆把美学称为艺术哲学。他这样说：“了解一种哲学，可以通过书本，但要了解艺术则非通过亲身体会不可。对贝多芬的乐曲，你必须亲耳去听，对印

象派的画，你必须亲眼去看，才能作出审美的判断。”原来，这也是先生的经验自道。

汝信先生是中共十四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大代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理论方面有独到造诣。我曾拜读过他回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文章。尽管只是偶尔浏览有关政治内容的电视节目，却有幸几次从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见识汝信先生显目的风采。回想起那次在他办公室所作的哲学之外的寻访，我从他平淡的闲话中似乎略微体验到了他的哲学人生。

冯新德：快乐院士

我相信全世界拿到冯新德院士名片的人不会很多，但是，冯院士的名片，与他本人一样独特而洒脱，有名士风度。正面是中文，只有姓名和籍贯，没有头衔。标明籍贯，当然是出于乡情，同时也就不会与其他同姓同名的冯新德混淆了。而且，这张名片是一次性的，纯粹是纪念品，因为上面没有地址、电话，若非他有意结交，写下地址、电话，即使拿到名片也无法与他再联系。82岁的人了，还这样会“玩”——花样玩到了小小的名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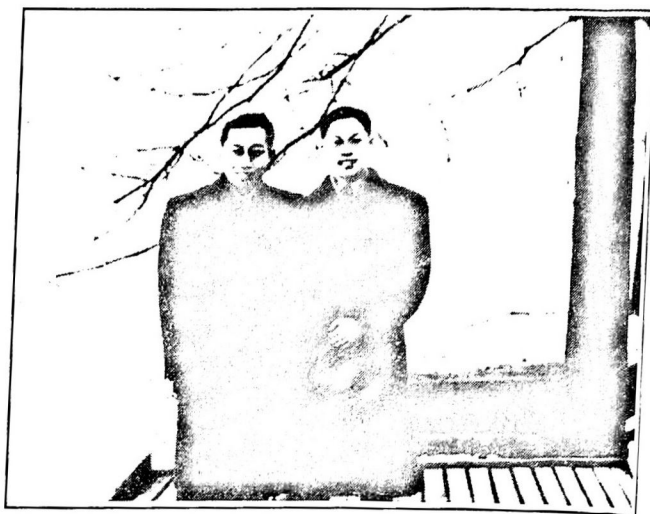
冯先生属于玩世不恭的天才类型，像他那样玩得痴迷的科学家世所罕见，他似乎不会为了某个理性的概念而皓首穷经、呕心沥血，但是，你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他轻松自如的横溢才华。平素与他再熟悉的人，也捉摸不透他的奇特，看到他的时候，总是在交际玩乐。他交往的许多洋人朋友，说他时髦潇洒，却不明白

他的本领得自何方神灵。他像是一道难猜的谜题，让人困惑。

还在十来岁的时候，冯新德就喜欢一种叫“叠罗汉”的游戏，几个人搭叠起来，个子最小最机灵的小孩在最高的一层，他往往是叠在最高层的。校园里的双杠，也是他专门玩耍的用具，一有空闲就在上面人猴似地翻来覆去。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是一所教会中学，礼拜天必须做礼拜，这使他难以忍受，便转学到桃坞中学，摆脱了束缚。

正义的行动，他自然也不愿意错过机会。“9·18”学潮闹起时，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出发到南京请愿，在火车道上卧轨，还被抓到兵营关了两天。不得不再次转学到上海的东吴二中。之后，不知什么动机，他又再转学到浙江湖州的东吴三中，读了半年书，毕业回家。

冯先生出身于江南名镇吴江同里的书香之家。古镇的历史上溯唐代，富庶一方，骚客辈出，他父亲是当时同里的一位雅士，做过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学生，善西洋画，擅长昆曲、胡琴，琴棋书画俱通。耳濡目染，他幼时学会了素描、绘画。启蒙后，在乡贤任味之办的丽则女学读小学。任先生是在古镇上建造了江南名园“退思园”的任兰生之子，与冯家是亲戚。丽则的同学中有任味之的外甥，还有一位叫吴清源，冯先生后来怀疑他就是到日本的围棋宗师吴清源，一度悉心打听，但至今尚未证实。



风度翩翩的年轻时代，好学会玩，是他与众不同的潇洒。1947年冯新德（左）与清华同班同学王世宾在美国南湾。两人后来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家仍然闲不住的冯先生，报考了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可能由于这是东吴有名的一个专业，总要不失时机地赶一点潮流的他觉得不能错过。待到入学注册时，发现学校规定念化学系的一定要修生物学，才感到了恐惧，因为他最怕蠕体动物，平时妹妹玩耍他，将蚕宝宝放到他颈项上，可以把他吓得掉魂。所以冯先生只好存着转学的念头硬着头皮念下去，不满一年他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二年级插班生，转到清华。清华对于他的好处是可以不念生物学，不交学费，而东吴学费昂贵。

及至进入清华，冯先生发觉清华学生与苏州东吴不太一样，一是不修边幅，二是拚命读书。到了十九岁，此时，他才终于意识到念书是怎么回事，以及图书馆与它的座位是多么重要。

清华大学规定，学生要学游泳，他虽然来自江南水乡，却怕游泳时耳朵进水，同学们认为不可思议。他找到一个诀窍，如果进器械体操班，可免修游泳，幸而体操是他的强项，在东吴时修炼的根基不差，于是入了涂文教的体操班，晚上上课。逢到清华校庆，他作双杠表演，校刊上还介绍说从东吴转来的小将身手不凡，哪知这在他幼小时就是拿手好戏。

清华毕业的时刻，遇上“七七事变”，他和另外两位同学报考研究生，北京不招收，北方各大学正纷纷南迁，于是奔赴上海。战时火车不通，设法乘上专车莅沪，未料上海也不招研究生。他回到已由同里迁居苏州的家里，但并不住在家，搬到母校东吴宿舍。闲暇无事，心血来潮叫上一帮同学，坐了22辆黄包车，浩浩荡荡从苏州乘到同里老家，尽兴而归。继而奔到南京又往长沙，在一个开酱油厂的亲戚家做化学“实践”，制造味精，使二级酱油变为一等品。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昆明，在云南大学执教。昆明的美丽，给他留下了终生缅怀的好印象，那儿的树都是笔直的，四季如春，每个夜晚像中秋之夜似的明朗皎洁。

平常人尽可如此打发一生，在 25 岁前就有念过几个大学经历，足以聊慰余生，而冯先生不过是牛刀小试。不久，他转到重庆，在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任教。时值重庆大轰炸，校园荒乱，校长的心思用在活动当参议员上，学校欠薪三月，他自告奋勇作教员代表向校长交涉，结果不欢而散，他丢给校长一句话：“不是你走便是我走”。结果校长并没有被赶走，他只好离开沙坪坝自找出路。

彷徨之际，看到报载浙江大学招考化工研究生，旋赴遵义，做了该校化工系主任李恒寿教授一学期的研究生，初遂心愿，再当讲师教有机化学。有个当时的学生回忆他的第一堂课，说“走进教室步上讲台的一位满脸书卷气、身着一袭长衫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便是我们的教师冯先生，他告诉我们读有机化学要记忆与理解并重，从复杂中找系统，从零乱中找一致，从片断中找连缀，事半功倍。”其实，他并无教有机化学的经验，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恃才傲物，不知道系里有全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后来知道了就不愿意再执教这门课。但在浙大他培养了自己如何教书的才能。

他一生进过四个大学念书，他认为东吴大学教他怎么玩，清华大学教他怎么读书，浙江大学教他怎么教书，还有一个美国诺特丹大学教他怎么研究。而立之年，他考取教育部英美奖学金公费留美研究生。到诺特丹时，正值寒假，他又想转学依利诺斯大学读农化系，

正巧遇上在力里制药公司的清华老学长陈光旭。陈光旭告诉他，著名高分子化学家普赖斯即将到诺特丹大学研究院当化学系主任，此人年轻有为，非常出众，千万别转学。于是，冯先生决意报考普赖斯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出色，普赖斯收下了他。

高分子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也刚开始研究，普赖斯教授以 36 岁年龄入主化学系，自见非凡；教学之余，普教授亲自带冯学生参加美国化学会年会，步入国际圈子见识学术世面，同时让他作美国通用轮胎与橡胶公司研究员，实践研究成果，冯先生不负导师栽培，连续三年获该公司提供的奖学金。普教授在以前的化学实验时炸掉了一只手臂，携学生外出，一手开车，一边漫谈。冯先生得导师指导，完成了《氯代乙烯基苯的合成、聚合与共聚合》博士论文，奠定了日后宏图大展的事业基础。

美国求学未满经年，清华送来聘书，邀冯先生完成博士论文后回母校任教有机化学。因此，他不及与众多洋人朋友畅兴游玩，匆匆而别，坐船离开旧金山，经一路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一月余抵达上海。时当 1948 年深秋，国内战争导致上海与平、津水陆交通俱断，只好搭天津搬迁工厂去台北的空船，携新婚夫人，由沪赴津，经五昼夜航行，船泊天津，但仍无车前往北平。在天津盘桓一周，只好雇私人破汽车送他们到清华。在化

学馆上课不到一月，清华园即告解放。

他在清华大学首次讲授国内第一堂高分子化学课：聚合反应。那时，他神采奕奕，是国内唯一研究过高分子的化学教授，潇洒倜傥，一身笔挺西装，戴金丝边眼镜，一口流利的英语，学识渊博，讲课机智幽默、引人入胜，很快成为清华同学最敬仰和欢迎的教授。他这样诱导自己的学生：“现在给你们分别圈起一块地，靠自己去刨。开始可以到处刨，找到了东西就要深挖下去。”

教书育人是一门艺术，冯先生博采国内外的先进方法与经验，施行独特的教学方法，把这门艺术运用得有声有色。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固然极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出人才。他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卓越的高级人才。例如台湾化工业的奠基人大都是他的学生。有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洛莱参观他的教室，对他的学生们做毕业论文产生浓厚兴趣，要求到实验室观看论文实验，因为冯先生对毕业论文训练的重视有口皆碑。中国化学会曾就他培养人才的功绩，授予他育才奖状。

在清华做教授的同时，他还兼任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化学系基本上并入由沙滩迁来燕京原址的北京大学，于是，他到北大开设高分子化学课，筹划了一座新的高分子化学实验楼，招收高分子化学研究生，并在北大创建全国第一个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亲自担任主任达三十余年。

冯先生自18岁走进大学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他所走过的每步，都伴随着一个大学的名字，他先后兼任过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感光研究所的研究员，当选中国化学会理事兼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还担任了日本京都大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主编的《中国高分子科学》（英文版），既是外国专家的科学论坛，又被誉为中国高分子研究的前沿。

北京大学是冯先生准备安分守己以至终老憩息之所，初期还不很自在，念念不忘清华的景、清华的人。留在清华的教授曾用三轮车接他到清华上课，并带研究生，他又重新回到水清木华之园。

冯先生颇受洋风熏陶，却又深具传统文化素养，自诩是不花钱的“公子哥儿”。无论是做外国人的客座教授，还是做首都的科技顾问或中国石化总公司顾问，一样的谦诚而不失清高。若是自己没有独创性的本领，依附于别人，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半世纪前在美国的时候，他就觉得国与国之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义气，只能做一个世故的朋友。

冯先生不愿意妄自菲薄，他以为在中国被他推开了神奇之门的高分子领域，科研的水平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他的许多杰出贡献中，自己最满意的成就是聚合反应，它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应用领域的科研成果，即功能高分子研究的得意杰作，是用 PEU 材料制成的临床心脏导管（人工心脏）、反搏气囊等，以及可以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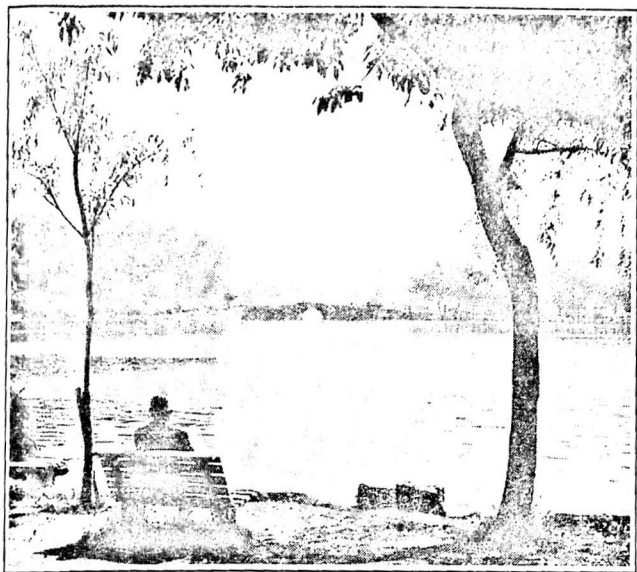
概也出于这层关系。为了留住那种美的意境，冯先生曾买过一些照相机，但只买普通的，在家里或亲友之间偶尔摆弄。并一度迷上了拍摄郁金香这种美丽的花，从北京到上海、杭州，直至跑到荷兰，对照之下，觉得还是杭州的郁金香最好。

在普通人的爱好里面，他独钟足球，凡有电视直播或转播国外的足球赛况，不拘何时何地，他都要看到结局。一次，出差在外，且患感冒，仍然趴在床头看了一个通宵。以八秩高龄，体质之耐劳令人叹服。

有位朋友评价我是一腿污泥一腿清，混迹世俗的同时，恪守一块圣洁的天地。此评用在冯先生身上也颇为恰当。例如，他的床和我的起居习惯相宜，一半乱七八糟摆放着书刊纸簿，留出的一半正好睡一个人，他为之取名曰“办公床”或“办公桌”，且读且写且思且眠，此等惬意常人无法享受。看来，我的坏习惯，教授权威也同样具备。与我随心所欲置放物品的习性相近，冯先生获得表彰的那些国内外奖证，零杂地弃在角落地上，尽管淡泊，他还是保留了作为人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一样东西——思想。他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什么叫思想有境界，就是用什么水平看待事物和问题。

先生如酒，愈久愈醇浓。先生如谜，愈猜愈奇妙。所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花”。

我忽然对冯先生客厅里唯一悬挂的一幅书法产生兴



冯新德先生与优美的风景融为宁静的画面。

趣。他讲起一段来历：几年前冯先生到青岛，被友人介绍给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这位书法家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书法用笔奇特，结构怪异，追随板桥风格，于是受人注目。当下有不少达官贵人欲求其字，以为炫耀，不料此君一字不赐。那日闻听冯新德院士乃知名教授，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即欣然命笔板桥题画诗：“宿草栽培数十年，根深叶老倍鲜妍。而今归到山中去，满眼名葩是后贤”，持书相赠。冯先生对这轴墨迹甚为喜爱，虽家中不乏名家书画，但独此展挂，以图朝夕玩赏。

冯先生寓居北大畅春园，那里曾是康熙建造的简陋乡村别墅，其著名是因为康熙皇帝居此学习数学和西方科学。这是有趣的巧合。穿过北大西门外的马路，行进在狭长且弯曲的小路上，颇有一种曲径通幽，访问归山仙道的味道。

作者附记：

冯先生来信说：“正将赴香港开会与讲学。希望文章的题目《快乐院士》，换成‘潇洒’，我1990年丧偶，二年未出门，至今每日鲜花，托我哀思。”正因为这样，我更应把“快乐”敬献于先生，祝愿他永远快乐。

杨嘉墀：和平砝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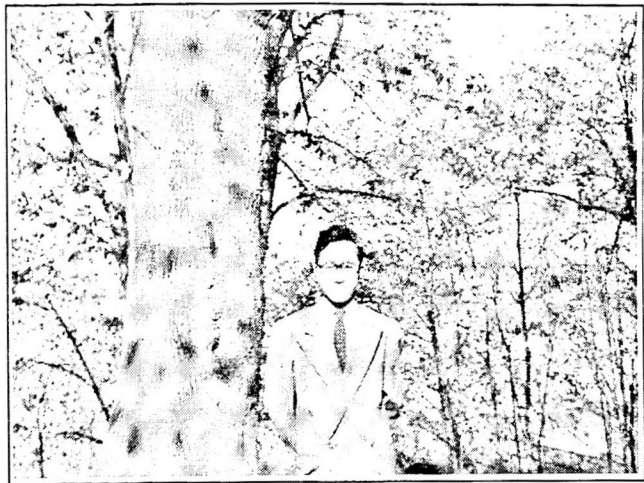
1986年3月5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起大笔在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上批道：“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封信是四位著名科学家于两天前提呈的一份建议，他们希望中国政坛的最高决策者，在抢占国际高技术制高点的问题上，作出明智的抉择。邓小平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批准了这份代号“863”，事关中国未来的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

于是，国际宇航科学家杨嘉墀和他的3位大名鼎鼎的伙伴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再一次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半秘密人物。从60年代起就参与制订我国工业自动化仪表、自动化科技发展规划和人造卫星发展规划的杨嘉墀，也许比任何人都明白“863”的份量。就在他构思“863”计划的前一年，即1985年，他曾两度出国考察，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使他深受震动。他知道，战

略防御倡议，除了为两霸争雄显示威慑力量之外，也是对美国高技术发展的一次冲击，同时也是对世界各国高技术及国力发展的一次挑战。紧跟这一倡议之后，各先进工业国家纷纷提出相应的计划：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技计划、前苏联的对策计划……他想，已在“两弹一星”高科技基础上积累了经验的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应提出采取对策的设想，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并进入所涉领域的国际俱乐部，占据一席之地。深夜的窗口，杨嘉墀仰望着星中不知名的星体，陷入了深邃的思索。

他有一个饱经战患的青年时代。1919年7月16日，杨嘉墀生于吴江的商业重镇震泽，在祖父杨文震创办的“丝业小学”启蒙，中学二年级随父亲赴上海，就读于上海中学，18岁中学毕业。他清楚地记得1937年8月12日这个日子，那天他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进考场两个小时之后，他知道战争来临了。第二天，回到震泽时，上海已在战火中沦陷了。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接到入学通知单，他到已搬入租界的交通大学开始大学学业。4年后，他从上海赶到昆明，应聘为精英荟萃的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助教。翌年转入中央电工器材厂工作，在留德工程师许德纪指导下从事载波电话的研制，生产出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的样机。杨嘉墀的父亲是靠蚕丝业起家的，在他读书

时，国产丝业已不景气，日本货占领了丝业市场，他痛感科技落后的悲哀。抗战胜利的1945年，他考取赴美公费留学，进哈佛大学工程科学与应用物理系学习，从事原子弹和雷达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时，为自己的知识面，他还修读了物理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的课程。这时，美国已将军用科技转到民用，他盼望以自己的学业，贡献于祖国的科技事业。



杨嘉墀院士 1953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嘉墀在美国与一位波士顿音乐学院的上海小姐徐斐恋爱，喜结良缘，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留不住他的思归之心。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阻拦杨嘉墀回国，他不得已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分别受聘为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参与高速模拟电子

计算机研制，并主持研制了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和高阻自稳零直流放大器，将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医学研究相结合，创建了医学电子学学科。

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日内瓦与美国接触，美方要求释放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俘虏，作为交换，杨嘉墀等留美中国学生得以回归祖国。10年的留美生活，他为祖国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他偕同家人义无反顾地回到首都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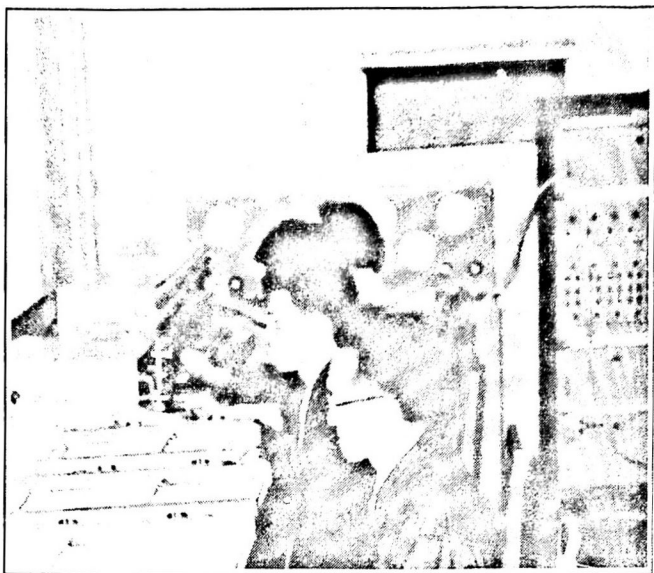
杨嘉墀认为自己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国内在电子技术方面还是空白。他进入正在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先后担任室主任和副所长职务。60年代初期，他领导的研究室和研究小组，完成了火箭发动机试验用的仪器仪表、热应力加温加载测试设备和核爆炸测试等研究项目，为导弹和原子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时期，他还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学工作，创建了自动检测学科。

1958年，手挽乾坤的巨人毛泽东，希望看到中国的人造卫星上天。杨嘉墀参加“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空间科学技术。两个月的悉心考察中，他觉得立即研制人造卫星的技术力量尚还薄弱，提议先从研制探空火箭起步发展空间技术实力。这一建议的被采纳，使我国60年代初期的探空火箭发射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科学院在有了充分技术准备的

基础上，正式组织力量开展人造卫星的制造时，他参与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的论证和最后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论证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总体方案的同时，杨嘉墀组建了一个姿态测量和控制研究室及一个地面测控用数据处理设备研究室。1970年4月24日，随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杨嘉墀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在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方案论证和技术设计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先进可行的设计思想，并在1975年顺利完成了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飞行试验。1979年，他发表的“中国近地轨运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论文，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八届空间控制讨论会上，受到国际同行的赞美。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使我国的卫星回收成为现实。

杨嘉墀是中国自动检测学的奠基人，领导并参与了我国导弹和原子弹自动化测试系统等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由他领导并参与研制的“核爆炸检测技术和设备”项目，为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和以后的两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中国的国际交流中，杨嘉墀是一位出色的科技使者。1972年春天，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杨嘉墀任团长率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访问了日本研制集成电路、计算机、工业自动化的有关工厂和高等学校，打通了中日两国在高技术领域内开展科技交流的



1968年杨嘉墀院士在进行返回式卫星控制系统仿真试验。

渠道。70年代中期之后，他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并在中国筹办国际学术会议，积极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为在自动化和航天技术领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进入80年代，他负责中意利用“天狼星”卫星进行通信试验合作项目的执行，获得大量的科学实验数据，示范性地开拓了通信卫星的应用领域。1983年至1987年，他连任两届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倾心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关于航天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当我怀着敬仰之情走进杨嘉墀寓所时，他正沉浸在“863”实施 10 周年的喜悦里。他一直在为这个计划的执行献计献策。他说：10 年间，国家为“863”计划投资几十亿元，换回了 1398 项高技术成果。数以万计的科技工作者汇集在这面大旗下，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七大领域内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其中 36 项关键技术中，60% 水平很低或几乎空白的项目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 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早在“863”计划刚实施两年的时候，邓小平听取了专题工作汇报，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杨嘉墀认为，高技术应是军民两用技术，可以互相转换。他还建议要在“863”计划外制订产业计划，二者既结合又分工。

当初 4 位院士的建议，现已成为国家行为，这是 20 世纪中国高科技的最后一战。在战争风云变幻的当代，高技术应用于军事仍是发展高技术的主要动力。杨嘉墀的身体力行，无疑为国际和平投入了强大的平衡力量。1996 年 4 月 4 日，杨嘉墀参加“863”计划十周年工作会议，受到江泽民、李鹏、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虽然年逾古稀，他仍然在自己的人生空间发着光热。

汪集旸：地热之光

闻名于世的中国地质研究所的门厅里，悬挂着该所有史以来杰出人物的巨幅画像，从“地质之光”李四光，到侯德封、何作霖、张文佑，直至最新的一位院士汪集旸。其中，享誉中外的汪集旸是8位健在的院士中最年轻的地球物理学家。

在这个大厅与汪集旸院士相逢握手，心里有种特别的感受。他们都是些在大地中发掘历史遗诗的人，熟知地球演化的沧桑。

徘徊在从李四光到汪集旸交织着炯炯智慧目光的门庭，我发现其间隐蔽着一条神秘的线索，首先是他俩的名字都与“光”有联系，职业也都是从地下为人类采集光热，其次，他俩排在一头一尾，汪先生追随着李四光。事实上的情形差不多正是如此。

30多年前，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运用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发现许多储量丰富的大油田

时，曾高瞻远瞩地说：我有生之年的愿望，是把目标的重点转向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

“地质之光”的话，被一位刚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知道了，从此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的沉思，他知道自己心灵深处已经印上了那位地质学家的心声，他的命运已和祖国的山山水水紧紧相联。这个青年就是汪集旸，那时，还不到30岁。



1962年回国前夕于莫斯科红场

汪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之后，这位来自江南太湖之滨的年轻人，奔赴大西北工作见习。稍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地质学院深造，以毕业论文《苏

联西西伯利亚盆地地下热卤水的分布规律及形成条件》获得赞誉，他第一次悄悄地走近以后从事的专业：中国地热学。但是，在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出现之前，人们还没有对地热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的地热资源研究迟至 70 年代才开始。当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热组成立时，他怀着难以表述的渴求、梦幻和兴奋，闯进了我国地热研究的处女地。

我国地热资源异常丰富，全国发现的温泉就达 2000 多处，水温大多在 40~100℃ 之间，是理想的中低温地热资源。仅西藏就发现有数百处地热显示区，至于羊八井的高温沸泉，更是遐迩闻名。然而，这一切都在大地深处沉睡着。遗憾不足以表达汪先生的心情。那时，他和同伴只能携着简陋的设备，借煤矿、油田或气田单位的光，利用他们的深钻孔测试地温。

井下矿工把地热称为“热害”，接近 1000 米地下时，温度已超过人体体温，又热又湿，对矿工健康极为不利。从 1974 年到 1978 年，汪集旻跑遍了开滦、平顶山、兖州等大型矿区和煤田勘察区，全力投入大地热流测试和研究，提出矿山地温类型划分，并为煤炭部总结出一套防治“热害”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同时取得一批大地热流数据。1979 年首次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大地热流数据 25 个，填补了理论地热研究的空白，国际热流委员会确认是一批高质量的热流数据。随后，他又在

华北、东北、攀西、三江、青藏、东南沿海地区相继获得一大批热流数据。热流数据在阐明地区的构造活动性、区域热状况、热背景以及地球物理场特征方面，均具有宝贵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为国际地热学界所重视。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姗姗来迟的中国地热学研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然而，当汪集旸于1979年10月以中国地热学首批访问学者身份踏上美国土地时，他却充满了自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景色绮丽，宛如一幅淡淡的风景画。地质系的科斯坦教授是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他正在这里进行“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沿岸地热资源远景评价”，汪集旸应邀参加这项课题研究。

与其说是一项合作，倒不如看作一场竞争。汪集旸要表现中国地热学家的智慧，他提出研究地热资源不仅要从小地球物理角度出发，更应充分注意地质构造条件的影响。以后的研究，果然证实了地热异常和高热流与隐伏花岗岩体有关，热流——热产生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基于这个理论划分的五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远景区，为美国能源部所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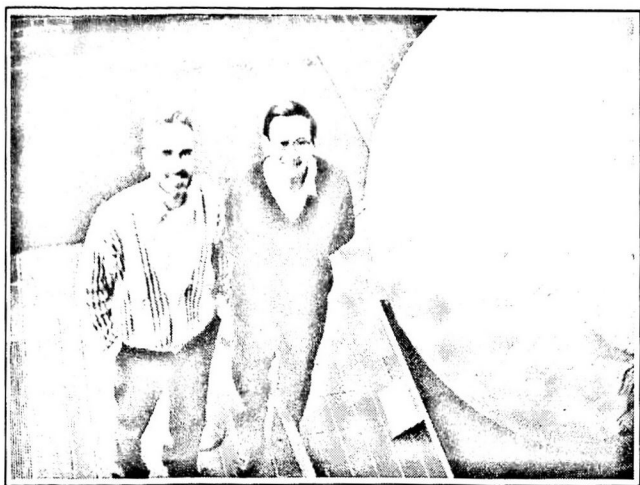
短短一年时间内，汪集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令美国同行耳目一新。他的名字，经地质系教授会议通过，列入该系成员名单，并载入美国地质研究所出版的《全美及加拿大高等院校地学系指南》一书，前面冠以“高级科学家”称谓。

1980年5月，汪集旸代表中国第一次登上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春季年会讲坛，用流畅的英语宣读《华北大地热流与地质构造》的论文，以翔实的数据、新颖而独创的观点，引起同行的关注和震惊。国际地热学权威评价中国地热学家富于成果的劳动，为世界地热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汪集旸被吸收进国际热流委员会，成为我国在这个世界性权威地热组织中的唯一会员，后来又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团成员。

半年后，赢得了美国与国际地热学界尊重的汪集旸，又应邀来到闻名美国科学界的“门罗公园”，主持“加洲大谷地热流测试及地下温度状况”研究。经过对多种数据的观察分析和计算，他证明美国西部加洲大谷地为低热地区，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地带热流究竟是高还是低的争论。美国地学界为之震惊：竟然是中国人，解决了美国自己未能解决的问题。

离开“门罗公园”前夕，美国科学院院士兰根布洛克专门为他举行告别会，原只限于地热学界的七八位同仁，没有想到开始时，客厅里已挤满了人，连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赶来话别。汪集旸举起酒杯，有些激动，内心充满了感激和自豪。

贴近大地深处，倾听地球心脏的搏动是对地热学诗意的表达。我国石油工业一度面临“稠油”的棘手问题，即地下油层受到温度的影响，在温度过低的地区便



汪集旸院士（右）访问美国夏威夷大学时，凝望着一个地球模型。

处于封冻粘稠状态。对付的办法是灌注高温高压蒸气，使之完全融化。可是，究竟含油区哪里温度高，哪里温度低，高到多少，低到多少，受到什么构造因素影响等等地下构造问题，需要专家来解决。石油部将此列为重点攻关项目，由一位副部长亲自负责，请汪集旸攻关。为此，他在辽河油田奔波两年之久，用手摇动绞车，从40多口两三千米深的井中测试出多种数据，写成专著阐明了石油与地温的关系，并进而分析了整个华北平原区地温、古地温条件。他计算出了华北盆地地幔热流值，并恢复了中、新生代以来华北盆地的整个热演化历史，日本地热学权威上田诚认为，这对研究整个西太平

洋地区的构造—热演化机制有重大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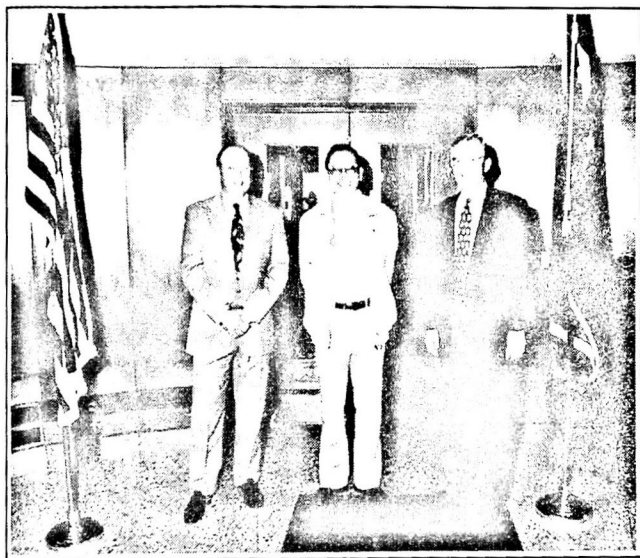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汪集旻来往于四川西昌渡口一带，在方毅挂帅的国家级攻关项目“攀西裂谷热结构分析”课题中唱主角。他在攀西地区成功地确认出我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 18 个“热流省”，并提出攀西古裂谷岩石圈热结构模式，为全球热流省增添了新类型（古裂谷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汪集旻的地热研究向国际最权威的线性相关律理论发出了质疑，这是国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 Birch 教授通过研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大型花岗岩基后建立起来的，被国际地热学界奉为理论地热学的三大定律之一。汪集旻经过对我国东南地区的考察，明确指出在地壳结构复杂的碰撞造山带，热流—地壳岩石生热率之间线性相关理论不能成立。他的观点再次开拓了地热理论的崭新境界。

1992 年 8 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 29 届国际地质大会，成为汪集旻奠定自己作为地球物理学家在全球地热学界重要地位的讲坛。他从地质角度出发，在世界上首次将地质与地球物理紧密结合，将我国大陆岩石圈热结构划分出五种类型，即华北型、攀西型、青藏型、腾冲型和东南型，不同类型在地表热流分布、壳幔热流配分、深部温度状况以及“热”岩石圈厚度上均各不相同。其中藏南为“热”壳“冷”幔，华北盆地为“冷”壳“热”幔，我国大陆地区总的热背景并不高，但具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他的理论得到一致的推崇，并被认为将对整个固体地球科学产生深远影响。

他频频亮相于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受到非同寻常的特殊待遇。在他访问美国阿莫科公司研究中心时，研究中心大门两侧分别摆放了大幅的中美两国国旗。



汪先生访问美国阿莫科公司时，美国人用张挂中美国旗的隆重仪式来欢迎他。

联合国大学从 1979 年开始形成传统，每年从世界各国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地热学家赴冰岛高级研修班讲学。1991 年 8 月，汪集旸应邀作了为期一周的关于中

国地热系统及其开发利用的专题讲座，作为一种殊荣，表明我国地热学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1995年5月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地热大会”，他代表发展中国家与美国、意大利、新西兰、冰岛等国政府首脑同时出席，并为大会作特邀报告。

任何学科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应用，汪集旸身为地热学带头人，格外注重应用研究，一如他早年的追求。以往国内外对中低温深循环，对流型水热系统研究甚少，他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福建漳洲热田，采用综合性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研究方法，对漳洲盆地水热系统的成因、热水分布规律及资源潜力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解决了这个热田深部是否存在岩浆囊或高温热源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并写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此类问题的专著《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在考查东南沿海地区水热系统属性后，他提出新看法，认为东南沿海不可能贮存高温地热资源。至此，汪集旸从系统理论到应用研究的创造性成就，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中国地热研究体系，带动了这门年轻学科的发展。

1995年10月11日，汪先生以欣慰的心情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生活馈赠地热学家的是四海为家的苦辛劳累，原以为花甲之后，可享受宁静闲适的生活，但就在这个时刻，他被选为院士，他不再有退休的年龄。在中国院士的序列里，他属于第五代年轻人。

我与他探讨起一个关于家乡的问题：吴江有没有温泉资源？这在他绘制的温泉分布图上不能明示。他沉思道：太湖平原地面平坦，地热水可能埋得深，地表没有出路，但地下热流肯定存在。我请他关注一下地质勘察数据，他欣然接受，表示有机会还乡实地考察查寻。于是，我们从温泉文化谈到旅游开发，直至莫泊桑的小说《温泉》，于遐想中构思着一幅迷醉自己的景像。

他说，“有些地方的领导到北京，并不是找局长部长办事的，而是找院士开座谈会、咨询会。”北京的信息灵，那些院士、教授、工程师与国内外联络广泛，为家乡办事都愿意尽力而为。我说，那你也可以设法将一些小型的国际会议放到家乡举办。他请我转达这些话给家乡的领导。

有人称汪先生是大地深处的热流，他心里确实流动着一股热情，乐于为地球上的人们贡献热心。

再次经过地质所的门厅，我又感受到了已经构成当代中国完整地质史的科学家们的目光。李四光的眼神微笑着，似乎预知到自己的遗愿将被其中的一位后辈独创性地完成，并在世界学坛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陈应谦：情满圣地

没有想到他的普通话里，依然是吴依软语的韵腔。我说：陈老，您的话里流露着浓浓的乡音呢。他爽朗地笑了：“60多年了，改不过来”。他是“九·一八”事变那年考入上海真如东南医学院时离开吴江故土的。

他的声音却硬实得象北方人。85岁的老人，却让人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

他是从延安走来的。红都延安，是他漫长医学生涯的起点。沿着那条红色的阳光大道，他跋涉了整整一生。这条艰辛而幸福的人生之途，是由一位伟人充满意志力的思想照亮的，一如近代中国大地上所有人们的进步之路。但这位老人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不平凡的记忆里，珍藏着的那位伟人的光辉，是他曾经亲临沐浴的。

当他以27岁的热血青春，经李克农介绍，

脱去革履西装，穿上灰布军装，戴上“八路军副官”袖套，离别舒适的南方生活，踏上通往革命圣地之路时，兴奋得情不自禁大声宣布：我要到新世界开始新生活！那是1939年12月，正是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的日子，一个寓意深刻的巧合，预示着他的医学生涯将开始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吗？是的，两年前的夏天，他担任宋庆龄组织的一个医疗防疫队队长，到霍乱流行的湘西芷江防疫救护时，芷江的县长盯着他问：“你是个共产党员吗？”弄得他莫名其妙。但他早在参加抗日救亡罢课游行的学生时代，就站在了十里洋场的街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救星的光芒。

在座落于延安东门外柳树店的中国医科大学，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以“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卫生干部”为己任的医学教育工作。他将自己携带的金饰托人带到西安去变卖换回一些病理和生理组织切片和寄生虫等教学标本，供学生实习之用。他在良师益友王斌校长指导下，想方设法地收集病理标本，开展尸体解剖，并编写诊断学、药理学教材——如今他于40年代出版的这两本教材，已成为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文物。

陈应谦时常站在蜿蜒的延河边上，遥望宝塔山，心里充溢着幸福的感觉。这座建于1000年前的宝塔，耸立在一座最高的山上，整齐细长，仿佛一支正对着蓝天描摹云腾霞蔚的神奇之笔。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主席领导



1942年陈应谦为延安中国医大第16期同学上药理学课。

红区人民在中国历史上写下灿烂篇章。

这是座并不很大的市镇，毛泽东的传记作者、美国人R·特里尔曾说：毛泽东的举止行踪在延安家喻户晓，很多人认识他，老乡常常看到“主席”走在布满灰尘的小巷里。陈应谦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只是他比许多人更幸运，能经常聆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不仅到医大来参观，还多次去医大师生自己动手修筑的大礼堂作报告。有一次夜间，毛主席就在大礼堂一盏微明的马灯下，给医大的师生讲医大抢救运动后的甄别工作。

夕阳西下，群山抹上了深红的色彩，每每在这时光——枣园的黄昏，正不紧不慢散步的陈应谦，老远就能看见毛主席那高大的身影，还有宽大的裤子和对襟的上

衣。在每次不期而遇，毛主席总笑呵呵地说，到我家里玩啊。他第一次去毛主席的家，那个仰慕已久的窑洞，是陪同马海德一起，用宋美龄送的一架仪器为毛主席做X片透视，检查健康状况。还有一次是他给江青诊疗。他至今还记得李讷二、三岁时活泼可爱的模样。有一天夜间，他果然和马海德、王斌、鲁子俊去毛主席家玩了，玩的是麻将，毛主席居然玩得兴致盎然，王斌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观战。

1945年10月，毛主席结束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的翌日，就派他自己的车子，将王斌和陈应谦接到枣园的家里，进行身体状况检查。毛主席派车接送，可是非同寻常的殊荣。在检查中，毛主席说：“我在重庆时，听说有一位大军官在某天早晨问警卫员，为什么今天天亮得那么迟啊？警卫员告诉他，天亮已经很久了，太阳已上山高照了。此时军官才知道自己两眼已失明。”毛主席问陈应谦：“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陈问：“那军官前晚到过别人那里吃饭没有？”主席说：“对，对，听说那晚他去别人家做客了。”他又问：“他喝酒了没有？”主席说：“宴请客人哪有不喝酒的，一定喝了。”他说：“那很可能吃了一种‘酒’。酒有两种，平时我们喝的酒是‘乙醇’，无毒性。而另一种叫‘甲醇’，工业用，人吃了侵犯视神经，重者可引起失明。这很可能有人陷害他。”毛主席听了点点头，似表满意，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在重庆时，有次蒋介石披上斗

蓬，与宋美龄一起亲来住处，要我参加他的宴会，我不好推辞他的热忱，就去了。还有几次民主人士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我也都去了。这样在重庆时，参加了好几次宴会，吃了一些酒，现在看来我的视力还好，没有什么变化么。”

经过细致的检查，陈应谦告知毛主席，身体正常，请放心。当时党内同志和群众对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很不放心，担心被扣留或陷害。毛主席能健康地回到延安，大家这才放心。毛主席又对王斌、陈应谦说：“谈判归谈判，蒋介石不可信，要立足于打，你们要准备到前线参加救死扶伤工作。”

就在这次离开毛主席家不久，陈应谦随王斌校长率领的中国医大全体师生，奔赴东北前线，参加解放战争。五年后的1950年3月，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经沈阳到中国医大视察，久别重逢，他握着陈应谦的手，十分亲热，有说不完的话。

陈应谦在延安留下了6年美好时光，将火红的青春融进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此后，又在东北的沈阳与中国医大相随八年。其间，他还曾兼任反细菌战专家组组长，胜利粉碎美国的细菌战，亲手接受了毛主席题词的奖旗。1953年，他到北京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并在1957年7月毕业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5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陈应谦先后任宁夏大学副校

长、宁夏医学院院长和由吴阶平创建并首任院长的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名首都医学院）院长，60年耕耘，桃李满天下，硕果传四方。值得庆幸的是，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陈应谦，在宁夏曾有惊无险地大胆起用并保护了一批“右派”，使他们被人羨称为“快乐的右派”。1987年离休后，年逾古稀的他仍竭诚弘扬中国红十字的人道主义精神，创办为海内外老年人健康长寿服务的中国红十字会老年服务中心。1991年10月1日，他以对发展我国卫生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受到国务院表彰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1985年，时隔四十年后，陈应谦应他在西安医大任校长的学生邀请，重返延安，心潮起伏地一一寻找那些已载入了当代革命史册的足迹。他象一个朝圣者一般，瞻仰了他所熟悉的毛泽东故居，也参观了他曾经多日驻留过的刘少奇、王稼祥等人的故居，当然，他还回到了自己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土窑、石窑啊，每一个洞窑里都珍藏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在他曾诊治过疾病的人物名单里，还有叶剑英、陈云、贺龙、陈毅、徐向前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王明、林彪。

应谦先生曾给我一份复印的日本《朝日新闻》上连载的长篇回忆《大马车》，作者是冲田正美，她是1919年随夫到中国的日本女子，曾被苏联红军俘虏，在送西伯利亚时被中国军队引渡到延安，从事见习护士工作。

她在应谦先生家里做过四年半保姆，1951年返国后念念不忘中国，多次到中国专程看望陈先生。在她写的《大马车》长篇回忆中，多次提及中国共产党的陈应谦院长。

老人是俭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老人又是活跃的，皓首丹心，老骥伏枥。他还是经常挤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或参加社会活动，或到中央高干俱乐部运动健身，每次游泳1000米，10年间的记录上已有游程1500公里！他分别兼任名誉理事长和高级顾问的中国红十字老年服务中心、上海老年服务中心事业发达，蒸蒸日上。

我曾经恳请他写一部回忆录，为他整理编辑。由于我的执意，他耗费了大量休闲时间，伏案笔耕，以令人惊讶的记忆力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记叙着许多珍贵史料的自述。其中，“我与领袖”的篇章尤其真切地展示了历史中鲜为人知的风貌。

我向老人索要他与毛泽东的合影，他遗憾地说：我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合过影的，但当时没有拿到照片。他给了一张毛泽东曾多次作过报告的延安医大礼堂纪念照。他告诉我：“现在不少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内容是虚假或夸大的。我除了给沈阳市委写过一篇回忆毛泽东视察医大的档案资料外，从没有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回忆文章。我心里的毛泽东是真实的”。

去年秋日，我在北京时，去拜望陈应谦先生，互相都有老友相逢的感觉。他竟然以“老汤”相称并不年老

的我，曾招待过毛泽东的姚永华夫人做菜端饭，一对老夫妇忙不迭地热情款待，还领着我游览首都医学院和中央高级干部俱乐部、大观园。姚永华夫人是1939年赴延安的武昌姑娘，结婚时吃小米，还以为是“蛋炒饭”，在医大一时传为佳话。光阴荏苒，姚夫人与陈先生相濡以沫，已度过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陈应谦与夫人姚永华 1995年1月18日金婚纪念照。

我珍藏了应谦先生所有的回忆手稿及许多信札，其中相当部分已由我经手发表。他颇有述而不作的风格，但我常想：他经历过的那些饶有趣味的事件，本身不就是一部精彩的书。

李怀志：域外风采

1996年除夕，是个雪花纷飞的日子，我在电话里听着远在法国的李怀志先生的声音。他欣喜地说，12年来他将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看到转播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而且，法国的报纸、电视已经介绍过中国的春节，以前法国人很少知道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节日。稍后，我又接到他寄来的函文，希望我向家乡人传达他的祝福。

国内科学界对怀志先生也许还陌生，但这位长着一张圆圆娃娃脸、给人稚气未消的孩子相的年轻科学家，在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已有非同寻常的出色表现，先后几次以世界首创的科研成果，为国际化工界增添了新理论。

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在吴江图书馆读到他自己写的一份个人经历，引起了兴趣。他是在一个由公共厕所改建成教室的乡村小学里开始学业的。小学期间，晚上从没有电灯，他就着

昏黄的油灯读了很多书，而在中学里还没有做过一次物理、化学实验。所幸考试成绩总是第一，他那善于思考和进取的个性，使他得以出类拔萃。凭他的高考得分，足以被全国任何一所著名的重点大学录取，但由于不懂填报志愿的方法，临考又突发高烧，没有进入所理想的大学，他被录取到地处山沟的浙江工学院。那时，他还不会洗衣服，临赴学校前，妈妈突击教会他洗衣服，以适应远离父母的独立生活。

那个高考事件，对他稚嫩心灵的打击，当时固然非常严重，差不多是由父亲“押”着上大学的，但挫折将他引入了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激发起他穷究知识的精神。他毫不松懈地训练独立探求知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到山穷水复的地步，决不轻易请教老师。凝神聚精思索的时候，可达忘我之境，像一座雕像，不受外界任何干扰，纹丝不动地坐上半天。

他在工学院读的是农药专业，与亿万人的衣食密切相关，热爱之心油然而生。毕业前，选的课题是《综合治理农药硫磷酯废水的研究报告》，论文所涉及的深广度，远远超出一般毕业论文的水平。整理论文时，从国外文献中发现一则极为简短的报道，介绍降低废水COD值的一条最经济的途径。农药氧化乐果废水的成分极其复杂，其中有一种废水最难处理，国内尚未找到妥善的处理方法，往往未经严格处理，就被排入江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尽管他已经选定攻读的是“反应工

程”研究生，但因为这个课题事关国计民生，他还是决意展开探索。实验过程中的困难是难以估量的，国外文献只报道一个简单的消息，至于方法、条件、数据、温度的控制、混凝剂的筛选，全靠自己摸索。经过日以继夜的反复实验，他终于发现采用吸附混凝法处理硫磷酯废水，除磷彻底，分离 NH、Cl 效果好，大量节约能源，降低 COD 值也成效显著，而且，所采用的混凝剂来源方便、价格便宜，处理废水的设备和工艺都极为简便。

近乎修道院的学习生活，回报他每门功课都是第一的优异成绩。他报考浙江大学研究生，成绩是浙大所有学科考生中最好的，因而直接成为国家教委的出国预备研究生，被派赴法国留学。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受了10个月的法语速成培训之后，他以法语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于1983年夏天踏上美丽的法兰西共和国。

怀志先生那一届赴法学生有127人，他只有21岁，是最年轻的一个。继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勤工俭学的学生之后，来到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法国，令他感到振奋。因其优异的大学成绩和较高的法语水平，他被分到法国科学院直属的国家重点研究所南锡化学工程研究所，师从法国第一号化工权威、世界著名化工专家维莱莫所长，开始了他一系列富有科学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在浪漫的年岁，他开始漫漫的学海苦旅。每天都工

作到深夜才离开研究所，常常一个三明治就充作了晚餐，至少做满十四五个小时。因为国内大学中理论尤其是数学的教学落后很多，他还要在课外花大量时间补习数学。与他同届的硕士生中，有一位是从著名巴黎理工学院毕业的，那是拿破仑亲自创建的学校，享有世界盛誉。学校的学生都穿军装、佩剑，每年只招全法国最出色的300名学生。现在法国各大企业总经理、很多政府部长都出自该校，所以研究所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位法国学生肯定是这届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但各科考试完毕，大家都惊异地发现第一名是中国人李怀志，导师欣喜地逢人就说李怀志打败了拿破仑学校的学生。

和许多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一样，祖国的荣誉在李怀志心目中是至高的。在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导师提出3个课题供他选择。他考虑到我国煤炭和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但这些资源并没有合理地利用，他认为应该让人懂得煤及木质物烧掉可惜，可以通过气化转化成热能使用。他决定从事煤、石油重烃及木质物在高温气化的化学反应堆的动力学机理研究，选择了“木质物和煤高温气化机理”课题。仅一年时间，他就从理论与实验两方面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煤与木质物高温气化的动力学模型，被美国化学学会命名为“融解模型”，许多国家学术杂志誉之为至今该领域内的最优理论模型。

1984年11月，李怀志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了新型气固反应器——旋风反应器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只在研究旋风分离器，他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又属超前。旋风反应器应用范围极广，可用于煤、石油重烃的气化，工业废水的处理，废木质物的回收利用，



李怀志先生是中国当代留法学生的杰出代表。

对国内新能源的开发也有应用价值。他说，我想我如能在这方面为国作点贡献，我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1988年3月22日，在一个由国际著名学者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面前，他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当时，他的导师及其所在实验室认为他的论文是“该室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论文之一”，所以特决定隆重举行答辩。在维莱莫教授主持下，特邀西德马尔坦教授、荷兰斯瓦伊教授、法国拉格利、巴尔内、莱代、乌兹卢特等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还邀请了法国最大的化学公司罗纳——波朗克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并把第一次邀请记者参加论文答辩的荣誉给予了他。法国东部地区最大的报纸《东部共

和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刊登照片，并引述评委会评价，说李怀志的研究“征服了全世界”。美国对他的研究深感兴趣，并已在此基础上进入工业应用研究阶段。其中多项应用成果以专利转让方式被法国大化工企业采用，效果显著。法国科学院特授予他杰出博士论文大奖，并获得 7 万法郎的奖金，这个大奖在法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各领域每年只颁发 10 个。从此，李怀志犹如一颗闪烁的新星，冉冉升起在国际化工领域的天空。

不久，李怀志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作博士后研究，主持由欧洲经济共同体 12 国、美国、日本政府支持的核电站安全课题，进行在世界核能领域最有挑战性的压水式反应堆的安全及保护的研究，在核电站事故理论模拟、实验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通令嘉奖。他的突破性成果属高度机密，至今未在学术界公开发表。接着，他又在法国一家化工企业主持由法国政府工业及研究部委托的超临界流体理论及应用的研究课题，其应用部分成果属机密，在工业界得到广泛推广。1990 年，李怀志以杰出的科研成果被破格提升为法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进入法国科学院化学工程科学研究所工作。

他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还担任来自法国、德国和摩洛哥的 5 个博士、2 个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和化工杂志的审稿人，同时，还是法国多家化工企业的科技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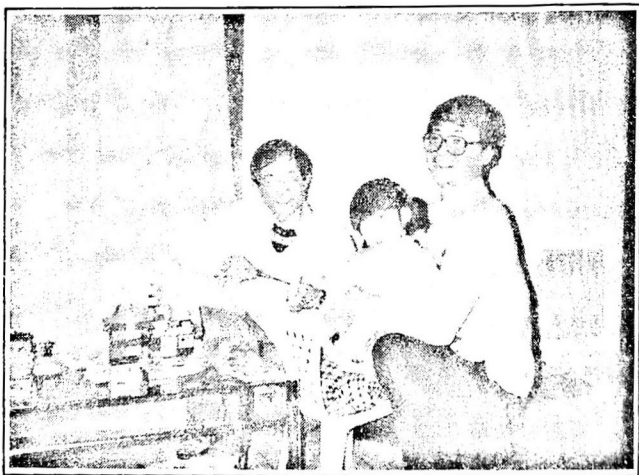
并为法国石油公司、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等部门提供一些咨询报告。

目前，他和一位加拿大教授一起联合创立欧洲第一个复杂流体化学工程研究中心，这是由法国科学院、教育部及法国 5 家最大的化工企业共同支持的重点实验室，他负责多项化工最新领域的课题研究。复杂流体研究是欧洲还没有过的新学科，基础理论还是空白，在工业应用上有不可估量的实用价值，为高分子化学、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石油和生物化工所需要。他的研究基金每年达 100 万法郎，操纵着世界最先进的设备。

李怀志于 1962 年 2 月生于松陵镇一个普通但富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家庭，属虎，他说：“我喜欢挑战，这是我的性格。我希望自己能为祖国干一番事业。”这位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勇于挑战的青年科学家，以为祖国争光为荣，赤子之心殷殷。在留法的 14 年间，他以勤奋的工作创造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科学业绩。例如，他把物理混乱理论应用于化工及动力学等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法国他仍然在许多领域保持着第一的荣誉。他以献身的精神奉献于科学事业，在科学实验的关键时刻，他常常要连续工作 30 多小时，他对父母说：趁年轻，要多搞些研究。

他在法国与一位留学法国的武汉姑娘结了婚，妻子也已获得博士学位，在一所大学从事计算机图像处理的研究。前几年，他与妻子双双回吴江探亲，与他同时回

家的还有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弟弟李怀忠（现与哥哥同在法国科学院，做自动控制所的博士后研究生）和弟媳，他们两双博士夫妇对对相聚父母身边，在家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亲情的温馨日子。他们的父亲李彦超是位离休干部，也是我的忘年交，不时来我办公室坐坐聊聊。李怀志出国前，他曾用自撰的诗告诫怀志：“异国他乡固然好，你的事业在中国。”相逢的时刻，父亲李彦超对儿子儿媳们说：“我们做父母没有财产遗赠，你们能够成才就是最大的财富。”李怀志特意将法国政府、



李怀志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写道：“摄于1996年圣诞大弟来南锡期间。今年法国东北地区格外寒冷，是1962年以来最冷的天气，整整四个星期白天最高温度均在 -10°C 以下，晚间最低温度在 -20°C 。而且，下了5场大雪，从家里的落地窗看出去到处是积雪。”

法国科学院授予他的博士论文奖证书留给父母珍藏，并在上面恭恭敬敬地写道：“光荣属于爸爸、妈妈！”

科学永远只承认第一名。李怀志作为他这一代化工研究人员中最出色的一个，已经引起世界化工界的瞩目。在诞生了拉格朗日、富里叶、拉普拉斯和居里夫人等科学巨匠的法国，在目前仍有 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勤奋工作的法国科学院，李怀志先生在他未来的漫漫人生长途，将会以更出色的成果，为自己创造一个辉煌的明天。

朱通华：才子乡情

通华先生是让我经常亲切怀想的忘年交。

我与他相差 30 岁。但相差的还不在年岁：他是官员，我是布衣，并且，虽然刚刚换掉身份但意识深处仍然还是根深蒂固的农民；在他为文是研究社会、研究政策的济世之道，在我则是附庸风雅。相处时，他不计较什么，我也不用假装谦虚，只管享受他的人格魅力。

初次之邀，是通华先生通过时任吴江市委政研室主任姚海兴先生转达的。通华先生谈起与费孝通先生的交往，说他俩的许多观点经常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后来，我也向他发表了很多观点，有些还是批评性的，他几次将我的长信批转给《名镇世界》杂志社的全体人员阅读。所以，我的“大名”连通华先生身边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工作人员也熟悉。因了他的身份，他们对我也似乎含着尊重的意味了。

通华先生从南京发来的函件，都有特别之处，信封上标着“机密”字样，当然挂了号，

大约是怕遗失，但在我便感到一点政界人物的特权。他寄来的都是令我欣喜的东西，有时是精彩纷呈的手稿，有时是留作纪念的照片，有时是馈赠“老弟”、“小友”的著作，有时则是寥寥数语的嘱咐。



1962年在北戴河莲花池。

在江苏省
委的决策层，通华先生是老资格。26岁做省委《群众》杂志文教编辑时，已内定为省委书记陈光的机要秘书，这是陈光在一年半以前的一次全省下放干部代表会议上听了他的发言后作出的决定。陈光对省委组织部长说：把这个青年人调来当我的秘书。当劳动锻炼期满后，通华先生背着铺盖到《群众》报到时，还不知情。

而他的才智显露峥嵘，时间更早，19岁就从青年团的岗位上选调为吴江一个区的党委委员。他在《答汤海山》的函文里说：

“这在吴江青年干部中是第一个。1954年由组织选送江苏省委党校学习而被留下，从此离开了吴江。但1957年12月又回吴江‘劳动锻炼’一年半，做新农民。1959年又奉命调回省级机关。”

因此，他在省委幕僚群博得“四才子”之誉时，虽然年纪甚轻，却已经有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经验。陈光的赏识，使他与文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而陈光严师般的督导，很快将他磨炼为翰墨高手。陈光是经历长征的红军干部，以不高的学历而长期担任文教大省江苏的文教书记，分管文教和组织，成绩卓著，曾几次拟调为国家教育部长，都被他以“文化不高”而推辞。他分管江苏农村工作时，通华先生也就转而起草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曾有一年之内连续三个江苏的报告被中央批转给全国的骄人记录。

通华先生政界文坛近40年的生涯，也是社会政治风云多变的历史见证。他曾经感慨：“文字之海，实如学海之无涯，其深莫测，亦如苦海之无边，然其味自知。”他纪念自己的知友、因病去世的江苏省委秘书长顾愉的文中写道：

“顾愉尽职于文字翰墨之中，一笔即是千军万马，夜以继日，纵论省国内外，脑汁绞尽，手指茧生，开夜

车、无假期是常事。”顾愉“不如意常随左右，从来处之以泰然，从不怒形于色，对工作从不懈怠。”

是追念顾愉，也是自我写照。

一次，通华先生兴致勃发，谈起在上海揭批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时的情景。1976年10月，中国命运大转折之际，他奉命参加中央工作组赴上海，是彭冲的三名助手之一。中央工作组面对一批经过“文革”塑造的狂人，有耍笔杆子的，也有拿枪杆子的，有造反经验，也有掌权经验，在他们盘踞已久的堡垒里，接收党政大权，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实非易事。

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

通华先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根据彭冲的意图，具体组织全市揭批“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群众运动，充分揭发并拿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证，为国家审判“四人帮”提供有力的证据。

上海4年，来去匆匆，他自己称为“风雨雷电的四年——紧张、热烈而带有惊险色彩。”

他在那里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虽然年仅40开外。但人生收获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他与彭冲的友谊。在上海落实文艺政策时，他熟悉了一批知识界名流，特别是为发还巴金的稿费，与住在武康路上的巴金有数年的频繁交往。他曾经写过几篇关于巴金的文章，纪念这段宝贵的经历。

从上海返回江苏后，通华先生任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副院长。1982年后的11年间，通华先生担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参加省级决策层的活动，并兼任省委副秘书长。

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继陈光、彭冲之后对他心灵起了影响作用的另一个人物——费孝通先生。

他在《松陵话棋眼》里这样回顾：

“我记得我同费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的南京饭店。费先生同江苏省的主要负责人就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问题交换意见，我因工作需要‘忝陪末座’。谈了整整半天，双方观点完全一致，后来一直被称为‘不谋而合’。达成的协议总得有人来具体落实，于是我被指定为江苏省与费老之间的联系人。”

此后，费老每次来江苏调查都由通华先生陪同，志趣相同的学术研究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通华先生与费老同是松陵人，有一个共同热爱的家乡，又有了共同的研究课题：小城镇建设。当费老首先提出“苏南模式”概念时，通华先生第一个写出了《论苏南模式》的研究专著，总结并推进了苏南经济的发展。

他俩之间留下了许多佳话，这在通华先生《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系列篇章里有文情并茂的记载。关于旧诗对唱，他回忆道：

“1984年春天在庙港小住，我不揣冒昧，送了一首七言给费老：

细雨蒙蒙惊晚春，松陵二子结伴行。

岂敢偷闲寻旧梦，推桨拂柳下江村。

第二天，我和费老告辞要回南京了，承费老和了一首回赠。”



费孝通先生（右）与朱通华先生（中）和作者一起交谈。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1984年的这次旧诗对唱，在我是强步风雅，勉为其难；在费先生是家学渊源，驾轻就熟，从此打开了写写古诗的闸门。”

巧合的是，我初次见到费老和通华先生，也就是在他俩多次共同下榻的松陵饭店。大约是1995年5月，我去吴江宾馆拜见通华先生，临别时他问我有否见过费

老，我说见过几次了。他说，费老也在宾馆，坚持要陪我一起看望费老，并嘱夫人带了相机为我们照像。他把我郑重推荐给费老后，和我们一起坐在三人沙发上，把他刊登在《人才》报上的《退思园答客问》，为费老边读边释，费老回想着当时自己答客的情景，非常高兴。我后来以《松陵二子夜读人才报》为题，记叙了这次妙趣横生的会晤。

研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论著，是朱通华先生漫长文字生涯中的，辉煌篇章。早在1984年他就在《经济参考报》等各种报刊上撰写系列文章，肯定乡镇企业的成绩，在全国是个先声，使江苏乡镇企业的实践和经验，为全国所瞩目，并首先辐射到邻近的安徽、浙江等地。

他在为自己一本书写的序言里写道：“1980年我从上海回到江苏工作以来，对乡镇企业一直很关心，调查它，研究它，宣传它，支持它，迄未停息。”他的研究和宣传，使日本的社会学家们都密切关注江苏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许多乡镇企业家的事业和命运。日本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鹤见和子教授将江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称之为“内发型”的发展模式，江苏现象形象鲜明地走上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舞台。

他的研究工作贯穿了一种敢讲真话并捍卫真实的可贵的品质。1985年夏天，他参加安徽召集的高层次学术讨论会，出席者中有费孝通、于光远、薛宝鼎诸权威

人士。一次宴席间，北京的一位专家对费老说：“我看江苏的乡镇企业不行，不正之风都从那里刮起来，是基层干部搞特殊化的根据地。产品也不行……。”举桌愕然，费先生当然不便说什么，通华先生忍不住说：



1977年3月北京五届人大期间

“某某先生，我很尊重你，可是不同意您刚才的看法。江苏的乡镇企业，并不像您所说的那么糟。”那位先生问：“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江苏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在这方面有一点发言权。”

他致省委领导的建议也无一不是实事求是，坦陈己见，如在1988年，他提醒省长重视全国性的“吹”江苏经济的现象，不同意苏州市产值名列上海、北京、天

津之后的第四位，以及江苏工业总产值位列全国榜首的提法。早在1979年他就向全国人大建议：修改宪法中允许运用大字报的条款。

记得1996年初，在与通华先生的一次会面中，他情绪有些激动，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小城镇建设已经过时，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在《新华日报》的《理论界》上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现在正是小城镇建设更需要加强规划，加强管理，提高水平的时候。”

通华先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和气质，使他的工作和研究产生了超越，成功地从政界角色走进学者型的社会经济研究专家的行列。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证，就是他的多次出访日本，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而怀着一种使命感，架起以学术交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友谊桥梁。

因此，1993年以后，年逾花甲的通华先生步上了自己的学术高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里耕耘出累累硕果。进入晚年的他，焕发了生命青春、学术青春。特别在小城镇研究的天地中，他的开拓已引向深入，以致不少国际友人都说：中国有一个费孝通、朱通华等为代表的小城镇学派，他们志在富民，根在实践。

他的驱动力源于一种深厚的感情：他心中有一块土地。

正如与他兼有师友之谊的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爱国必爱乡，爱国必先爱乡”。通华先生曾告诉我：

“我热爱故土，从来为自己是一个吴江人而骄傲”。他在《故乡吟》中写道：

“对故乡的感情，不是自然主义的，是一种深厚的社会感情。这种感情，有时高于幼辈对于长辈、下级对于上级的感情。”



朱通华先生与母亲

思考和关注农民命运、农村发展，在通华先生的纯洁心灵里始终是重要的命题，与生俱来。在给我的信中，他是这样回顾自己经历的：

“我父亲出身农民，没有上过学，天性纯朴，以诚待人。迁居松陵镇以后，结识了城内的一位士绅赵先生，受其影响极大，尤其得到赵先生关于‘一定要子孙读书’的灌输很深刻。母亲也没有上过学。但很聪明，

很多民谚可以脱口而出，比喻亦极其贴切，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居然可以记帐和认识许多字。她天性善良，有正义感，凡乡下来客必待以饌食，我的同学有何困难必予以帮助。”

他的一生中，对他心灵和性格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他母亲。因为始终受母亲的心灵滋养，他至今都爱吃农民食品和家常菜，如红烧肉、螺蛳、鸡蛋之类。对农民的天然同情心，甚至影响了他重要的思想观点。他与我谈到自己的重要观点时，曾说，学生时期：做好学生，做正派人。工作时期：要干就干得像个样子，不马马虎虎。从不说过头的话，做过头的事，在“运动”中总是偏“右”一点，取“中庸”之道。对“上”不捧，对“下”无威，有书生之气。

乡情，溢于心灵。他说他1958年再度下乡“锻炼”，选的是老家吴江，学会了全部的庄稼活，后来的乡镇研究，也以吴江为重点，每年都要回家乡看看，总觉得家乡的景最美，家乡的人最亲。他一直称自己是一个游子。我读他的随笔集时，看到他说“我是从鲈乡飘出来的一叶浮萍”那句话，怦然心动。

通华先生对蒋蕊娟女士主编的《人才》报，独有一份钟情。他最早表示支持的一个行动，是赐给《人才》报发表他在日本成蹊大学时致费孝通先生的一封信。1993年后他的许多重要文章，几乎都让《人才》报刊登了，相当一部分是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他还将陈焕

友为他《苏南模式发展研究》写的序，也给予《人才》报刊发。或者是第一次发表的新作，或者是精心充实修改过的旧作，所赐稿件没有一篇是敷衍之作。他对费老、对我都说，他把《人才》报刊发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标准文本。因此，他对这份“位卑言微”的小报寄予了期望，甚至奖誉《人才》报的某些品位超过一些大报、名报。

这恐怕也是他难解的乡土情结。

记得有一次全国党校系统在吴江举办理论研究会，通华先生特意关照主持之一的江苏省委党校陈校长，把《人才》报作为会议资料分发给每位代表，并邀请我“列席”会议交流，增长见识。

1995年5月，吴江人才大厦落成那天，通华在吴江参加活动后正要返宁，我向他转达蒋蕊娟局长希望他出席人才大厦庆典的邀请，他不加思索欣然同意，推迟了自己和夫人回家的日程。他说，对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是应该讲几句话的。后来，我送他们夫妇到苏州火车站，用的是一辆旧面包车，颠荡而且噪声大，油味难耐，我表示歉意，他反过来安慰我：车子只要能乘就可以了。

他对家乡普通但有才气的人，总是热情满怀，关心备至。同里镇一位自学成才的书画家凌在纯，在工厂的境遇一直很差，不能人尽其才，通华先生为这个“小人

物”多次惊动吴江市领导的大驾，希望给予调整一份合适的工作。凌在纯调到市政协工作后，书画篆刻的才能得以发挥，作品被作为吴江市对外交流的礼物，令日本等国的友人爱不释手。

通华先生每次到吴江，受到召见的就有很多没有名位的下层人士。我经常荣幸地应邀进入他下榻的宾馆。有一天，我接到他随员的电话，说通华先生找了我几天，打过几十个电话。我以为有什么要事，匆匆而去，正巧在宾馆门口相遇，他说没什么事，就见个面，一起外面照个相吧。片刻之后，他就赶往苏州，赴杨晓堂聚会去了。像这样能够隔了诸多阶层来亲近、赏识普通人的人并不是很多。他的那种“深入群众”，与其说是作风，倒不如认为是领导才能或者人格力量的一种表现。也正由于他心目中有群众，他才拥有了宝贵的不因事过境迁而衰变的财富——群众基础。我去乡镇时，就有人用赞美的语调谈起通华先生，说的还是五十年代他才思敏捷的故事，可见几十年之后，互不相关的人都没有忘记他。

在一个寂寞的深夜，我给他写了封长信，倾诉作为晚辈的人生感怀。人生的难易，本是无可奈何，没有一条规则的坦途。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像我这样的人，独善其身也是难以进入的境界。所以他期望我每月为他任社长的《名镇世界》写一、二篇文章之事，我也只能愧疚以对。也许是对我心境的感

应，他寄赠一首《无题》诗：

三十五年弹指间，半是迷惘半似仙。
碧云寺畔读大卷，下县浜里种苦田。
万人待罪温饱日，一语定音晴朗天。
世事浑看棋一局，相伴娇女吹炉烟。

写诗的日子，是1968年他的35岁生日，明年我也是35岁了，却不敢指望吹吹炉烟、读读大卷的逍遥，但愿能够拥有种得一方苦田的清闲。想想通华先生，他不是也感叹：“一生无大难，亦不轻松。”他那种年龄层人的许多岁月，也是过得很累的。在人生中只有“沉重的时刻”是不能忘怀的。通华先生在写《追念顾愉》的真情文章时，曾经有过伤感：“先我而去者，我今纪念，他日纪念我的，又将是谁呢？”荣辱和功名利禄的浮云褪尽之后，当我们所有人能够真正以一个“人”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的本质时，才回到了自己的心灵。

通华先生用过一段异常美丽的文字描绘天台国清寺的清寂黄昏，写到了自己的幽思：“一日之间，身处两极：早晨还在闹市，所见所闻，但求竞争取胜直至蝇头小利之必得；现在已在名刹之侧，暮鼓晨钟，清风霁月，不能不使人生发一切莫非身外之物的意念。”

不久前，通华先生赠我一幅联句：

在泰州梅兰芳公园的竹亭内，通华先生触景生情，向费孝通先生出了一个上联：

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

费孝通先生对曰：

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说

当时我对费朱的联句意境不太懂得，现在似乎略有体会。为人所能存世的，不就是道德文章？

蔡正仁：流芳梨园

我曾以《“小俞振飞”，惟妙惟肖驰誉海内外，“活唐明皇”，即情即景风流步古今》为题，给蔡正仁先生“画像”。绘画之难在于传神，在舞台上、掌声里的蔡正仁则更是扑朔迷离的。

“本人的职业是公然调戏良家妇女，但是公安人员对我毫无办法”。每当蔡正仁如此简短地自我介绍时，必能引起剧场观众的会心一笑。但是，当长生殿中“哭像”的唐玄宗，“断桥”上伤别的许官人，西厢房内“惊梦”的柳梦梅，都被擦去神秘莫测的脸谱之后，作为谦恭有礼平常人的蔡正仁便显现出来了，尽管他头上还闪烁着著名艺术家的光环。

蔡正仁是冠着京昆小生泰斗俞振飞大师继承人美誉的梨园“活唐明皇”。他的演唱从吐字吐音到运腔，从掌握曲情的分寸到运用气息，都有独到之处。善于扮演不同性格的小生，对昆曲小生中各个家门如雉尾生、鞋皮

生、大冠生、小冠生、巾生都演得相当出色。大凡优秀演员无不在精心雕琢人物上下功夫，蔡正仁的表演艺术特色是人物塑造深刻细腻、丰富多彩，善于利用广阔的想象力来刻划人物的形象和内心世界，把在客观生活中体察到的人的多种复杂关系、复杂感情，通过想象和剧中人物结合起来，从更大的概括中展现复杂的个性特征。所以，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人物大都内心深沉，感情真实，姿态丰美。

唐明皇是蔡正仁舞台世界上最完美隽永的艺术形象。《迎像哭像》是昆剧名著《长生殿》中的一折，讲述了唐明皇逃难蜀中，为杨贵妃塑像造祠，亲自祭奠的故事。全剧共13支曲子，几乎全是反映唐明皇的内心独白。除唱工戏外，没有繁重的身段，完全看演员的气质。唐明皇一出场的四句定场诗：“蜀江水碧蜀山青，赢得朝朝暮暮情，但恨佳人再难得，岂知倾国与倾城，”便把人物的年龄与地位表达得一清二楚。后面长长的两大套曲，蔡正仁都唱得层次分明。从唐明皇想起马嵬坡贵妃被迫缢死，到迎来杨贵妃的雕像时几乎当作真人，从回忆贵妃当初入宫及“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恩爱；到三次奠酒看到太监、宫娥的哭拜，增添了自己的哀伤，最后到唐明皇要把“哭不尽的衷情”和贵妃“梦儿里再细讲”，蔡正仁用精彩的歌唱艺术抒发着强烈的感情，或高亢激越，或凄楚婉转，一字一顿，将此时饱经风霜、政治失意、爱情受挫的唐明皇的内心世界刻划得淋

漓尽致。其优美动听，比之京剧的《文昭关》也毫不逊色。

此剧是大冠生的主要唱工戏，俞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若无金声玉扬之嗓，殊难胜任，自俞振飞1959年在北京演过后，一直无人敢演，几成绝响。20多年后，蔡正仁凭藉无有匹敌的冠生功力在苏洲首次献演，俞振飞亲睹爱徒化工肖物、着手成春的表演，赏以“活唐明皇”的赞誉。继在北京公演，轰动一时。

蔡正仁的昆曲道路也是既必然又偶然的。他于1941年生于江南古镇南浔，父亲是位戏迷，当蔡正仁还呀呀学语时，便随父亲去看戏。长到二三岁光景，举家迁徙到毗邻的另一座江南名镇震泽。那时的震泽是繁华的商业重镇，因占地利之宜商贩客旅乐于往返于此，一些戏班也常来鸣锣唱戏。蔡府家道小康，看戏自是不愁。从京戏、绍兴戏、常锡文戏乃至影戏，无所不窥其妙，但唯独没有看过昆剧。喝酒上瘾，看戏入迷，不仅看，小戏迷还在自家的厅堂里唱戏作耍，甚至用课本里的故事编成戏文。高小毕业的时刻，报上刊登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班的“招生启事”，蔡正仁偷偷请在上海的舅舅寄来招生简章，尽管搞不清状况，但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投考，居然考上了，合该与昆曲有缘。临去上学，他还对昆曲不甚了了，只知是一种古老的剧种，心里想：只要穿龙袍就行。

在分行当时，蔡正仁要求分到老生组，他自幼看



《长生殿》之唐明皇

戏，却最怕小生戏，因为这类都是文戏，往往边看边打瞌睡。人们不能不承认命运的安排。2年后俞振飞自港回沪兴致勃勃粉墨登场，为昆曲班学生示范演出折子戏《评雪辨踪》，蔡正仁这才大开眼界：“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看的小生戏”，遂与小生行当结下不解之缘，在俞振飞和沈传芷的调教下，蔡正仁喜得薪传，终成大器。

一天晚上，俞振飞和麒麟童（周信芳）两位艺术大师在上海天蟾舞台，合演《打侄上坟》，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蔡正仁是最后一个走出戏场的，望着群星闪烁的夜空，他决意要跟俞先生学戏。当时他只是戏校的学生，而俞先生已是驰名中外的俞派艺术创始人、京昆小生的泰斗。第二天一早，他竟跑到俞先生的住所，直截了当地求学《打侄上坟》。俞先生回答得同样干脆，他欣赏这个学生的直率和胆量，当即搬桌挪椅，腾出空间，连演带做地讲解起来。时值盛夏，不一会，俞先生已经汗湿衣衫。当讲到剧中人下跪的动作时，只听得“扑通”一声，俞先后双膝跪倒地板上。蔡正仁没有想到年已花甲的大艺术家，教一个贸然上门的小后生如此尽心尽力。20多年后，蔡正仁接主了上海昆剧团。他承继了俞师可贵的风范，一边演出一边传授后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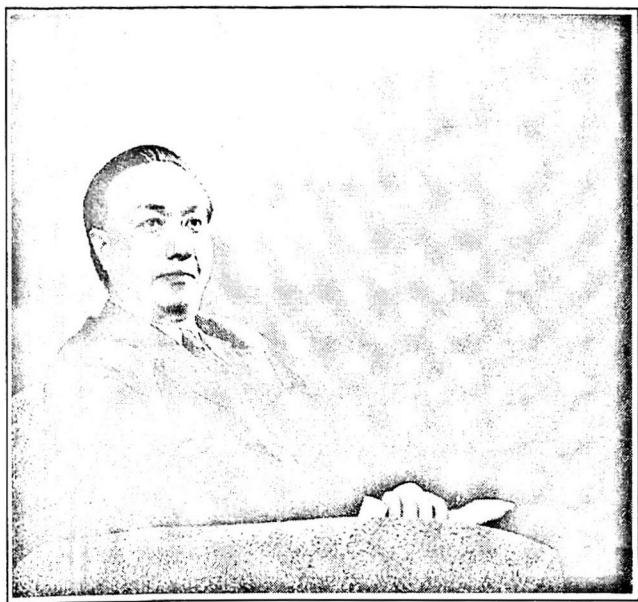
19岁时，蔡正仁很想学《太白醉酒》，可又不敢向先生明说。原因有三：一是先生虽年轻时学成此戏，却到41岁才敢初次献演，足见其难；二是整折戏从头到尾只有一句唱，全靠演员用多种多样的笑和不同程度的

醉态以及繁复而优美的身段来表演，非功力深厚难以演出太白的醉态；三是李白乃唐朝一代诗仙，若无一定的文学修养，断难表现人物性格及风度。而蔡正仁连酒都不会喝，怎能演“斗酒百篇”的大诗人呢？不想俞振飞知道后，竟大加赞赏，还约了沈传芷精心传教。不出2月，蔡正仁居然学成并登台演出。

蔡正仁与俞振飞师生俩传艺习艺，相濡以沫，亲若父子。“文革”内乱，俞被讨伐，学生仍不顾自己安危，设法探视。先生屋破，蔡正仁便将他接来同住，精心侍候，朝夕相敬。以至人称蔡正仁演戏、做人人都像老师。

我在蔡正仁家里，曾见俞振飞的题诗手迹，被恭敬地供奉在客厅的墙壁上。诗云：“转益多师与古同，总持风雅有春工。兰骚蕙些千秋业，只在承先启后中。”俞先生的欣慰之情、勉励之意，跃然纸上。而蔡正仁引为终身遗憾的，是过去俞先生写给他的一些讨论戏剧的信件，在“文革”中被迫交出，无有下落，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损失，更是中国戏剧艺术的重大损失。

蔡正仁跟随俞振飞有30多年，戏剧艺术师生经常相处固然极为重要，但更要紧的恐怕还是关系，老师要非常钟爱学生，学生又要非常热爱老师的艺术，两者缺一不可。师生之间须“心灵相通”，兴趣、口味相近，方得神韵。然而，功力深厚的蔡正仁还能做到更进一步，在继承的同时，不为传统的表演程式所束缚，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风格，达至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否



蔡正仁先生在舞台上塑造的人物与他本人一样，内心深沉、感情真实、姿态丰美。

则，即使能与老师相提并论，顶多是“第二”而无法逾越。

素以扮相儒雅俊秀驰誉的蔡正仁，具有丰富的表演手段，且能京能昆，善于变化。与唐明皇的形象不同，他在名剧《白蛇传》中塑造的许仙，身为店伙，寄人篱下，生活拮据而不寒酸，心地老实而不呆板，既不能演成巾生那样风流潇洒，也不能像穷生一样穷愁潦倒。与白娘子同舟避雨时，若眼神过于流动，就会显得轻狂，

而过于呆滞，又会变成傻气。他以精湛的技艺，鲜明地表现了许仙朴实淳厚的气质。若将唐明皇与许仙放在一起，几乎难以让人相信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是由同一个演员塑造出来的。

“许官人”在港台及新加坡曾享尽赞美。他第一次赴港献演《白蛇传》还在1961年，时当二十来岁，与名旦华文漪合演，出足风头。此后3次赴港，与之合演的“白娘子”则是邓宛霞。邓宛霞是香港东方艺术学会会长岑德美夫人的千金，欧洲留学返港的钢琴家、声乐家和舞蹈家。她醉心戏曲，仅以几个月功夫就学会京剧《白蛇传》，初出茅庐第一回便与蔡正仁合作，大获成功。1987年新年伊始，蔡正仁赴港演出，邓宛霞再度与他合作《白蛇传》。因为蔡正仁前番演出时，在戏里改唱了一段昆曲，以致邓宛霞着了迷。后来，邓小姐频往大陆，边演边学，成了“京昆不挡”的人才，被俞振飞吸纳为女弟子。

我曾在近年中央电视台文化部春节文艺晚会上欣赏到蔡正仁演唱的许仙，果然是功架非凡。虽然在舞台上和女主角谈情说爱是家常便饭，而且对方多半是从十几岁起就在一起学戏的同学，但当对方太过热情时，还是会让蔡正仁窘得面红耳赤。当初，这个乡村少年与华文漪排戏，还博得“小封建”的雅号。其实舞台上呈现的只是片刻，而平时的排练也要求逼真，蔡正仁自然也难免被人在捕风捉影下做为调侃对象，他多半一笑置之甚



《连环计》之吕布

至自我调侃一番。而他也有一位圈外的贤内助，从不干涉他的职业，在“文革”初期还担任蔡正仁与俞振飞之间的秘密使者。

他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及上海发展昆剧基金

会理事长，兼职颇多，且频繁赴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演出、讲学。带着一个100多人的团，殊非易事，上海的报纸、电视经常报道他为振兴昆剧艺术努力的辛勤作为。他非常希望爱好戏曲的各界朋友能多多利用他们的剧场——兰馨舞台。

他在一封信中对我说过：“在我们祖辈的时代，那时的吴江是昆曲的一个强大根据地”。吴江地处三吴，

历史上是著名的歌舞之乡。近 400 年前，吴江就有与临川汤显祖齐名的曲学宗师沈璟。蔡先生老师俞振飞，就是吴中近代曲学大师俞粟庐的哲嗣。北京的倪征燠，南京的朱通华，都极喜爱蔡正仁的表演艺术，来自乡亲的赞誉，在这位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心目中，自然是特别的亲切和欣慰。

吴民先：石鼓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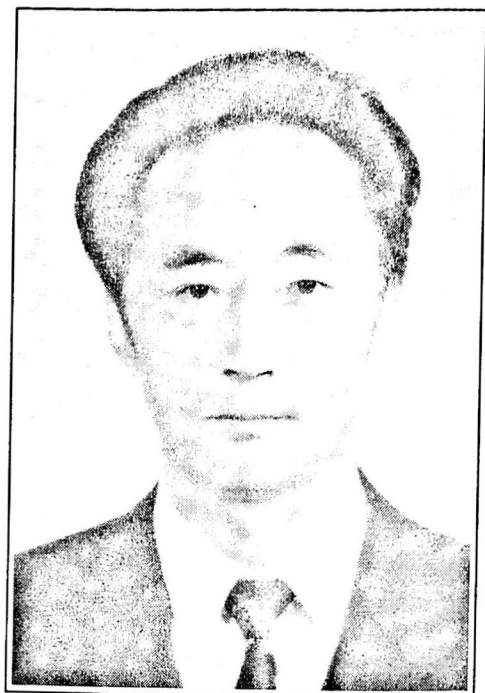
谁也不会怀疑，人的生命是从诞生的时刻开始搏动的。而我却时常为生命意识是否在人出生之前就存在的问题感到困惑。整整一个上午的相晤，当我走出民先先生的“寒瓢书屋”时，我相信他的生命熹光，是穿过了悠远的历史隧道，照临到这个给他苦难因而更使他求索的现实世界上来的。

我为自己感到惭愧，为这样一位书画名家造像还欠乏生花点睛之笔，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我等待着领悟的灵思，以稍许弥补自己的缺憾。我的记忆里经常浮现出民先先生那宽阔的额头——人生的沧桑和艰辛，在他的额上留下了几道深深浅浅的皱纹，仿佛一幅石鼓文的笔意篆刻。

在一个秋日的雨夜，我在书桌前陷入一种忧郁的迷茫。于是，我展开民先先生书赠的石鼓文，那是我在“寒瓢书屋”里看着他写出来的一幅字：

识真君子
敬古如来
落款是用

他曾祖父吴昌硕的行书体。这八个字是集石鼓存字，如蔓如藤，笔之所至，精气相随，线条遒劲。我忽然想到战国时代的先人，在石鼓上篆字的因由。那是他们



吴民先的额头上记录着人生的沧桑和艰辛，仿佛一幅石鼓文的篆刻。要将凝聚着智慧的文字，镌

刻在最坚实的物质上，使风雨无法恣意剥蚀人间的文明记录。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断垣的石柱上、废墟的石鼓上、悬崖的石壁上，读到千古的图腾、经文和情歌。民先先生对石鼓文情有独钟，并以擅长这种最古老的书法而独步中外，我从他的额上感应到了其间的神韵。

他的人生就是一幅石鼓存字。



吴民先书：识真君子，
敬古如来

民先先生和我是同一生肖，属兔，在己卯年的最后一个月生于浙江丽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大艺术家——浙江安吉吴昌硕和秀水沈蒙叔的后代。他父亲吴瑶华是吴氏第三代家学传人，诗书画印皆有造诣，颇得祖父吴昌硕的神韵；母亲沈蕴真是沈蒙叔的曾孙女，吴昌硕的再传弟子，知书达礼，善吟咏，工书画，一手蝇头小楷更是娟秀而内含劲骨，颇具大家风范。

父母为上海昌明艺专的同学，这是一所由大书画家王一亭任校长、吴东迈（昌硕之子）任副校长的艺术名校，王一亭、吴东迈还是吴沈联姻的主婚人。然而，这个艺术世家给予民先先生的却不是幸福和艺术，而是物质的贫寒和精神的苦难。

父亲聪颖过人，19岁时已获得中文和法律两张专业文凭，却未能光大吴氏家学。他投身从政，任过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省长秘书、台湾省参议员等职，退休前一直是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的主任秘书，以清廉闻

名，抗战结束时是浙西、浙北的接收大员之一。民先生却轻易不愿提及父亲，因为他于1947年抛妻离子、不辞而别，使母亲和年仅6岁的民先及妹妹难以聊生，也因为他的缘故，在以后的岁月里全家备受冷遇、歧视。母亲被迫提前退休，而民先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扬州师院，却只能分配到远离家乡的苏北农村中学任教。

民先先生6岁随母亲和妹妹来到吴江古镇盛泽，寄寓舅母家三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大的屋子里。为谋生母亲相继在芦墟、盛泽等地教书。起先，父亲还寄生活费，后来就断了。他还记得那个日子：父亲到了盛泽，要带他去香港，小民先恐惧地逃到楼上躲到床下。几分钟后，父亲就永远地消失了。

小学毕业，民先无钱就读盛泽当地的盛湖中学，便考入了松陵镇的吴江中学。当时12岁的他，显得瘦弱矮小，母亲将他送到轮埠上。告别母亲时，他一个人在船上无助地哭泣。天寒了，学校放假让同学们回家拿衣服。到了盛泽，母亲问：“回家干什么？”他说：“拿衣服”。母亲说：“你的衣服都拿去了。”他说：“看看妈妈。”母亲背过脸回答他：“不行，到学校去。不好好读书就不是好孩子。”他流着泪说：“妈妈，我走了。我一定听你的话。”从此，如果不是放寒暑假，他决不回家。一次，母亲到学校来看他，把他带到一家小店，买了两只茶叶蛋。他不声不响地看着母亲，把蛋一口一口吃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跑回学校——他实在不忍看见

母亲为他的挨饿而落泪。

他像石鼓一样在苦难的荒野，被凄风苦雨吹淋着扑打着。而母爱却在无形间冶炼着他坚韧的性格。他被生活抛弃在悲凉的郊外，又经受着社会风雨的锻打。

1958年，民先先生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扬州师院历史系，20岁时以全系唯一得到4个“成绩优等”的学籍毕业，当时，他的第一分配方案是南京的《江海学刊》编辑部。最后却到了苏北如皋县石庄镇中学。在那个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学，他先后教过历史、体育、哲学、语文等课程，从1960年到1977年，17个春秋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母亲在忧患和苦难中身患绝症，民先先生屡屡申请调动，却迟迟回不到吴江。母亲念叨儿归，他频频往返于苏南、苏北，略尽孝心。在母亲最后的3个月里，他侍母左右，读诗、读书、谈画，母子俩含着伤心欲绝之泪享受一生中片刻的亲馨。母亲等不及儿子调回吴江，就永远地走了，临终前对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子说了声“再见”。母与子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遭受了太多的屈辱和痛苦，民先把母亲的骨灰撒在盛泽的西白漾，时值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他在风雨里捧读母亲遗书，声泪俱下。一个痛苦的灵魂安息了。另一个忏悔的灵魂又来敲门了。

母亲亡故，悲怨交加的民先先生写了几封信告知亲

戚：“先母生前，受人欺凌，遭人冷遇，到其晚年，终于看到自己辛勤培育的成果，九泉之下当含笑。”一直隐瞒父亲音讯的大伯感动了，将信转寄给定居美国的民先父亲。父亲辗转来函，30多年的风雨，父亲的形象已从他心中抹去，他回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批评”父亲，最终原谅了这位也陷入痛苦的忏悔中的父亲。之后相隔大洋两岸诗书赠答，聊补着这残缺的父子之情。遗憾的是，刚待重续骨肉亲情，父亲重病住院，最后无力复信，未及民先启程赴美探望，便怀着歉疚与期待离世了，时距母亲逝世相隔一年。

半世人生坎坷，不堪回首，经风历雨，依然如藤如蔓的苍劲。民先先生37岁了，从没有得到书香之家的亲泽，他想起了自己的曾祖父。吴昌硕生于穷乡僻壤，经战乱历苦难，砥砺为一代艺术大师；他也想起了石鼓文，战国的石鼓曾被弃于野外，千古无声，虽经岁月风蚀，却苍古而有真趣，直到唐代终在艺术殿堂大放异彩。他要走出苦难，重回人间，像石鼓文字一样昭示出他质地坚硬的精神。

于艺术而言，我并不为民先先生感到不幸。艺术的真品往往是痛苦和厄运的结晶，如果石鼓文不在野外遭遇千年的磨难，幸存的300余个文字还会是独具审美价值的珍品吗？如果民先先生不经历37年的颠沛流离，他可能参悟到艺术精神的真髓吗？

对于书画艺术的传统修养，他的起步晚了30多年，此刻他已过了不惑之年。尽管前此他也曾偶尔挥毫，但正如他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那是不自觉的。自觉写字是37岁之后。”当然，他开始学画的时间更晚，44岁才伏案作画。别人收获的季节，他却才刚刚播下种子。寒星微月，青灯黄卷，民先先生将教学之余的每一滴光阴化为心血，注入笔砚，融进群书。抖落夜色，饱蘸晨曦，辞送春风夏雨，笔走秋月冬雪。

他说：“苦有好处。”苦使他懂得怎样做一个真实的人，懂得怎样追驰艺术的真美境界。年轻时为排遣痛苦，他酷嗜烟酒，但为了省钱买笔墨纸砚，他毅然戒了烟酒。每当烟瘾发作，便独步郊路，排除杂念，然后悄然入室伏案挥毫。他疯狂地写字作画，又自以为非，不断否定自己，把自感不满的书画尽数毁弃。一次，他在撕作品的时候，一旁的妻子实在不忍，恳求留下几幅以作纪念，他坚决不从。瘦骨峥嵘，矢志不渝，他把自己埋进深深的寂寞和孤独，用心灵和生命叩击艺术之门。他为我吟诵了一首自己作的题画诗：“沉浮艺海求三昧，不问人间世故情；泼墨吟哦超物外，颠狂傲兀任天真。”一副率真豪爽的自我天性跃然诗中。

磨尽了心灵的苦难，民先先生选择了一条通往艺术最神圣殿堂的道路——文人画。他的曾祖父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溶于一炉，达到了中国文人画的高峰。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享誉此“四绝”的只有3位艺术家：

赵孟頫、王冕、吴昌硕。1927年11月，吴昌硕逝世时，于右任的挽联是这样评价这位“中国文人画殿堂里最后一根香火”的伟大艺人的：“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半个世纪后，昌硕大师的曾孙吴民先来承接这根艺术香火了。

我在“寒瓢书屋”看到许多硕大和微小不等的葫芦。吴昌硕有诗云：“葫芦葫芦，尔安所积；剖为大瓢，醉我斗室。”民先先生和曾祖一样喜爱葫芦大瓢，他以陆龟蒙“和诗盈古箬，赊酒半寒瓢”诗意自况，将画室命名为“寒瓢书屋”，有瓢相伴，虽寒亦醉，有瓢为侣，不酒亦醉。

文人画的境界，是诗书画印融于一体，浑然圆满。工诗、善书、擅画、能印，精通其间一种，已非易事，何况还要将四种艺术形式融汇贯通。也许是吴家和沈家的遗传因子作用，民先先生后继吴氏流派，博采众长，浑厚古拙，端秀清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他的画，师承吴昌硕，兼习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任伯年、齐白石，以书之法作画，用篆籀行草笔法为绘画的造型手段，凡画中出现线条，笔笔遒劲，精气横溢。并能以“意”遣笔，诗情画意汇融相合，以“气”命笔，形意相随，个性显于整体，超凡脱俗之美余韵弥



吴民先花卉画秋色秋声

漫。既作花卉蔬果也作虫鸟，而又不拘于曾祖父的约束。受昌硕私淑弟子齐白石的启示，民先先生间或以昆虫禽兽点缀于花卉之中，时见生趣与巧趣，所谓俗到家时自入神。他还涉足山水人物画，山水低徊，幽韵萦绕，而人物机趣，可以窥视画家的豁达人生。

民先先生的书法，篆隶真草皆见功力，而尤以石鼓文见长，采魏碑隶之气韵，于形迹而窥精神，笔致精铁蟠曲，呈一派高古莽苍。曾祖父爱石鼓，书法亦以石鼓文成就最高，民先先生爱屋及乌，独承吴派石鼓书法，被誉为吴昌硕之后的唯一传人。但他并不以祖宗独尊，更致力于自己个性的张扬，源于吴昌硕而出于吴昌硕。

他的诗学元白体，诗风清新平白，意境高远，题画诗大多自作，言志咏怀，寓意于物。他在为我画的一幅墨竹图上，题过一首四言：

不根而生，
不笋而成；
风枝雨叶，
墨趣寄情。

我以为，这恰好是他的个性，也是他艺术生涯的生动写照。他有疏野情性坦荡襟怀，于淡泊之中执着地追求永恒的艺术生命，却不奢望伟大辉煌。为了艺术，他几乎弃绝了世俗的功名利禄，颠狂率真。1988年访日归来，在苏州教育学院工作的民先先生，获悉苏州市委要他担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消息，向领导婉言谢绝：

“我的书画起步晚，时间宝贵，离开艺术，我最后拿什么东西见老祖宗呢？”

民先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个有志气的艺术家。父亲死后，他与在美国的继母有了联系，见面之前他申明自己不要钱礼、不哭穷、不低声下气。随着在国内外艺术名声鹊起，日本、美国的亲友和吴氏艺术崇拜者多有邀请他去定居，他说：“我的根在中国，去了那里，我就是一株枯萎的草。”1993年他到美国探亲，可以有6个月的逗留，结果他只呆了6个礼拜就赶回来了。

与我谈到对艺术的见解，他认为从事艺术要做到两点，其一是“游艺”，就是不拘谨，不以艺术为功利手段；其二是“治艺”，就是严谨、刻苦。“游艺”与“治艺”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因此，他一向无意参加国内的各种书画大赛大展，对自己的艺术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民先先生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独创了一个吴派艺术的崭新世界。他在艺术圣殿里已赢得“吴昌硕以后的佼佼者”的美誉，当然他的真正未来还很辽远，但我已经看到了他的大师风采。

看着民先先生在那张宽大的铺着毛毯的书桌前作画，衬着满壁古色古香的书橱、字画，我愿意把他想像成一个穿古装的古代文人，他的思想必须和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墨香之宝才显得相宜相彰。在他的客厅，与他及夫人午餐的时候，我建议他置备一套古装。我确实

感觉到他像是从上个世纪，甚至更远，从中古时期走来的智者，经历了坎坷的漫长生命历程，以其诗性的灵光和画意的神韵，为我们现代人展现一片神奇瑰丽的心灵风景。或者，他是一幅遥远的文字，在露野的时候，被风雨吹淋为坚石，而那智慧的经络凹凸为艺术的藤蔓线条，傲兀而沉雄，因其久远而弥尊贵。但我该怎样收藏这幅他馈赠的文字呢？我对自己浮躁的书室，产生了怀疑。

徐孝穆：巧刀神艺

孝穆先生的爱好是以竹为纸，以刀为笔。他手中的那柄刻刀，恣意纵横，犹如神工鬼匠，或深镌浅刻，或浮青平雕，或锦刃斜披，刀端锐利，敢辟荆棘，可以淋漓尽致地镌绘出书画的干湿浓淡、色彩墨韵，或雄伟，或纤巧，或凝重，或苍劲，或清新，或飘逸，毕肖地再现书画的情趣意境。当他的竹刻艺术与书画结合时，跃然于刀底竹上的便是另一种奇妙的神韵：有朱屺瞻花卉画的秃辣，有关良戏剧画的拙趣，有叶浅予舞蹈画的飘洒，也有黄胄拜月图的颠狂。郑逸梅曾经说：“凭着他掌握的一柄小刻刀，把各派书画家的笔法气韵，全部表现出来，不必见款，人们一望而知这是某人的书和某人的画，一无爽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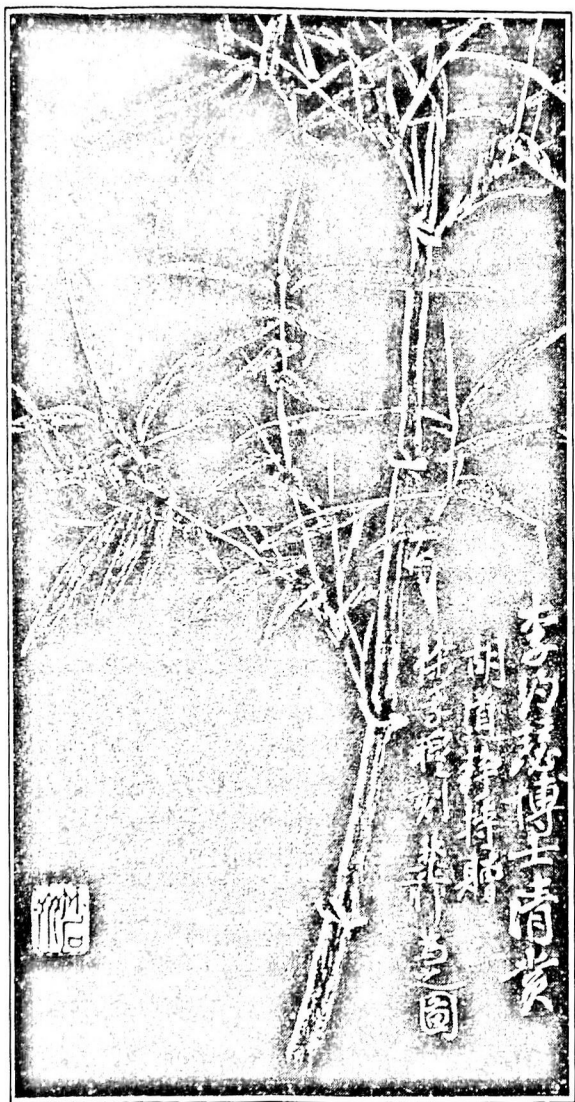
10年前，英国剑桥大学的名教授李约瑟博士八十寿庆，寿翁收到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胡道静赠送的一件神奇寿礼，一竹刻臂搁。但见竹枝一丛，刚柔并济，浓淡相宜，勃

发出一抹笔所不能到而刀刻独到的神韵，落款为“李约瑟博士清赏 胡道静持赠 徐孝穆刻 稚柳为之图”。李约瑟得此大喜，叹为观止，特地来华拜望徐孝穆。博士掂着他的手，幽默地说：“上帝给了您一双西方艺术家没有的手”。从此，孝穆竹刻如美玉腾辉、玫瑰呈采，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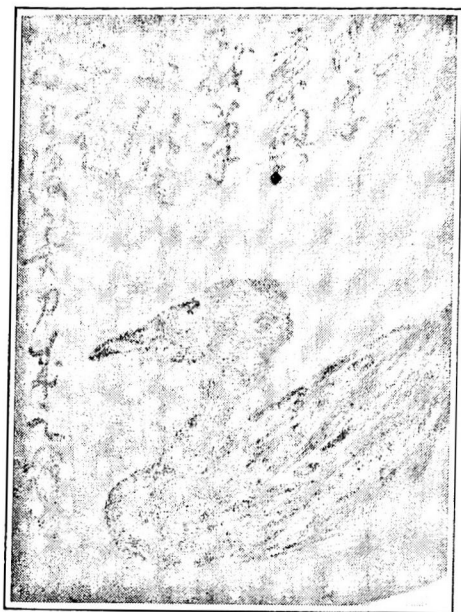
孝穆先生系吴江黎里镇人，生于1916年，是柳亚子先生的外甥。幼时，镇上有座褰湖书院，墙上嵌有“褰湖书院修葺记”，是乡里前辈徐山民所书。孝穆时往观摩，回家时还常常不住地在手掌上比划。他家还有一件自高祖所藏的明代朱氏传世竹刻。此件为竹刻始创人之作，远山近树，前后分明，有阴有阳，虽已暗黄，但仍见得刀法精到。摹而刻竹，始知其奥秘。

10岁时，得老师沈研云鼓励，刻了一副对联参加校庆展览，轰动全镇。然而，黎里镇并无竹林，觅取刻竹材料不容易，因此每逢亲友捎来别处的竹片，总像捕到翠鸟一样兴奋。到苏州读中学时，他已由刻字转为刻画。一次，当一扇教室门损坏而被钉上一块煞是难看的“补丁”时，孝穆灵机一动，手执刻刀，将“补丁”衍化为一轮朝阳，下刻层层波浪和鸥鸟展翅，俨然一件艺术品。此时，这位日后的竹刻大师所特有的笔法造化，巧夺天工，已露端倪。

亚子先生是他姨丈，两家相距仅二十多个门牌，近在咫尺。自幼常往，每逢节日，礼节性拜谒，更是必不



六十七岁刻赠李约瑟博士臂搁



或缺。每次去都见亚子先生手不辍卷，朗朗吟读，或信笔作书，龙蛇飞舞。亚子先生著文吟诗和写信，总是洋洋洒洒，一泻千里，但他的手迹却很潦草，不易被人所识，尤其晚年所写，能鉴

别的人寥寥无几。上海成为孤岛后，孝穆不愿接受日伪俸禄，辞去税务学校的差事，赶往香港，投奔旅居九龙的亚子先生。此后，他与亚子先生朝夕与共，为先生誊抄南明史稿。因此较能识别亚子先生潦草的手迹，80年代中期，他曾为鲁迅纪念馆辩认亚子先生关于鲁迅评价的长信。令人痛惜的是，香港沦陷，百余万言的亚子《南明史稿》和孝穆的早期刻件及在港名人题诗，全部散佚。

中学毕业后，孝穆先生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因为身材瘦弱，他需要在同样是“矮小臃肿，

如同猛狮”的乐圣贝多芬那里得到慰藉和勇气，而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慑住了他的心魄。教务长汪亚尘是名书画家，得其相助，孝穆先生先后以汪亚尘、诸闻韵、诸乐三、王陶民等为师。经他们的指点，始知刻竹诸门类中，最难而最有深意的是浅刻，它能显现书画的精神，是最高的艺术。而且，浅刻的用材容易觅取，扇骨、臂搁、笔筒等皆宜，至于竹壁的厚薄，有无留青也无妨，于是，他选定以浅刻为法。

竹刻艺术，源远流长，可上溯到 5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竹编器，而公元前 300 年，已有竹筒成册。迄今所见的最早竹刻艺术品是江陵战国墓出土的圆雕竹刻件，武威东汉墓出土的雕隶体字的笔管，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浮雕龙纹竹勺。竹刻艺术鼎盛于明清两朝，有金陵、嘉定两大流派。孝穆先生的竹刻熔雕刻、书法、绘画于一炉，运刀如笔，万千风情，浑成自然，别具特色，为竹刻艺术增添精品杰作。

赖少其在沪时，得一紫檀笔筒，其色如漆，似枣心木，唐云在笔筒底处写“少其长物”，书法大师白蕉为之画兰，并写诗一首：“我有刀如笔，安知笔非刀？平时作尘拂，作战当梭镖。”字如龙蛇，婉转飞动，兰如菲草，馨郁沁人。徐孝穆刻之，或深或浅，使人惊叹。白蕉见了，又用蝇头小楷写一赞语：“刻而不刻者能品，不刻而刻者为妙品，铁笔错落而无刀痕者为神品”。孝穆先生的竹刻神乎其技，不论深镌浅刻，留青浮雕，还

是平刀直立，薄刀斜披，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体现出作者追求尽善尽美的个性。其刻竹，有平底、光底、毛底、沙底之分，都具自己的特点。他刻的宜兴紫砂壶饶有风味；刻砚，同样功力深厚，技艺精湛。

柳亚子曾诗赞孝穆先生“颇能篆刻，更喜结名流”。也许，正因为要在竹刻品上着力表现书画名家的多种风采，才使他热情结交吴作人、蒋兆和、叶浅予、黄胄、朱屺瞻、唐云、谢稚柳、陈佩秋、沈尹默、白蕉、丰子恺、程十发等大批著名书画家。而这些艺坛骄子，也乐于将作品付之他的刃下，一展妙韵，藉其独具慧眼，化平淡为神奇。

随亚子先生，孝穆结识了何香凝、叶恭绰、郭沫若、沈雁冰、傅抱石、老舍、黄炎培等文化名人。大家都惊叹于他的竹刻，为其竹刻拓本挥毫题词。1963年冬，老舍夫妇宴请唐云、黄胄、傅抱石、荀慧生于东来顺菜馆，孝穆也在被邀之列。流杯飞觞，朵颐大快，老舍向他索竹刻，翌日他即将这晚宾主尽快之乐，撰文刻就扇骨相赠，遒劲婀娜，兼而有之，老舍得而大喜，为题八字：“有虚有实，亦柔亦刚”。

孝穆先生在上海，先居进贤路，亚子先生曾为题“进贤楼”；后移迁万航渡路，吴作人写匾“万航楼”。因所居为第十二层楼，适于高瞻远瞩，赖少其便题“凭栏阁”。寓所内，触目都是刻件，举凡矮几笔筒、杯盘皿匣以及手杖文镇，大都是唐云作画由他自己刻就，可



紫砂壶刻竹，竹叶摇曳，如临风中。

谓集唐画之大成。而唐云家里的玩赏陈设品，都是孝穆所刻，也可谓集徐刻之大成。沿壁设一玻璃长橱，是特制的，专列竹刻臂搁，各极其妙。也有名人像，如柳亚子、鲁迅、邹韬奋、梅兰芳等，神态宛然，以至鬓发纤细、罗罗清疏。

大石翁唐云与孝穆先生有深缘，所谓石翁穆翁。唐云善饮酒，自称脑袋灌满了黄酒；也善饮茶，对茶道甚为讲究。每当孝穆去望他，总要亲自在屋里架起炭火炉，当场煮水沏茶。两人对饮谈笑，饮至酣处，唐云即兴吟出一联：“孝穆使刀如作画”，孝穆对得亦妙：“老唐拈笔若催生”。一次，唐云乘兴访“竹石斋”，恰巧主人不在家。客人看到桌上他所画的臂搁，就在背面绘一



徐孝穆先生以刀为笔，以竹为纸。

坡下有树、树中藏屋的小景，又留句：“冒雨访孝穆不遇，作此而去”。孝穆归来见此，随即镌刻，妙手偶得，永作留念。

孝穆先生在上海任民主促进会常委期间，为民进办了一所“建人艺术专修学校”，并任校长，开设的艺术科目有国画、书法、竹刻、装裱、芭蕾舞、越剧等。上海文史馆办业余艺校，孝穆先生也被邀教授竹刻。后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致使行动不便。

他曾告我，尽管手已颤抖但仍不辍竹刻，他所刻的周恩来竹像，已捐给淮阴周恩来故居作为馆藏品。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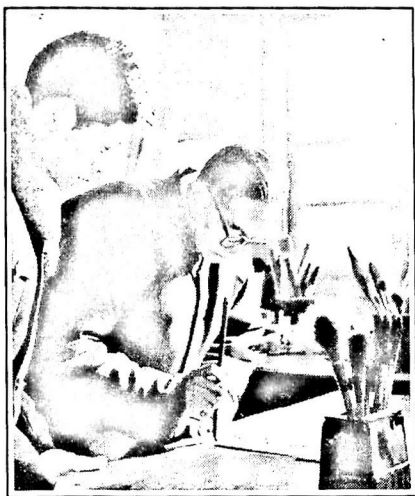
图书馆设名人手札陈列室，他不仅捐赠臂搁、砚台、紫砂茶壶，还献出一批珍贵的名人手札。幸其子维坚、女培蕾、培华都是竹刻能手，孙儿晓东刻艺亦佳，绝艺有传。上海电视台多次摄制纪录片，金针度世，启迪了许多艺坛后进。

徐穆如：书画不老

嘘云阁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所在，它的主人以走过了漫长岁月的悠闲步履，显示着自己的一派稳健风度。身居名阁，主人却拂净了书画名人的荣华。堆叠的书籍是凌乱的，见出主人时常的翻阅，粗细长短的毫笔，静默地陪伴着。在主人迎上前握手的瞬间，我很想从他清癯的脸上去感受九十个春秋的沧桑，然而，我所领略到的却是他眼睛里熠熠闪烁的年轻人一般敏捷而纯真的光彩，那是一双鄙薄荣名、淡泊功利的眼睛，宁静得令人相视过后便再也不能忘却。

面对名人，终究难以讳避他的名。穆老的成名，似乎比当代所有堪称大师的书画家更早。18岁，或许还是少年人玩耍的年龄，即便对有志书画艺术的年轻人而言，那也不过是即将或刚刚步入艺林的时候，因为书画家往往是大器晚成的。而穆老18岁时已崭露头角，一幅独步古今的“百寿图”发表在日本出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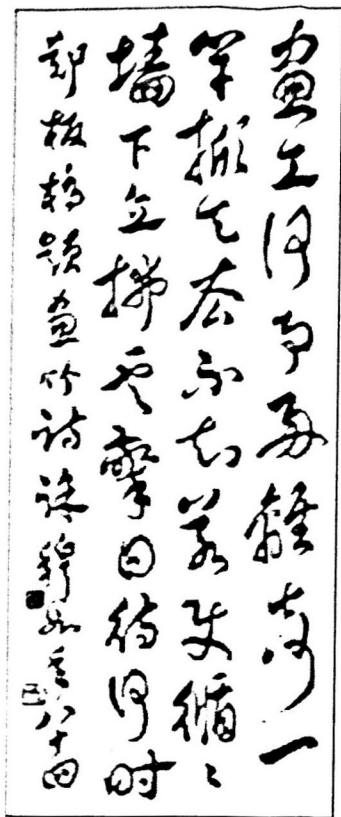
《中国美术》杂志 1921 年 7 月 3 周年纪念号上，轰动了中外书画界，自此，他便跻身于吴昌硕、王一亭等名流之林。“穆如徐君，英姿伟发，年少好古，凡秦汉六朝之书，靡不悉心临摹，纵横隽逸。比来，篆隶专学顽白，尤得遒劲之



年及弱冠就跻入书画名流之林，实为创造奇迹。

趣，名重鸡林，于斯可见……”这是冠绝一代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为推举穆老书法，亲笔题写的《嘘云阁润例》开首语。昌硕先生是轻易不随便给人写润例的，《嘘云阁润例》在沪上书画艺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穆老属龙，其自题书斋曰“嘘云阁”，昌硕先生也属龙，比穆老大整整一个甲子。当时昌硕先生已 81 岁高龄，而穆老年仅 21 岁。同年，他即成为中国画会比张大千还早的年轻会员。

穆老初名徐观，又字洁宇，祖籍无锡，1904 年出生上海，其父在上海经营绸缎庄，因喜爱书法，而与书画名家颇多交往。徐家居北山西路吉庆里，恰与吴昌硕



徐穆老先生的书法纵横逸举
过犹若三

为邻。时洋货呢绒倾销中国，绸庄生意一落千丈，致徐家顿陷困境。穆老 12 岁时，视父亲年老体衰仍不辍奔波而心酸，遂始习字，立志以书画艺术敬孝父母。15 岁那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待家习字。一日某亲友嘱为写字，其字被正在弄堂里散步的昌硕先生看到，称好之余，就把他请到家里，当面看他写字。昌硕先生边看边赞，说：“你已经学会了逆笔藏锋，很好。但还有些缺点。我来教你。以后天天写了拿来给我看。你做我的学生，但不要搞什么

形式。”于是，穆老就成为比沙孟海、王个簃、诸乐三等先入门的吴门弟子。昌硕先生不但在笔力和章法上不断给予热情的提示，还将鹅头执笔法以及指实掌虚的要诀传授给这位年少聪慧的学书者，并根据穆老的个性，

指导铁线篆印。其间，金石书画全面继承家学的吴昌硕次子吴藏龛，也时常光临徐家指导书法。稍长，穆老又被昌硕先生荐给俞语霜海上题襟馆的前辈们，如丁辅之、高野侯等名家。半个世纪后，姑苏名胜古刹寒山寺的当家法师性空长老恭拜穆老为师，穆老说：“我一生不收学生，但决不保守书法心得，仪式就不必了。”性空执意不允，诚邀穆老赴功德林共餐素宴，穆老欣然，尽欢而散，又续写一段书坛佳话。

20年代初，上海流行一份每期由于右任、王一亭等大师题头的《神州吉光集》书画册子，穆老的大篆和小篆作品屡屡与老一辈名家并驾齐驱，并受到昌硕先生的师友王一亭先生的推崇。当时，他不仅是学校里的佼佼学子，也是活跃于艺坛的书画新秀，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从小学直至大学，他几乎是连跳带送速成毕业的，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直接考入二年级就读，毕业后又到正风文学院深造。这一时期，他那潇洒、遒劲的书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1927年，日本名人林丰子先生88岁米寿，24岁的穆老应邀为寿庆书画集《寿而康》再度精心篆书百寿全图。百个形体各异的寿字，均系他自集编排，一粗一细用笔相间，其中有五字集自秦始皇玉玺，呈鱼鸟纹写于图中，堪为艺术珍品。其“寿而康”封面题字为吴昌硕先生84岁谢世前数天所书，这是师生俩最后一次合刊书法。

穆老学画稍晚于学书，19岁时师从同乡的名画家

吴观岱大师。吴观岱是晚清时期被西太后慈禧请去清宫作画的唯一民间布衣画家，其画风超脱飘逸，秀灵绝伦，其人品崇尚淡泊，睥睨名利。穆老少小成名而不慕功利，乃源于吴观岱先生的影响。穆老随吴观岱研习山水画技，今穆老画室尚存一幅作于48年前的《东坡夜游》图，以苏轼携侣夜游为题材，山水人物均寥寥数笔而传神达意，作画粗笔豪放不羁，令观者仿佛置身于清夜步月的氛围。然他的名画《双骏图》却是精妙的工笔画。一般工笔画，尤其是画走兽动物的，往往工而欠活、呆而生滞，纵然历代名家之作也难免缺憾。穆老的《双骏图》却似画非画，幻如真境，那中空、斑驳的古松，被在风中摇曳的老藤红叶所盘缠，那双骏一静一动，动者擦痒于树干，静者屏息若旁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穆老所采用的是乾隆时代居留清宫的西洋名画家朗世宁的写实技法，中西合璧，双马形神尤显逼真，近现代画坛高手皆称赏此画神妙无比。穆老告知，作画所用之纸系乾隆宫中的皮纸，原纸一丈六尺长，因价格昂贵，他当时与张大千合买，以50块银元购得1/4。穆老说好纸难得，此纸绘画，用笔干湿随心所欲，韵味奇妙。《双骏图》系1935年穆老31岁时所作，1956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美展获一等奖后，旋为国家遴选参与欧洲各国的文化艺术交流达两年半之久。期间国外识者曾通过我国有关部门与穆老联系，期以美元高价购买这幅力作，但他不舍得出售。文革时，穆老家的书籍字画

双骏图



横扫一空，唯《双骏图》及少数几幅早期作品被其子及时转移，得以幸存。待重睹旧物，《双骏图》已因保藏不善而破损。第一次重裱又因裱匠无整修旧画技术，致画面受损益加，穆老心痛至极。后经上海名裱画师精心修复，权重现青春，眼下这副《双骏图》仍不失往日神韵，凡亲睹双骏者，无论书画同仁，一般观者，皆惊呼传神之笔，叹为观止。

1989年10月，一位兼营工艺美术品公司的美籍华裔油画家梁鸿健先生，在苏州吴门画院展览大厅相中一幅油画，意欲买之，转而进入外宾书画陈列室，看到穆老展出的数十幅书画精品，便托辞办事推却了原欲订购的油画。半小时后，那位梁先生携带了正在寒山寺游玩的妻子、儿、媳，赶到穆老面前，诚挚地说：中国画闻名于世，但还没有看到真正体现传统的好画，您的画表达了国画的精髓，是我这次回国的最大收获。我们一家从事西画，想来中西画的内涵精神应该是互通的。能否应允买下您所展览的全部字画？穆老婉言谢绝，梁先生请求穆老当场作画，一睹国画的运笔方法及过程。尽管穆老已数十年未作画，盛情难却，便欣然命笔，绘了两棵虬枝错落的古松，题图“双寿”，赠予梁先生。梁先生感激地邀请穆老赴美举办书画展，穆老辞谢。

穆老书画在日本声誉卓著，1987年，日本电子工业巨子、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弟弟访问苏州，专程到吴江松陵镇拜访穆老，日本东京电视台还特地播映了日本书

法代表团访苏时穆老当场淋漓笔墨的录像。近年间，国内许多对外友好文化交流，都将他的作品列入选送之列，在众多的国内外交流中，他的作品都获得极高的赞誉。

1987年，汇集了全国著名书法家作品的“黄河现代碑林”，由穆老自己作诗的大篆石刻“滔滔大河水，天地相终始；云秀世所钟，哺育炎黄子”，以磅礴的气势、豪放的笔法而巍然挺立其中。由新加坡、中国联合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选刊了他的大篆对联“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雨。”国内各博物馆纷纷把他的书画、篆刻作品收为馆藏，香港大公报等国内外报刊也经常刊登文章介绍他的各种作品。全国许多著名收藏家，包括象葛书征这样的大收藏家，都收藏了穆老的精品。

穆老画技高超，书艺精湛，真、草、隶、篆、魏碑、章草各种书体无不精通擅长。他还极具摄影艺术的天赋。当年作为美国柯达公司出色的摄影技术编辑，他凭藉精谳的英语，向国人译介国外最新的摄影技术，向国外举荐国人的优秀摄影作品。他自己的摄影作品也连续发表于《中华图画》、《良友》等画刊杂志。大作家郁达夫先生看到穆老的摄影《屯溪夜泊》，诗情激荡，欣然仿其境意而题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1946年秋，

穆老应范仲淹后裔范懋达先生之请，与名作家范烟桥分别担任艺术丛书《天平山导游》（艺林出版）的艺术顾问和顾问。全书精美的摄影图片均出自穆老之手，封面一幅“霜枫红拥御碑亭”如诗似画，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叹为绝妙杰作。

在天平山策杖寻秋之时，穆老于山腰中白云悬崖处发现“一叶舟”、“一砚泉”两名迹异境，为前人所未造。《天平山导游》中辑录了穆老爱妻、吴观岱大师女弟子邹萍倩女士为此而作的题咏，以及穆老、范烟桥、范君博的和诗。如今，穆老题写的“中白云”在天平山如云游人的心中幻化成了悠长的纪念。而他先后为虎丘、盘门三景、石湖、留园等题写的匾额和摩崖石刻，又成了苏州园林名迹的新景观。

初春的阳光温情地光临他的陋室，他独坐于摆满毫笔的桌面，似乎陷入了一场笔墨挥洒后的休憩。衬着百寿图的侧影，他还是神情矍铄，仿佛一尊生动的寿翁。我不禁想起了他青年时代的一句诗：宿鸟盘空倦不归，松杉千树晚烟微。在他归隐吴江的二十年间，该有多少松声如涛涌过他遥远记忆的壑谷呢。书画界的一位晚辈称老人“身怀绝技而不求显名于世”，如果把绝技视为他终生以求的艺术境界，那么，不求显名于世，或许就是他洒脱的人生哲学。在擦肩而过的小巷，这位依然才思飘逸的老人所能给予人的，不过是一种谦和慈蔼的印象吧。

作者附记：

徐穆如先生已作古两载，生前一概拒绝作文显名，致。识者寥寥。本文幸赖先生相助而成，特予入集刊行，以作艺林隐逸之传。

15年前一个初春的清晨，我一个人走出家门踏上漫游之旅，将自己烂漫而苦难的少年时代留给了春寒料峭中的故土。在异乡的温情里，遥想着蓝天下的那个家乡，我觉得似乎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我以为，我将在这陌生的天空下开始自己青春蓬勃的平庸而又不一般的人生作为。可是，几个月后，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我突然像没有断线的风筝一样，回到了花香之中的家园。我歉疚地告诉远方的朋友：我不能够丢失了我的故乡。

现在，在如此静谧平和的深夜，当我孤独无援地回首往事的时候，才蓦然意识到那不过是我十八岁时与生俱来的乡恋，并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乡愁。尽管在那个时期过去以后，我又拒绝了深圳、武汉、南京等所谓特区、大城市优厚待遇的诱惑，所以我始终没有经验到欲回不能、欲罢不休而凭藉床头月光低首苦恋的

深沉。

就在几小时以前，一位乡贤前辈在松陵饭店一间高雅的客厅召见了我们，他友好地赠送我一本书，书名是《鲈乡萍踪》，可是在目录上，我发现这本沉甸甸的随笔，所记叙的却是他天南地北、陆内海外的行踪和思想，我记得自己当时是愣了一下。回到家里，我怦然心动地读到了他在《前言》里的一句话：“我是从鲈乡飘出来的一叶浮萍，浪迹天涯，萍踪无定。”

仰望璀璨星空，在用目光与闪烁群星的脉脉交流中，我所感觉到的并不是星光的明耀，而是脚下这片古老土地寂静的厚实。当我的许许多多同乡前辈，或怀着使命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背井离乡，然后，缓缓升上夜空闪耀出明星光芒的时候，他们投向曾哺育了他们的故土的会是怎样的光谱呢？

二

我走进费孝通先生寓所的时候，他正放下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微笑着，徐缓地从座椅上站起身来。我顿时感觉到一种宁静、祥和的精神，尽管他是集盛名、高寿于一身的人瑞，但他却使我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亲切的氛围。后来，我这样问自己：也许，人杰地灵的吴江土壤孕育才思横溢的费孝通是天赋的机缘，那么，这位走向世界的社会学大师世所罕见的神工鬼斧的创造力，又源自怎样的灵感呢？

作为家乡人，我在他远离七十多年后进入了松陵

镇，我所发现的或许是别人不肯苟同的：在费孝通先生征尘迷蒙的学术生涯的道路上，故土是他刻刻常新的驿站。在他 26 岁拄着拐杖、身心俱伤地还乡时，就曾在乡土静静的回忆里寻到了久远的童年温馨，并把故乡的江村的故事写成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名著并由此攀上了世界社会学的峰顶。21 年后，重访江村所阐述的观点而引出的风暴，使他丧失了二十多年的学术生命，然而又过去 25 年，当他重新站立起来时，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故土沧桑，《三访江村》成了他接受人类学最高国际奖的演讲，让故土作为世界了解中国农村巨变的“窗口”。从此，他不断地悄悄回到自己人生的起点，带着他真挚的美好愿望。我能够想像，他踏遍青山的同时，故土这块地球弹丸之地上那碧绿的桑树、金黄的稻穗、蔚蓝的太湖，以及飘逸白云下生动的小桥、流水、人家，是如何亲馨地倏然涌进他漫不经心的随想的。

我曾经在他题名的“万顷阁”里，倾听过太湖夜浪，让湖风吹进挟着水草味的梦里我发现，我的感受竟与他是那样想象！正是这种神秘的乡谊，使我在与他合影的刹那，突然想到：也许，就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乡土感情给了他灵感和启悟，培育了他关注人类命运的责任感。

三

在我这种缺乏语音模仿能力的人看来，铁马金戈的军旅生涯，竟然没有磨去钱国梁将军的乡音，应该是个

奇迹。当然，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隐逸文人和为官文人辈出的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陡然站起了一位睥睨刀光剑影的赫赫战将。在我的印象中，明末那位文武双全的吴易也不能比拟于钱国梁将军，因为吴易的有勇无谋是我们这块智慧乡土上的谬误。我的一位长辈是这样描述钱将军的：“他思维敏捷，当他抓住一个政治问题来发表意见的时候，就像一个雄辩家”。我收读过他的许多信函，都是洒脱奔放的毛笔书法，据说，练字在将军是种休闲的运动。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现代文明的智慧，塑造了一位智勇兼备的文人型将军。这难道不是沉积了数千年文化的故土的奉献吗？

和钱将军一样，项怀诚也是乡音未改。我在《吴江人》电视上听到项怀诚还在使用这种语音，说他面对法国人时觉得“我们吴江比你巴黎好得多”，我心里涌起的情绪只是感激。当故乡仅仅是一个记忆出现在他们心上时，竟然有如此厚重的份量，这时，他们已不是司令员、部长，而已还原为一个客居异乡的吴江人。

四

陈应谦先生是值得吴江骄傲的医学教育家，他那非凡的医学生涯，是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叶剑英、陈云、贺龙、陈毅、徐向前这些人物相关联的。多少人一生中与他们远远见一面，就会激动终生，而陈应谦与他们却长期相伴过。在延安枣园，他与毛泽东、马海德一起玩麻将的时候，毛泽东请他用家宴

的时候，话语里流露的就是那种吴江方言的韵腔。我没有去过延安，但体味得到他对延安圣地的感情，于是描绘了他的延安梦：“陈应谦时常站在蜿蜒的延河边上，遥望着宝塔山，心里充满着幸福的感觉。这幢建于1000年前的宝塔，耸立在一座最高的山上，整齐细长，仿佛一支正对着蓝天描摹云腾霞蔚的神奇之笔”。

然而，在延安、沈阳、北京跋涉了一辈子的他，仿佛始终没有走出吴江。故土在游子的心里可能沉睡着，但却永远不会在血液里消亡。在陈应谦先生寄给我的许多信函和资料里，我发现这位曾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医学家，竟然很少写那种时髦文章，尤其是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有关领袖人物的回忆录。我请他为家乡的《人才》报写一些什么，他才首次展开了珍贵的记忆，写了他熟悉的真实的毛泽东、周恩来。有一次，我在夜里与他通了半小时电话，他说出了许多吴江留在他记忆中的物事，时过境迁，故乡的色彩却永不褪色。

不久前，他听说我友人的儿子在上海医疗，立即寄出快信，为我友人找了位吴江籍的医师，他给那位医师的介绍信上说：“乡人情谊，当鼎力相助”。几天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来信询问有否与上海医院联系。

世界上的任何口头语言中，没有一种可以与裹在乡音里的方言媲美。记得陈应谦先生对我说过：“听到你的家乡话，非常欣喜”。凭藉一种独特的语言，就使相

隔千万里的人们在心灵上激起共鸣，这神奇的文化现象，令我想到，在一个相对封闭区域的人类生命延续中，乡音不会衰老，也不会消亡，它永远呈现出丰茂植物那种新鲜而绿翠的色彩。

五

我有幸做了朱通华先生惠赐《人才》报发表作品的责任编辑，第一次编的是他访问日本期间写给费孝通先生的信，不久又编到省委书记陈焕友为他的书写的序，随后就收到了他的“中国小城镇研究的根和叶”系列。朱通华先生与费孝通先生有“松陵二子”之称，他俩之间感人肺腑的忘年交谊，我以为是乡土感情促发的一种因缘。

朱通华先生约我与他会晤的时候，他的社会地位和学识，起初使我产生了回避的念头。但是，两个人一坐下，话语就滔滔不绝。一见面，他就说到费孝通先生，他说他与费老在许多问题上，比如10年前的温州经济现象，都有共同的见解，不谋而合。我说：是心有灵犀。现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才领略到他说这段话的意图，似乎是两位同乡学者之间那种非同寻常的默契，那种基于乡土感情的美好默契，才使他们达到了心心相通的境界。朱先生与费老在同一城镇里长大，但前后相隔逾30年，先前并不相识，直到80年代初为了研究家乡的小城镇才有朝夕相处的杯茶之叙、和诗对唱，才在家乡的土地上结为谊胜旧交的新知。

在我的感觉中，朱通华先生对小城镇卓有成效的研究，和费老一样，是植根于家乡土壤的，然后再将枝干伸展向更广阔的畛域。甚至，我觉得，朱先生在费老开创的小城镇研究的后续事业里，还联结着某种乡亲的渊源。

“我每一次到吴江来，总觉得吴江的自然风光最好看”，朱先生这样说过。其实，吴江的自然风光与其他江南水乡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别，而漂泊异地的吴江人，在品咂了他乡体验与故乡意识深刻交糅的人生况味后，谁能不如此情不自禁地对故乡大加礼赞呢？

六

当代上海人大多讳避他们的籍贯，在他们眼里，上海之外的是难登大雅的“乡下人”。而著名京昆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却始终如一地做着一个“吴江人”。吴江电视台《伴你同行》的《吴江人》摄制组，让我联系几位吴江籍的上海名人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蔡先生，这倒并不仅仅因为我曾经为他“画像”，而是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吴江人。果然，他在表达对家乡的情深意长时，说了这样一段特别感人至深的话：“我如果是个企业家、总经理，那我可以到家乡去投资。但我是从事艺术的，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家乡有所贡献”。他对于家乡的关切之深，不是我的秃笔所能形容的，他用自己的心里话袒露了真诚的愿望：“我希望家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文化，

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文化。”

蔡正仁先生师承一代艺术大师俞振飞，是当代昆曲艺术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但他没有忘怀吴江。我记得去年他在信上说：“觉得作为一个吴江人，理应为故乡的发展出一份力，今后凡用得着我时请你们呼唤吧！”他为家乡的文化荟萃、人才辈出而自豪，他告诉我：南京的朱通华、北京的倪征燠等吴江人，也都喜欢他的昆曲，倪征燠临行海牙就任国际大法官时，什么都不带，随身就携了他的两盘录像带。

然而，如此挚爱吴江的蔡先生，在吴江生活仅有10年时间，他是3岁时随家从南浔迁徙震泽，13岁就赴上海习艺。是吴江的文化氛围孕育了他最初的艺术表演灵性，所以，尽管他的祖籍不在吴江，尽管他在上海成家立业40年，他依然思念滋养了自己的家乡。

七

我无意于高攀大人物以自炫，我是因为机缘而了解他们的。我漫步在曾经诞生了许多杰出生命的神秘的河边，虽然不能告知更多剩下的故事，但他们经历所昭示的“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时刻立在我们的面前，永在流逝的时光中为伴。我相信自己与他们在“故乡兴则喜，故乡愁则忧”的思想上有着共同的心声。被誉为中国留法学生象征的青年科学家李怀志博士在他从法国寄回的照片上写道：“桌上的日历是祖国寄来祝贺新年的”，他所说的祖国就是家乡，而家乡就是放大的祖

国。朱通华在日本与朋友谈天的时候，还想着请他们到家乡去办点实事。无论是身在故土的吴江人还是浪迹天涯的吴江人，都把故乡明月引为自豪和安慰，把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归功于家乡的哺育。

一生无暇探访故乡的杰出核物理学家程开甲，常将流经家门的古镇市河作为往事回忆的起点。当代能源地理学的首创者钱今昔，至今还珍藏着半个世纪前所写的《吴江，我呼喊你》，而著名戏剧家沈正钧，不无忧伤地说：我即将离休，到最后一次填写籍贯的时候了，他们未有一刻迷失过故乡在地球上的方位。就在我们依偎在家乡怀抱里酣然入睡时，远离我们的那些吴江人，正振动着梦的翅膀朝我们的方向飞来呵。在这样钟情的夜晚，大地一隅的故土浮起在蔚蓝的天空，为那些魂动心惊的乡梦，洒下月亮一样温馨的明辉。我站在为所有吴江人共同拥抱的这方美丽土地上，追溯着他们的背影，他们留给我的却是一缕缕空中的星光。

1996年10月于心远室